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 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 伟	朱 民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 祥
张卓元	陈 元	林兆木	林毅夫	周文重	高尚全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樊 纲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傅强恩/John Frisbie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马克·乌赞/Marc Uzan
郑永年	

编委会

主 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晓红	吕 政	谷源洋	朱晓明	李晓西	李向阳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 本刊专论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行动纲领

——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体会

杨伟民 (005)

对中国环境法制建设的思考

杨朝飞 (016)

• 国际经济 •

中国软件出口的现状、趋势及“十三五”战略思路

王晓红 艾 冰 (031)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 GDP 增长的影响

田惠敏 刘 江 (051)

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国家战略研究

李罗莎 (067)

• 产业发展 •

进一步拓展农村市场的政策建议

元利兴 詹 琳 聂振邦 (080)

• 名人观察 •

纵论中国经济十年之痒

樊 纲 (094)

发电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张廷克 (099)

药品审评审批改革新举措

吴 涪 (101)

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心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博看期刊网收录期刊 中文知识网

• 智库信息 •

以全面深化改革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

——《发展和改革蓝皮书 No. 7》首发式暨“确保全面深化改革落地生根”研讨会综述

杜树雷 孙凤仪 王再文 (103)

推动智库期刊转型，促进学术期刊发展

马博飞 (110)

为中国对外开放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而奋斗终生

——深切追思著名专家王子先

李 蕊 (112)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19)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25)



CONTENTS

The action programme for building a moderately well – off society in all aspects
Yang Weimin (005)

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s environmental legal system
Yang Chaofei (016)

The status and trend of Chinese software export and its strategy during the 13th
Five – Year period
Wang Xiaohong and Ai Bing (031)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China’ s GDP growth
Tian Huimin and Liu Jiang (051)

Study on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western front of China, Mongolia and Russia
economic corridor
Li Luosha (067)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further expand the rural market
Yuan Lixing , Zhan Lin and Nie Zhenbang (080)

On the ten – year – itch of China’ s economy
Fan Gang (094)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power generation industry
Zhang Tingke (099)

New measures for reforming the drug review and approval
Wu Zhen (101)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to boost China’ 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Du Shulei , Sun Fengyi and Wang Zaiwen (103)

Pushing forward transformation of the think – tank journal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journals
Ma Bofei (110)

Struggling for life for China’ s opening – up theories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Li Rui (112)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19)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5)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行动纲领

——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体会

杨伟民

摘要：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国内“三期叠加”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十二五”规划目标胜利实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十三五”时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我们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全面小康的科学内涵，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确保“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为实现“十三五”规划提供坚强保证。

关键词：全面小康 五大理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党的领导

作者简介：杨伟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学习好《建议》，要把握《建议》的精神实质，深入领会《建议》提出的目标、理念、任务、举措。

一、《建议》的定位和特点

“十三五”规划是我国发展关键阶段制定的关键规划。从定位上看，“十三五”规划对应“两个时期”，体现了“两大定位”：第一，“十三五”时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十三五”规划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规划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行动纲领。第二，“十三五”时期，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是我国经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的窗口期。“十三五”规划是我国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行动指南。

《建议》围绕这两大定位展开，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第一，理念引领。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用新的理念去寻找新的思路、走新的路径。《建议》提出的五大理念是我们党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是“十三五”规划的灵魂，是我国发展经验的概括和总结，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是《建议》的最大亮点。第二，问题导向。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既要实现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既定目标，又要着力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既要解决全面小康中的“短板”，又要解决事关后小康时代长远发展的后劲问题。第三，措施精准。坚持思想性、战略性与操作性、约束性相结合，既有思路性、战略性的引领，也有很多可以直接落地的重大举措。《建议》中共提出了 300 项重要举措，其中约 50 项是有关全新的重大战略、工程、计划、制度、行动的。第四，改革精神。注重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在三中、四中全会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新的改革举措和要建立的新制度，全篇贯彻了改革创新精神。第五，党的领导。六大原则中有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历次五年规划建议没有过的，用专章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实现“十三五”规划提供坚强保证，提出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体制机制，要求制定“十三五”规划纲要、专项规划，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各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制定本地区“十三五”规划。

二、“十二五”时期成绩和“十三五”时期形势

（一）“十二五”是很不平凡的五年

“十二五”期间，面临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国内“三期叠加”的背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十二五”规划目标胜利实现。

第一，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约 7.8%，总量达

到 67.7 万亿元，人均 GDP 达到 7924 美元。“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25%，对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第二，经济结构优化。服务业占 GDP 比重从 44.2% 提高到 50.5%，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工业比重提高到 14.8%。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56.1%，城镇常住人口达到 7.7 亿人，比 2010 年增加了一亿人。农业连续增产，粮食产量从 1.09 万亿斤增加到 1.24 万亿斤，实现“12 连增”。第三，基础设施水平全面跃升。铁路营业里程从 2010 年的 8.6 万公里增加到 12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从 0.75 万公里增加到 1.9 万公里，占全球的 60% 以上。第四，一批重大科技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研发经费投入占 GDP 比重从 2010 年的 1.73% 提高到 2.1%，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6.3 件，超级计算、探月工程、卫星应用等重大科研项目取得新突破。第五，人民生活水平加快提高。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8.9%，其中，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 7.7%、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长 9.6%。农村贫困人口由 1.66 亿人减少到 0.6 亿人左右。第六，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覆盖面持续扩大。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全民基本医保制度框架已经建成，三项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的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 380 元，城乡居民大病保险、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全面推开；保障性住房大幅增加。第七，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布局，出台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形成发展和改革组合拳。单位 GDP 能耗、水耗分别累计下降 18.2% 和 35%；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累计下降 12.9%、13%、18%、18.6%，均超额实现“十二五”规划确定的目标。第八，全面深化改革有力推进。出台了一批改革方案，简政放权力度空前加大，中央投资核准事项精简了 76%，工商登记前置审批项目减少了 85%。价格管控进一步放宽，政府定价项目减少 80%。第九，对外开放不断深入。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主要对外投资大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由 2.97 万亿美元上升到约 3.96 万亿美元，2015 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 1263 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 1180 亿美元。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进展顺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丝路基金实质性运作。与此同时，人民民主不断扩大，依法治国开启新征程，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进展，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强军新军迈出新步伐，从严治党开创新局面。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尤为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三个规律”的认识，形成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

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二）“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

综合判断“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国际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总体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我国发展具有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从国内看，我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本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第二，战略机遇期内涵发生深刻变化。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增长减速，我们利用世界经济较快增长机会加快自身发展的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国际贸易增长大幅降低，我们利用国际市场扩张增加出口的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出现新情况，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盛行，我们利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原有比较优势的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国际经贸规则面临调整，我们利用原有规则招商引资、促进发展的条件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必须抓住战略机遇期内涵变化带来的新机遇，加快转方式、调结构。第三，我国发展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矛盾仍然突出，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企业效益下滑；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收入差距较大，人口老龄化加快，消除贫困任务艰巨等。从当前看，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是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工业品价格下降，并导致实体企业盈利下降和财政收入增幅下降，使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突出问题，必须通过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

三、“十三五”规划的目标和理念

（一）正确理解和把握全面小康的科学内涵

“十三五”规划的目标，都是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总目标展开的。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到 20 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2002 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十三五”规划《建议》进一步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这个目标描述的情景是：

第一，全面小康社会是五位一体全面进步的社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目标，不能单纯理解成经济发展。“全面”，覆盖的领域包括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法治更加健全、文化更加繁荣进步、社会更加

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生态环境得到总体改善的社会。

第二，全面小康是惠及全体人民的社会。全面小康覆盖的人口要全面，因为我们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一个执政思想，作为规划坚持的六大原则之首，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我们要建成的小康一定是要惠及所有不同收入的人口、所有区域的人口、所有民族的人口，一个民族、一个人也不能掉队。

第三，全面小康是介于温饱和富裕之间的社会。全面小康放到国家发展的意义看，总体上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的范畴，到 2020 年实现目标后，届时我国的人均 GDP 可能超过一万美元，但也不是高收入国家，实现小康不会改变我国发展中大国的地位。就居民收入的结构看，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会大幅提高，但低收入群体还会占相当大的比重。

第四，全面小康是不一样的小康。尽管我们要尽力解决发展不全面、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但绝不意味着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13 多亿人口、每个人的生活状态、每个地区的发展水平都一个样，更不是各个地区的人均 GDP、城乡居民收入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平衡总是相对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而且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生活成本不同，特别是房价不同，硬是按照本地区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去倒推，要求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居民收入达到同样水平，既不现实，也不合理。

第五，全面小康是各地区发展速度不同的小康。党的十八大提出，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 2020 年 GDP 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建议》重申了这一目标。十年翻番，意味着十年年均增长速度是 7.2%。这一目标是就全国而言的，不是每个地区都要保持和全国一样的增长速度，城乡居民收入也不是都要一样，有些地区可能高一些，有些地区可能低一些。

（二）“十三五”时期五大发展理念

《建议》提出，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提出这五大理念，有一个基本逻辑，即：第一，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既定的、不能改变、必须完成、没有退路的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五”规划的各项内容必须围绕实现这个既定目标来制定。第二，目标是既定的，但形势是变化的。“十三五”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有许多新变化，这是客观的、无法改变的。现在以及未来五年我国的发展环境和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的十六大时相比、甚至同三年前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相比，都有了不小的变化。第三，不能变的既定目标碰上变化了的环境，怎么办？近两年经济运行情形告诉我们，旧常态下的发展路径、

发展方式已经走不下去了。同时，未来几年世界经济环境也和“十二五”期间有很大不同。要引领新常态，就要在理念上破题，确立了新的发展理念，确定了新的发展路径，才能确保既定目标的实现。

五大理念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路径是：

第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基点要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这主要是针对要素驱动发展的动力明显减弱、新的增长动力还不强、改革作为最大动力还有待充分发挥等问题提出的。新常态的一个特征是新旧增长动力青黄不接，新的增长动力尚未成为带动增长的主动力。创新包括的涵义很广，就经济增长的动力而言，重要的是科技创新，促进创新成果产业化、商业化，形成新的增长点。推进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物流链创新，形成更多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创新既要注意培育新动力，还要激活老动力，注意推进传统产业再创新，只有落后的技术，没有落后的产业。要通过创新和设备更新，实现产品、技术、工艺、管理、能耗、排放、品牌价值的全面提升。特别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

第二，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就是要增强发展协调性，坚持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这主要是针对发展不协调、不全面的问题，重点是补齐“短板”。发展的协调问题，不是新问题，但在新常态下有新的表现和新的要求，如城乡和区域的协调发展，要正确理解、正确看待，不是各地区、城乡之间的 GDP、增长速度、收入水平都一个样是协调，也不是不管经济发展和财力水平，一味地提高福利待遇、增加免费午餐就是经济和社会协调了。如促进区域协调，要在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同时，重点实施区域发展新的三大战略，促进新的大城市群崛起，引导形成若干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增长极。我国有 13 亿多人口，只有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是不够的，要在优化开发上述城市群的同时，推动形成一批新的城市群。其中，东北地区、中原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游，各自都有一亿左右人口的大市场，有条件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新城市群。这样，一方面可避免经济和人口过度集中于原有三大城市群，另一方面将有力带动广大中西部地区发展。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一方面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另一方面，重点是城镇化。《建议》在总结“十二五”时，用的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而在目标中，用的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有很深的涵义，就是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有能

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这个问题，不仅在供给侧，关系着未来“谁来务工”和人工成本等问题，而且在需求侧，关系着消费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等问题。况且，这个问题既有利于稳定增长，又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是全面小康社会惠及更多人口的内在要求。

第三，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就是要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绿色发展本质上是处理发展与保护、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新常态下形成新的增长动力的一个重要方向。新常态下的发展，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无节制单向索取自然，转向有度有序利用自然。绿色发展，近期可以培育新的增长动力，远期则决定我国发展是否可持续、中华民族发展是否能永续的大问题。“十三五”规划中绿色发展的内容是历次五年规划中内容最多、涉及领域最广的。工业文明时代的发展经济学是比较明确的、发展内容总体上也是清晰的，但生态文明时代的发展经济学还在探索中，生态文明的发展是什么、如何发展，没有现成的教科书。从党的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进行了积极探索，这次形成六大领域的绿色发展体系，有很多首次提出的新亮点、新措施、新制度。

第四，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新常态下，对外开放也要有新的思路和举措。我国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增大，再用旧常态下的单纯扩大出口、招商引资的扩大开放已经不适应新常态了。要以全球视野和更加开放的胸怀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互利共赢中发展自己，也带动世界的发展。因此，《建议》提出要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第五，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共享反映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也是针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部分群体民生改善面临特殊难题，发展共享程度有待提高等问题提出的。《建议》提出“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16字方针是十分重要的。坚守底线，就是要坚守“两个基本”，即基本民生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这是政府要承担的责任。这次定义了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即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环境保护。突

出重点，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领域上，如教育、医疗、就业和收入分配是重点。二是人群方面，重中之重是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同时，加强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帮扶，处理好普遍提高民生和针对不同群体实行针对性措施的关系；对城市低保人口、老年人口、农民工、在特大城市就业的其他常住人口、残疾人口要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帮扶。三是区域方面，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是重点。完善制度，主要是讲要注重建立民生保障和改善方面的制度，要花钱买制度，仅仅是撒钱、没有制度，最终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要加快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能由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的，政府不再直接承办；能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引导预期，就是要人人参与小康社会建设，人人在小康社会建设中尽力，最后才能实现小康社会的成果人人享有，所以共享不是坐等享受发展成果。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关系，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改善民生，同时民生改善也不能脱离经济发展，否则会过度抬高发展成本，最终民生保障也是不可持续的。

（三）“十三五”时期的发展主线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已经明确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这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总体思路是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当前，重点是抓好“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四、“十三五”时期的任务和举措

（一）坚持创新发展，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创新发展的主要任务。一是培育发展新动力。主要是发挥三个作用：即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投资对增长的关键作用、出口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二是拓展发展新空间。主要是拓展五个空间：即区域发展空间、产业发展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空间、网络经济空间、蓝色经济空间。三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包括重视颠覆性技术创新，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

作用，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等。四是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五是构建产业新体系，建设制造强国，支持企业瞄准国际同行业标杆推进技术改造，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六是构建发展新体制。重点是推进国企、财税、金融三项改革。七是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

创新发展的新举措。包括优进优出战略、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工程、工业强基工程、智能制造工程，“互联网+”行动计划，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巨灾保险制度、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质量品牌提升行动、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等。

（二）坚持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

协调发展的主要任务。一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在继续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同时，实施新的三大战略：即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二是推动城乡协调发展，重点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三是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主要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体育事业，推广全民健身等。四是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协调发展的新举措。包括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中华典籍整理工程、网络内容建设工程、居住证制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等。

（三）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

绿色发展的主要任务。一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要是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支持绿色清洁生产，发展绿色金融等。二是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主要是发挥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的作用，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建立空间治理体系。三是推动低碳循环发展，主要是推进能源革命，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推进交通运输低碳发展，主动控制碳排放，加强高能耗行业能耗管控等。四是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提出能源、水、土地等各类资源节约利用的方向。五是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提出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改革环境治理基础制度，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等。六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全面提升森林、河湖、湿地、草原、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包括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扩大退耕还林还草、加强水生

态保护等。

绿色发展的新举措。包括濒危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雨洪资源利用、再生水利用、海水淡化工程，新能源汽车推广计划、循环发展引领计划、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能效、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蓝色海湾整治行动等。

（四）坚持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

开放发展的主要任务。一是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主要是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加快对外贸易优化升级，实行积极的进口政策，完善投资布局，放宽准入限制，积极有效引进境外资金和先进技术等。二是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包括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推动同更多国家签署高标准双边投资协定等。三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重点是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大通道建设，共建境外产业集聚区，推动建立当地产业体系，广泛开展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卫生、环保等领域合作，造福当地民众，加强同国际金融机构合作等。四是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五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主要是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与完善，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支持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等。六是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落实减排承诺，扩大对外援助规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免费的人力资源、发展规划、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咨询、培训，扩大科技教育、医疗卫生、防灾减灾、环境治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减贫等领域对外合作和援助，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力度，主动参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

开放发展的新举措。包括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等。

（五）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

共享发展的主要任务：一是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加强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二是实施脱贫攻坚工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因人因地施策，提高扶贫实效。三是提高教育质量，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化教育改革，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四是促进就业创业，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五是缩小收入差距，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六是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坚持精算平衡，完善筹资机制，分清政府、企业、个人等的责任。七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行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推进医药分开，实行分级诊疗，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八是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共享发展的新举措：包括食品安全战略，脱贫攻坚工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全民参保计划，对贫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贫困家庭子女、未升学初高中毕业生、农民工、失业人员和转岗职工、退役军人免费接受职业培训行动，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等。

《建议》最后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通过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体制机制、动员人民群众团结奋斗、加快建设人才强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确保“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等，为实现“十三五”规划提供坚强保证。

责任编辑：艾 冰

对中国环境法制建设的思考

杨朝飞

摘要：新《环境保护法》取得了五个方面的制度创新，建立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责任制度，完善解决违法成本低的监管制度，为制定破解资源低价、环境廉价问题的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完善环保社会治理体系，依靠技术创新解决环境问题。然而环境法制建设仍面临诸多艰难的挑战：一是严峻环境形势的巨大压力，二是环境群体性事件高发的巨大压力，三是环境公平失衡的巨大压力，四是环境法规自身不完善的巨大压力。改革环境法制未来的八大政策走向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区分两种性质不同的排污行为，一次性清理环评监管的历史遗留问题，严格追究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建立重污染企业退出机制，转变环保执法意识和执法方式，在法制精神和市场机制基础之上建立多样化的环境风险预防、赔偿和修复资金机制，借鉴适合国情的国际经验。

关键词：环境保护法 制度 政策

作者简介：杨朝飞，环境保护部原总工程师、中国工业环保促进会会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新《环境保护法》的发布与实施是中国环境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新《环境保护法》的诞生，既大大推动中国环境法制建设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又为环境法制建设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本文将从新《环境保护法》的制度贯彻与创新、环境法制面临的严峻挑战、环境法制建设的未来政策走向三个方面谈谈对环境法制建设的思考。

一、新《环境保护法》的制度贯彻与创新

新《环境保护法》的显著进展在于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明确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二是在较大程度上解决了违法成本低的问题；三是为制定破解资源低价、环境廉价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四是进一步完善了环保社会治理体系；五是依靠技术创新解决环境问题。

（一）明确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制度

新《环境保护法》提出了“地方各级政府对辖区环境质量负责”，要求加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实行环保目标责任制和考核制度，同时要求政府向人大报告，依法接受监督。其中，新《环境保护法》要求政府向人大的报告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报告当地环境质量变化情况；二是报告一年来发生的环境重大事件，如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故和群体性事件等；三是报告一年来的环保工作等。此外，要求政府应接受有关个人和社会组织的监督，还规定对渎职、不作为的政府官员依法追究责任。2015 年环保部相继约谈临沂、承德、沧州、保定、驻马店、郑州、无锡、南阳等 20 多个城市的政府主要负责人，2016 年初又约谈了河北省委、省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其中，临沂市政府被约谈后实行了铁腕治污，截至 2015 年 7 月初，临沂市政府对 13 家企业共立案 28 起，处以 244 万元罚款，九名企业负责人被行政拘留；对 57 家企业实施停产整顿，恢复生产 31 家，26 家依然停产；对全市 412 家企业实施限期治理，305 家完成整改，78 家转为停产整治，29 家关闭搬迁。2015 年 3 月—6 月与上年度同期相比，PM_{2.5} 下降了 27.8%，PM₁₀ 下降了 23.5%，二氧化硫下降了 41.4%，二氧化氮下降了 25.4%，优良天数增幅达到 25.4%，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二）进一步完善解决违法成本低的监管制度

新《环境保护法》有以下几个规定十分重要：凡造成环境损害的必须要承担环境侵权责任；违法排污、拒不改正的要按日计罚；处罚原则包括“高于治污成本”“赔偿损害”“没收违法所得”三方面内容；对双超（超标和超总量排污）企业可责令限产、停产或停业、关闭，还可以查封扣押造成严重污染的设施、设备；对主观故意的环境违法者可处 5~15 日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要铁腕治理”“环保法的执行不是棉花棒，是杀手锏”。据环保部最新消息，2015 年 1 月—6 月全国共检查企业 63 万余家（次），全国实

施按日连续处罚案件 292 件，罚款数额达 2.36 亿元，全国查封扣押案件 1814 件，实施限产、停产案件 1092 件，关停取缔 9325 家企业，移送行政机关拘留 782 起，移送涉嫌污染环境犯罪案件 740 起。环境司法也取得重大突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 18 个省设立了 382 个环保法庭、合议庭或巡回法庭，最高检发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已在 13 个省实行试点，河北唐山公安机关侦办涉及环境污染刑事案件 58 起、刑事拘留 42 人。其中，一起著名的典型案例是江苏省环境公益诉讼天价赔偿第一案，六家化工企业将废酸委托给没资质的皮包公司，后者在一年内向河流倾倒两万多吨废酸，泰兴市法院判决追究 14 名肇事者 2~5 年刑事责任，其中两名办事人员因渎职被判刑，对肇事者个人处罚金 16 万~41 万元，追究六家企业 1.6 亿元民事赔偿责任。

（三）为制定破解资源低价、环境廉价问题的政策提供法律依据

具体包括政府要加大环保财政投入，提高资金效益；要采取财政、税收价格、政府采购等政策支持环保技术装备、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服务以及减排等；政府应支持企业为环保的转产、搬迁、关闭等工作；实行排污收费与环保税制度；鼓励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以汽车限行的环境监管为例，世界各国为治理交通拥堵、缓解空气污染，都采取措施对汽车进行了限行，中外措施相同，但是做法却大不相同。国际上的做法通常都是采取经济手段，比如收取排污税（费）、碳税（费）、硫税（费）、燃油税（费）、停车费、拥堵费等；目前中国一些城市的做法通常都是采取行政手段，比如汽车限行、限买、年检、淘汰黄标车等。这二者的本质差异就在于公权力能不能进入私权利的领域，开车是属于私权利的领域，在国外政府通过征收碳费、氮氧化物费等经济手段来管理，主要是为了向社会和公民释放环境保护的信号，鼓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而公民是否开私车是公民私人的选择，不能由政府决定。《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时，曾经有一条规定，“空气污染严重的城市，政府可以决定对汽车限行”，征求意见时社会上对此意见很大，后来对这条做了重大修改。

（四）进一步完善环保社会治理体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一个新的现代化要求，即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在新《环境保护法》中作出了很多明确规定：鼓励公众参与、进行媒体监督、开展环境教育；保障环保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政府和企业都要公开环境信息；完善社会诚信体系，即发布环保违法企业的黑名单制度。

社会治理体系的关键是要完善多元化的治理主体，政府是环境保护治理中的重要主体，但绝不能是唯一的主体。早在 1992 年联合国召开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之后，中国曾

发布了一个重要文件，提出了“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观点，一直影响至今。多年来，政府的环保权利被大大强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实践证明，仅仅靠政府是不够的，还需要企业、公众、社会组织、司法机关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首先要充分肯定企业的主体地位。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又是产生污染的主体，同时也是治理污染的主体。第二就是公众的作用，公众的力量是巨大的。第三就是社会组织的作用。在国外，许多环境监管主要是依靠社会组织完成的，它可以监管企业的排污行为，向社会发布环境信息；可以帮助污染受害者打官司，维护公民权益；可以帮助企业寻找治理技术，推动污染治理；可以帮助政府制定政策规范，强化环境监管。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重要的国际环境法律，都是由环保社会组织调研起草的。同时，在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的时候，还可以监督、批评、投诉有关政府部门或官员。垃圾分类是解决垃圾污染的一个重要前提，但是很多城市垃圾分类试点都以失败告终，花费了许多投资，却没有很好地实现垃圾分类的目标。这里有一个小的成功案例：上海北尚区依靠企业、社会组织组建垃圾分类站，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在站点或是上门分类收取垃圾，对可利用的垃圾进行现场计价，确定奖励金额计入爱心积分；对没有分类的垃圾，工作人员主动引导，同样给予奖励；奖励金额统一转账或绑定市民银行卡，市民可凭此在服务站购买优质健康的日常物品。另外，社会体系还要求建立对话协商机制，具体包括信息公开，畅通诉求渠道；政府出台的法律法规标准要召开听证会；重大的环境问题要召开圆桌会议，利益相关方多多参与进来；企业和污染受害者要进行对话协商、第三方协商等等。

（五）依靠技术创新解决环境问题

以节约能源为例：一方面，当前大气污染日益严重，城市热源日益紧张，热网输送能力成为瓶颈；另一方面，城市集中供热节能潜力巨大。据专家测算，燃煤电厂 50% 以上的余热可以回收，燃煤热电厂 30% 以上的余热可以回收，燃气热电厂 40% 以上的余热可以回收。清华大学有一个吸收式换热技术，可以实现三个目标，将供热能力提高 30%、供热能耗降低 40%、热网输送能力提高 50%，技术的环境、资源、能源效果显著。水污染治理也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和技术升级，中国年排放污水 600 多亿吨，其中 80 亿立方米的甲烷气、280 万吨氮资源、60 万吨磷资源、100 万吨硫资源、570 万吨有机肥、360 亿吨水资源可以回收利用，潜在的经济价值是 2280 亿元。现在中国的环境监管制度还是以推动末端治理为主，也就是说许多资源都被当作污染物排放了，而没有回收利用，最后花钱处理，不仅浪费资源、能源，治理成本还很高。如果依靠技术创新，把浪费的资源回收了，

环境压力大为减轻，污水处理和脱硫、脱硝的成本也会大幅下降。中国现在是世界光伏发电专利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光伏发电效率最高的国家，连续三年世界前六名的光伏发电企业都是中国企业。光伏发电成本逐年降低，现在新建筑安装后 5~6 年可以收回成本，老建筑 8~10 年可以收回成本。光伏发电现在可以做到一年收回多晶硅生产的全部用电量。专家预测到 2025 年太阳能发电成本将低于煤炭，如果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中国的治霾目标就可能提前实现。

二、环境法制建设仍然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

（一）环境法制建设面临严峻环境形势的巨大压力

当前的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环境问题呈现六大发展态势：环境质量呈现持续退化、环境重大事故依然高发、环境潜在风险不断增加、民众环境诉求趋于强烈、环境公平失衡日益突出、环境压力仍在继续加大。人们对环境形势的判断存在较大争论：有的人对环境形势非常乐观，认为我们水环境在改善、大气环境在改善；有的人认为环境形势不仅非常严峻，而且趋于加重。几十年来，中国环保工作的着眼点基本上就是全力以赴控制重点污染物，“十一五”是两个指标，“十二五”是四个指标，即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其他的污染物基本上没有控制。只是到了前几年，由于血铅、血镉事件多发，在中央领导的多次批示下，才对重金属污染进行控制。据报导，中国的一些大江大河已经检测出激素、抗生素等污染物，这在许多国家的水体中都是不允许检测出来的指标。还有专家在中国一些重要流域的水体中，检测出几百种有害化学物质，一些地方甚至成为了癌症村。另外，中国突发性的重特大环境事故屡有发生，例如 2015 年天津港化学品仓库爆炸事故、福建漳州二甲苯（PX）项目爆炸事故、南京石化企业爆炸事故等，都对人们的生存环境、工作环境形成了严重威胁。一些事故对饮用水造成了严重污染，如 2015 年兰州市、武汉市的饮用水先后受到污染等环境事件，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

（二）环境法制面临环境群体性事件高发的巨大压力

2014 年茂名群众反对 PX 项目、杭州群众反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2015 年 5 月上海金山群众反对 PX 项目等典型环境群体性事件高发。有专家们指出，PX 项目没污染、轻污染或是污染可控，经济效果和技术性能都非常好，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也需要建设 PX 项目，而且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在发展 PX 项目。笔者认为，诱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根源并不简单，主要总结为以下四点。

1. 企业的内部管理问题。当前中国的环境污染事故高发，一些中小突发性污染事故大多是由技术落后的小型企业引发的，而那些特大、重大的突发性污染事故往往都是由技术先进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引发的。在此，技术的先进与否并不是第一位原因，第一位原因主要是企业内部管理不善、管理不严。如 2015 年爆炸的漳州 PX 生产企业技术非常先进，2005 年引发松花江污染事件的苯胺生产车间技术也非常先进，依然发生了爆炸，如果企业管理滞后，迟早会发生事故。因此，在中国技术的确很重要，但企业内部管理更加重要。现在公众不是不相信企业技术的先进性，而是担心即使再先进的技术，由于企业管理不善也会发生重大污染事故。

2. 政府的监管问题。现在一提到群体性事件，就有人批评群众落后、愚昧无知，其实普及科学知识固然重要，但政府的监管更重要。许多地方政府的主业就是招商引资，把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摆在了政府工作的首要位置。政府引来了企业又不愿监管，担心监管太严增加企业负担、减少企业活力，GDP 和税收就都没了。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对这些引进来的企业往往疏于管理，用宽松监管作为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似乎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企业管理不善，再加上政府疏于管理，势必污染事故高发，这也是政府公信力低下的主要原因，群众认为政府没有坐在该坐的板凳上，而是坐在了 GDP 至上的板凳上，群众缺乏安全感。

3. 社会利益调整的问题。一个新的政策或新的建设项目，不管多么重要和必要，一旦实施都会对现有利益格局形成新的冲击，势必有人欢喜有人愁，利益受损的人会奋起反对。所以问题的关键点还是利益调整，而不只是觉悟问题。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北京要建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焚烧场建在谁家门口谁都不愿意。因为垃圾焚烧厂在施工建设期，施工和交通的噪声污染、施工和道路的扬尘污染、汽车尾气污染、交通堵塞等问题都会明显加重。另一方面，垃圾焚烧厂建成之后的运营投产期，也存在着企业能否依照规定的要求运营、政府能否确保监管到位等问题。如，企业垃圾焚烧的温度能否稳定控制在 800 度以上，否则就会产生二恶英等强致癌物质，所以新建一个项目肯定是对当地群众利益一次新的冲击。对利益问题只能通过利益补偿去解决，而不能靠行政命令去压制。

4. 社会治理方式和治理思维的问题。在当前的诸多群体性事件中，都涉及到相关治理主体的关系与地位问题，包括利益相关方的群众是否享有利益诉求表达的权利和渠道、是否享有及时准确了解政府和企业相关信息的权利、是否平等享有参与项目论证和决策的权利，这些都是属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与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复杂问题。相关信息不透明，诉求渠道不畅通，利益相关方的群众与政府、企业缺乏平等的对话机制，正是群

体性事件高发、政府公信力低下的主要原因。

（三）环境法制面临环境公平失衡的巨大压力

在中国环境公平失衡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超过了环境污染本身，是一个更为严峻的灾难性问题，也是“十三五”应当优先解决的重大问题。环境公平失衡表现为：享受发展成果的人并没有承担环境损害带来的沉重代价；而承担环境损害代价的人却也没有很好享受发展的成果，由此带来了环境公平失衡的严重社会问题。环境公平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区域之间的环境公平失衡问题趋于加重的态势。比如一条江河的上游多工厂且排污，当地经济发展、税收增加，下游却承担了环境污染的代价，下游想治理污染，但解决不了饮水安全问题。例如，某省一江河流经省内最大的三个城市，但是各市县在江河干流同时设立了 30 多个取水口和 40 多个排污口，每一个城市城镇都把自己的取水口放在自己的上游，把自己的排污口放在自己的下游，作为一个城市来讲非常合理，但是作为一个流域来讲就不合理。当一个城市想改善自身的饮用水安全问题，不能跑到上游去治污，尽管当地污染治理得再好，享受到饮水安全的是下游城市而不是自身，因此这种区域性的环境不公平问题现在已经越来越突出，几乎在中国大大小小的诸多流域都存在同样的问题。

2. 排污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环境失衡问题更加突出。污染企业致富的捷径就是将治污成本外部化，他们赚了钱，却把污染留在当地。所有的有钱人都不会住在污染严重的地方，他们会到县城或者地级市、省会，甚至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去买房，他们可以选环境优美安全的地方等等。但当地污染的受害农民却没有这种选择权，当地就是他们的家，家乡被污染后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只能在受污染的家乡继续生存、工作，喝受污染的水、呼吸受污染的空气。因此，现在排污者和受害者之间的环境失衡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了。

3. 排污者之间的环境公平失衡问题不容忽视。现在的环境执法还没有达到全覆盖。一些企业排污后就被罚款、限期治理，现在又要按日计罚，处罚越来越重；而另一些企业同样排污，执法部门却缺乏监管，因此这些企业就可以敞开排污将治污成本外部化。其结果是，一方面治理污染的企业成本接连攀升，另一方面排污企业的生产成本依然廉价。在市场上，两家企业就不在一条起跑线上竞争，治污企业竞争不过排污企业，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执法还不能做到对所有排污企业都同样依法行政、依法处罚，因此就出现了不公平现象。而且现在是多数企业排污没有受到处罚，受处罚的企业仍然是少数，这种

不公平的问题就更加突出。运动式的环保执法中看不中用，表面轰轰烈烈，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而且运动式的执法往往都是要从严、从快、从重处理一批企业和个人，被处理的仅仅是排污企业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企业还是没有受到应有查处，因此在排污企业之间也造成了很大的不公平。

4. 享受新建项目发展成果不对称带来的社会不公平问题非常普遍。建垃圾焚烧场和PX项目都会导致周边群众切身利益受损，对于一个城市来讲，由于增加税收带来的好处、由于治理污染带来的好处是全市享有的，而项目施工带来的空气污染、噪声污染、交通拥堵以及项目建成投产后带来的污染却是由当地人承担。如果该项目发生爆炸或者企业偷排，受害的更是周边地区的群众。因此，这些环境公平失衡的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百姓的怨言和诉求也越来越强烈。

（四）环境法制建设本身也面临巨大挑战

环境法制建设本身面临巨大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1. 面临“法不责众”的挑战。新《环境保护法》颁布以后，大家都在争论它能不能解决“法不责众”的问题。笔者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法律都难以单枪匹马地解决“法不责众”的问题。严格的法律法规，只是通过对少数违法者的处罚，来达到对多数人的警示。如果一个社会多数人都在违法，那就不是这个法律法规出了问题，而是社会出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这时仅仅依靠加强单项法律法规是无济于事的。

2. 面临一些重大执法遗留问题的挑战。例如，2008年为了拉动经济投放了四万亿元资金，与此同时政府监管大大放松、放宽。据统计，河北新上的钢铁企业80%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按照新《环境保护法》规定，这些未批先建的企业都应关闭而不是补办手续。但关闭这么多企业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是贯彻新《环境保护法》不能回避的。

3. 面临环境执法一刀切弊端的挑战。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长期以来企业超标排污和超总量排污现象普遍存在，超标排污和超总量排污又被法律规定为违法行为，因此也被当作环境执法重点打击的对象。现在污染严重和污染不严重的、主观故意和非主观故意的排污行为，都被一刀切地严格查处、严厉打击，这不利于健全环境法制、制止违法排污，也不利于改善环境质量。

4. 面临违法成本低和守法成本高问题的挑战。解决违法成本低是环境法制建设面临的长期挑战。这既有立法不足的问题，也有行政执法、司法不到位的问题。新《环境保护法》已经较大幅度地提高了违法成本，但是仍然存在差距。例如，《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违反环评规定擅自开工建设的，要求限期补办环评手续，逾期不办的才能给予20

万元以下的罚款。2011 年 6 月，哈药集团被披露多种环境违法问题：恶臭气体排放大大超过国家标准，硫化氢气体超标近千倍，氨气超标 20 倍；污水排放超过国家标准，氨氮超标两倍多，化学需氧量（COD）超标近十倍。但该企业仅受到 123 万元罚款，而它当年 GDP 为 123 亿元。

5. 面临环境案件举证、立案、审理难问题的挑战。中国环境资源案件数量较多，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环境民事案件数量却很少，许多重大环境污染纠纷未能进入诉讼程序。据调查，真正通过司法诉讼渠道解决的环境纠纷不足 1%。一方面，群众遇到环境纠纷，宁愿选择信访或举报投诉等途径解决，而不选择司法途径；另一方面，司法部门也不愿意受理环境纠纷案件。“十一五”期间，中国环保系统受理环境信访 30 多万件，行政复议 2614 件；而相比之下，行政诉讼只有 980 件，刑事诉讼只有 30 件。2003 年—2008 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环境资源案件中民事案件 12278 件，仅占同期审结民事案件总数的 0.04%。在环境污染损害纠纷的处理中，由于缺乏具体可操作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技术规范和管理机制，致使经济损失和人身伤害难以量化、污染损害因果关系难以判断、环境损害赔偿标准难以认定。许多污染案件久拖不决、历时数年，当事人的诉讼成本高昂，污染受害人也往往得不到损害赔偿。

6. 面临环保法与物权法相冲突的挑战。多年来，关停污染企业被当作解决环境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实施这项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污染的压力。但是关停污染企业之后带来的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却被我们忽视了。应当认识到关闭一个国有企业势必导致大批国有资产流失，关闭一个民营企业势必导致许多个人财富大量流失，甚至导致许多已经脱贫的地方和个人又重新返贫。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环境执法曾经关闭了 16 万多个污染严重的小企业，而这些企业大都是农民自己凑钱、借钱筹建的，这些污染企业凝聚了社会中下层群众一生的血汗。如果现在又以环保的名义将它们关闭，农民借的钱都打水漂了，个人财富严重流失，个人借贷无法归还，商业银行增加了许多死账呆账。污染企业的债权追不回来，因为它的合同没有履行完，即使已经交付 90% 的货物了，要求先支付 90% 的货款，对方也不会同意，因为合同没有履行完毕；再就是业主的债务也无法追回。经济合同面临违约赔偿，生产资料造成浪费，另外就是造成了许多就业、返贫、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问题。前文所提到的临沂，从正面来讲，被约谈之后治污效果很明显；从负面来讲，临沂关闭污染也承担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大体上该市为此减少了十亿元的税收，降低了 100 亿元的 GDP 增速，影响了 1000 亿元的资金链。所以笔者认为，环保执法不仅要严格执行新《环境保护法》，而且还要自觉遵守《物权法》。

7. 面临新《环境保护法》一些条款难以落实的挑战。新《环境保护法》第 41 条规

定，企业的治污设施“不得擅自拆除或闲置”。现在工业技术更新得非常快，有时候一个技术的变革或者原材料改变，污染问题马上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有的治污设施完全可以由企业自主拆除。这时候还要求企业给环保部门打报告，环保部门如果不能很快批准报告，企业还得保证设施空转。这条规定可能难以落实。第 59 条规定，违法排污被罚款仍拒不改正的，可按日计罚。这条规定很严厉，一位钢铁业的专家指出，目前中国有 95% 的钢铁企业，按严格的环境标准是不达标的，严格按日计罚的话，只能是法不责众了。第 60 条规定，超标或超总量排污的，可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这个规定现在也不能普遍做到。第 61 条规定，环评文件未经批准、擅自开工的，可责令停止建设，处以罚款并责令恢复原状。这与《环境影响评价法》不一样，该法规定没有通过环评审批的要责令改正，补办环评手续，补办后就成为合法的项目了，可以恢复生产。新《环境保护法》规定，对未批先建的在处以罚款之后要责令恢复原状，不存在补办环评手续的问题。面对众多历史遗留问题，执行新《环境保护法》的难度是巨大的。

三、中国环境法制建设的未来政策走向

中国环境法制建设的政策走向必须要围绕解决上述压力和挑战。应当强调两个哲学的理念，一是我们不能用产生问题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即我们现在出现的很多环境问题，都是某种工作方式的必然产物，现在如果还用产生问题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一些问题可能容易解决，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甚至会产生更多问题；二是有一些错误的东西时间久了，人们就习以为常了，许多错误的东西常常被当成了正确的东西去坚持，坚持的结果是问题将会愈演愈烈。

在环保领域有三个问题应该引起重视：一是重治标、轻治本。一位英国专家针对中国的环境保护指出：“一些治标措施即使效果再好，因为它对远期治理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建议你们最好不要采用。”意思是，如果把治标措施看得太重、投入太多，将来会影响既定目标的实现。所以，不能把治标措施看得太重，因为治标措施的成本也很高，这些对正常治污影响非常大。二是重末端治污、轻源头治污。末端治理固然非常重要，不可或缺，但是仅仅依靠末端治理污染，也不可能改善环境质量，这是世界环境保护的一条基本经验。而目前环境监管的一些措施往往有利于末端治理，不利于源头治理。许多治污设施，如脱硫、脱硝、污水处理等都已经成为高耗能行业，这些措施虽然可治污，但在消耗大量能源的同时，又产生了许多新的污染物。三是急于求成。很多同志一旦坐在领导岗位上，就恨不得在自己任期内，马上实现污染物减排的拐点。治标措施和末端治

污相对见效比较快，因此急功近利和急于求成的人往往都选择了这样的做法，可是到头来环境质量还是下降。这就是多年来的一个沉痛教训，所以急功近利和急于求成是绝对行不通的。基于上述分析，环境法制建设应当以改革为动力，将会出现以下八大政策走向。

（一）转变政府职能

当前，政府工作定位普遍存在三种现象：一是要解决越位问题。许多政府部门手中掌握了很多审批权，一方面自己工作繁忙，另一方面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效率低下。解决越位问题就是减少行政审批、放权企业、增强市场活力。二是要解决错位问题。应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放权社会、增强社会活力。现在很多措施包括立法，都在靠增加政府行政许可，强化行政管制来解决污染。这样做也会取得一定效果，但是当大范围推广时，往往就显得力不从心了。现在应该让社会组织多多介入，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当然这需要循序渐进。三是要解决缺位问题。政府要把自己该干的工作干好，包括制定规划、加强宏观调控、维护市场和社会的秩序，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提供法制保障。这就需要尽快转变政府职能，若政府职能不转变，还是 GDP 为上，那么中国的环境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二）区分两种性质不同的排污行为

具体的排污行为种类繁多，但从本质上看，只有两大类：第一类是主观故意违法排污行为，也可以称为恶意排污行为，包括暗管排污倾倒危废和有毒物质、数据造假、瞒报信息、干扰或暴力抗法等，对这一类的违法行为要严厉打击，毫不手软。这就是我们说违法成本低主要是对主观故意违法、恶意违法，现在打击力度远远不够。另一类是一般性的排污行为，也就是新《环境保护法》讲的双超行为，即超标、超总量排污行为。对这类排污行为不能作为违法行为去严厉打击，而是应该动之以情，发挥企业的主观积极性，让企业以主人翁的身份去治理污染，政府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帮助企业治理污染，实行柔性管理，而不是上面的刚性管理。当然，对可以治理而又不去治理的企业，还是应当给予必要处罚，大多以行政处罚为主。

（三）一次性清理环评监管的历史遗留问题

2008 年—2009 年，为了拉动经济，建设了许多重污染项目，而且大都没有经过依法审批，有关部门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又不能采取一刀切停产恢复原状。为此，应当以 2015 年 1 月 1 日为界，在这之前未批先建的都允许补办环评手续，补办后对治污

措施可以达标排放的都应当放行；对环保措施不能达标的则要求继续改进，直到可以达标排放时再放行；对那些属于技术落后、治理无望的，应当淘汰。也就是说，在两类排污行为中，一方面要把一般性的排污行为从“违法”中解脱出来，这样法不责众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大批；另一方面在新建项目中，凡是新《环境保护法》之前未批先建的，一律允许重新补办环评手续，这样又减少了一大批违法行为。真正严重违法排污的就成为个别少数了，对那些主观故意、情节恶劣的违法行为，就可以放手严厉打击了。

（四）严格追究污染损害赔偿責任

近年来，中国的环保法律取得了很大进步，环保法律法规覆盖面广、内容与时俱进。但是也有两个根本不足：一是缺少约束政府行为的环境政策法律；二是缺少严厉环境责任的法律，像美国的超级基金法、欧盟的环境责任法。

美国超级基金法的实质是要严格追究造成污染损害者的环境责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要求污染损害责任者承担全部费用，除罚款之外，还应包括现场清污的费用、健康损害的费用、个人财产损失的费用、生态恢复的费用以及监测、应急、研究、评估和诉讼等费用。二是要求污染损害责任者承担终身责任，因为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是一个长期的显现过程，鉴定、评估、确责也是一个长期的跟踪过程，因此环境损害赔偿也是一个漫长过程。如日本的水俣病，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今，仍然没有了结，造成污染损害责任者无论如何迁徙、转岗、改头换面，依然继续承担责任。三是要求污染损害的所有相关责任者都必须承担共同责任，造成污染后，不仅企业要赔偿，有关个人也要赔偿，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有关管理人员等都得赔偿。企业污染的厂房、场地等出售后，原来主人的环境责任不会丢失，购买者也有了治污和赔偿的责任，包括赠送、继承、兼并等的双方，都有治污和赔偿的责任。总之，在环境损害赔偿问题上只加不减。四是在必要的情况下，要求污染损害的间接责任者要承担连带责任。因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数额往往非常巨大，当直接责任人赔偿不起的时候，就要追究间接责任人的赔偿责任了。间接责任人包括与污染企业发生过业务关系的银行、保险公司和大股东等。因为这些单位都曾经从企业的发展中获得过好处，如银行获得过贷款利息、保险公司获得过保费、大股东分得过红利等。美国超级基金法颁布之后，一批中小银行、保险公司为此倒闭。所以超级基金法规定，首先追究直接责任者的责任，当直接责任者能够赔偿所有环境损害后，就不再追究间接责任者；当直接责任者已经因为赔偿倾家荡产了，还是赔偿不了全部环境损害，就要追究间接责任人的责任。因此，许多国家在追究环境责任方面都是非常严厉的。

中国目前最缺的就是环境责任立法。例如，甘肃省辉县在 2006 年发生了一次血铅污染事件，350 多个农民血铅超标，其中有 150 多个儿童血铅超标，血铅对儿童的神经发育、骨骼发育和智力发育影响非常大。这个案件很快就处理了，一批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但是老百姓给孩子看病的钱没人出，群众找污染企业，结果污染企业被贴了封条，企业老总被判刑了；环保局长说自己是新来的，原环保局长也被判刑了；县长、书记说，前任已经被撤职、免职了，况且又是贫困县，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没钱治病；最后找到法院，法官说案件情况非常清楚，而且相关证据也很齐全，审理工作比较容易，但即使判决了也无法执行，不仅群众的问题解决不了，法院又增加了一个执行难的问题，所以法院干脆就不受理。类似的案件还有很多，基本都是无解。这类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行的时候了。

（五）建立重污染企业退出机制

对一般排污行为的企业应当建立退出机制，退出不是简单的关闭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退出的形式包括技术升级、兼并重组、企业转产等，这些都可以从源头解决污染问题；再就是企业搬迁、建设治污设施；最后才是关停污染企业，这些都是企业退出的途径。退出机制的工作程序应该是：一是搞调查，调查摸底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企业；二是制定退出规划，明确重污染企业的退出时间；三是事先告知污染企业，然后政府官员与污染企业开展协商对话，签署治污契约；四是政府制定专门的激励政策，包括税收、财政、信贷、土地和就业等鼓励政策，同时还要制定对不能按期完成治污任务企业的处罚措施；五是退出规划和相关政策措施定下来后，要向社会公开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六是按照治理规划分步实施，同时还要跟踪评估，适时适当调整规划。建立退出机制具有深远意义：一是可以避免企业、个人和社会的经济损失；二是可以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三是可以推动企业技术升级，加强源头治污；四是可以建立和完善治污的长效机制，而不是运动式的执法机制；五是可以提高政府公信力和亲和力；六是实现了环境监督管理的精细化和机制化。

（六）转变环保执法意识和执法方式

当前的环境执法是以行政意志和行政管控为主要特征的行政执法，一方面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法制精神；另一方面不仅不能有效控制违法行为的产生，还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为此，必须实行环保执法意识和执法方式的根本转变。一是要从现在的运动式执法转向常态式执法；二是从重点对象执法转向普遍式执法；三是从落实领导批示执法转向为民执法，现在的很多执法搞得热闹，凡是报纸上报道处理特别重的都是在落

实领导批示；四是从污染物总量消减执法转向企业排污达标执法；五是从生硬的高压执法转向人性化执法；六是从随意性、选择性执法转向普适性的公平公正执法；七是从末端排污口监管转向突出源头和过程污染的监管。

（七）在法制精神和市场机制基础之上建立多样化的环境风险预防、赔偿和修复资金机制

当前，中国土壤环境治理和地下水污染治理资金大多以财政投入为主。财政环保投入，一方面资金效率通常比较低下，治理效果不理想；另一方面用全体纳税人的钱为少数排污者买单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公平。参照国际上的一些做法：一是要建立专项环境损害赔偿与修复资金机制。该资金机制一般都是针对突发性的重特大型污染事件或生态破坏事件。如英国石油公司采油平台发生爆炸，泄露大量石油污染了美国的墨西哥湾，随即英国石油公司宣布拿出 200 亿美元建立专项环境损害赔偿基金。二是要建立风险性环境损害赔偿与修复资金机制。该资金机制一般都是针对高环境风险行业而设立的收费或税收机制，收于某一特定行业，又用于这个特定行业。如美国的超级基金，主要是用于高环境风险的石化行业环境事件的清理、修复、赔偿以及相关关联的监测、调查、诉讼等服务性费用。三是要建立社会性环境损害赔偿与修复资金机制。该资金机制一般都是针对历史性、影响面广、较大的环境事件，有政府出资、社会捐助、企业赔偿等，如日本的水俣病赔偿基金等。四是要建立市场性环境损害赔偿与修复资金机制。一方面包括由金融部门主导的资金机制，如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由保险部门收取费用、监督检查、清理现场、赔偿损害等；另一方面是市场自由认购性的资金机制，如对于责任主体不明确、环境修复或生态恢复所需资金量较大且具有增值潜力的损害，可利用环境修复类债券、公私合作模式（PPP）等多渠道绿色金融手段融资。五是要建立政府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对那些责任主体不明确、仍然存在污染损害、环境修复或生态恢复所需资金量较大且不具有增值潜力的损害，国家和地方可以设立政府型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基金。

（八）积极借鉴适合国情的国际经验

一是增加法律政策的透明度，让公众参与环境监管、参与环境政策和法规的制定；二是增加政策、标准、法制和企业利益的相关性联系，国家发布的环境政策和法规一定要对所有企业产生利益影响，要明确引导、激励、制裁的导向机制；三是加强利益相关方的协调沟通，促进污染企业和污染受害者进行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形成治污合力，加快治污进程；四是要在政府、社会、污染企业之间，建立密切、友好、相互信赖的合作伙伴关系。关键是要发挥企业治污的主体作用，政府不能代替企业，环保部门也不能代

替污染企业。企业虽然是排污的主体，但也是发展经济的主体和治理污染的主体，同时企业还是技术进步的主体、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环境损害赔偿的主体、绿色投资的主体、绿色产业发展的主体、绿色供应链的主体。没有企业的自觉参与，工业污染防治到头来只能是一句美丽的空话。当前环保部门有一种情绪，就是认为污染企业可恨，只要抓住就要重罚、狠罚，这是不对的。我们需要消灭环境污染，而不是要消灭污染企业，把企业都消灭了，经济就会随之垮掉，对解决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

环境保护任重道远，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环境法制必须要改革创新。现行的法制体系解决不了中国的环境污染，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与问题。新《环境保护法》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但不足以彻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所以必须要改革创新，以问题为导向，重构环境法制的理念和制度体系，依靠释放改革红利，破除不适当的利益藩篱，走出诸多认识误区，创建更加科学、更加实用、更加可靠的环境监管制度与措施，积极应对环境挑战。

责任编辑：李 蕊、张碧琼

中国软件出口的现状、趋势及 “十三五”战略思路

王晓红 艾 冰

摘要：“十二五”时期，中国软件出口规模扩大，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链向中高端攀升，软件出口企业国际化步伐加快，创新创业能力显著增强，自主知识产权拥有量显著提升，众包、众创推动技术创新与服务模式创新，出口基地城市、软件园区产业聚集效应日益突出。“十三五”时期，“一带一路”战略将拓宽新兴市场发展空间，以网络智能、共创分享为主导的新产业革命将为软件业创新发展带来机遇，新一代信息技术空前发展将为软件出口提供新动能，服务业态创新和传统产业升级将为软件业带来机遇。中国应加快供给侧改革，提升软件业自主创新能力，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形成出口市场多元化格局，建立适应软件业需求的人才引进机制和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制政策环境，提高在国际规则标准制定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关键词：软件出口 现状与趋势 问题与机遇 战略思考

作者简介：王晓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教授；

艾 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全球化》编辑部编辑、高级经济师。

2010年—2014年期间，中国软件出口在全球经济增长低迷、国内要素成本上升的逆境下，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态势。2015年以来，虽然受整体经济贸易环境影响，软件出口开始进入增速放缓区间，但在产品结构、企业结构、区域结构及国际市场结构等方面仍保持优化态势。软件出口产业链继续向中高端攀升，新兴市场出口呈高速增长态势，

软件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内资企业成为软件出口的主导力量，中西部地区出口潜能加快释放。“十三五”时期是中国经济通过创新跨越引领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也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结构性调整的关键时期，这将为软件产业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将全面提升软件出口国际竞争力，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实现软件贸易强国的战略目标提供新动能。

一、中国软件出口现状及特点

（一）软件出口规模扩大，增速明显放缓

2010 年—2013 年期间中国软件出口平均增速达 37%，2014 年软件出口执行金额达到 300.57 亿美元，较 2013 年增长 18.5%，相当于 2010 年的三倍。2015 年受整体经济贸易环境影响，开始进入增速放缓区间，软件出口执行金额达到 333.9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1%；软件协议金额、合同数量分别同比增长 12.89%和 -0.18%（表 1、图 1）。

表 1 2010 年—2015 年中国软件出口规模与增速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	合同数 (个)	同比增长 (%)
2010 年	97.3	34.01	126.2	24.42	39044	27.17
2011 年	143.39	47.36	190.68	51.09	46159	18.22
2012 年	194.16	35.4	234.2	22.82	53887	16.74
2013 年	253.56	30.59	320.71	36.94	52683	-2.23
2014 年	300.57	18.51	377.15	17.55	52265	-0.81
2015 年	333.93	11.1	425.78	12.89	52173	-0.18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注：全文软件出口金额均不包括嵌入式软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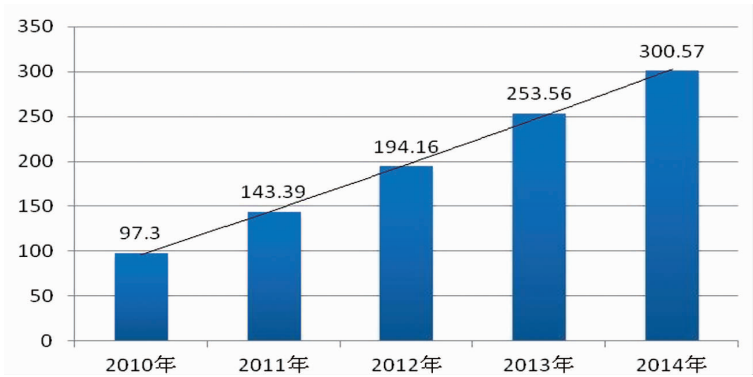


图 1 2010 年—2014 年中国软件出口额（执行金额，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二) 软件出口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链向中高端攀升

从 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来看，软件研发及开发服务、软件技术服务一直是中国软件出口的主力。2013 年软件研发及开发服务为 100.71 亿美元，软件技术服务为 65.92 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 47.50% 和 10.23%，分别占出口执行总额的 39.72% 和 26.00%。2013 年信息系统运营和维护服务同比增长 95.01%，增速最快；其次为应用软件，同比增长 13.74%；系统软件和支撑软件有所下降。此外，2013 年软件出口结构中增加了电子商务平台、测试平台等新兴服务门类，其中电子商务平台出口执行金额为 1.03 亿美元，占比 0.41%；测试平台出口执行金额为 6.24 亿美元，占比 2.46%（表 2、图2）。

表 2 2013 年中国软件按出口方式出口状况 (单位：万美元)

	合同数 (个)	同比增长 (%)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总计	52683	- 2.23	3207159.56	36.94	2535601.64	30.59
软件产品	4744	26.68	90479.72	42.71	55737.52	2.11
系统软件	1777	206.91	10580.82	- 32.52	8090.69	- 34.93
支撑软件	52	36.84	883.14	- 26.26	704.76	- 19.89
应用软件	2915	- 6.81	79015.76	69.85	46942.07	13.74
信息技术外包 (ITO)	47939	- 4.39	3116679.84	36.78	2479864.12	31.41
软件研发及外包	37629	1.22	2078843.75	31.54	1666371.06	30.10
软件研发及开发服务	22937	22.01	1219260.46	55.66	1007139.79	47.50
软件技术服务	14692	- 20.04	859583.29	7.84	659231.27	10.23
信息技术研发服务外包	2075	103650.00	317410.67	435544.62	240248.35	382095.91
集成电路设计	1524	76100.00	207490.76	284680.07	167421.95	266241.00
提供电子商务平台	166	-	14263.74	-	10340.09	-
测试平台	385	-	95656.17	-	62486.31	-
信息系统运营维护外包	6981	- 20.45	606021.87	28.15	453196.75	11.53
信息系统运营和维护服务	2961	96.22	265089.54	110.51	197768.90	95.01
基础信息技术服务	4020	- 44.68	340932.33	- 1.74	255427.84	- 16.23
其它	1254	- 70.06	114403.56	- 49.23	120047.96	- 39.93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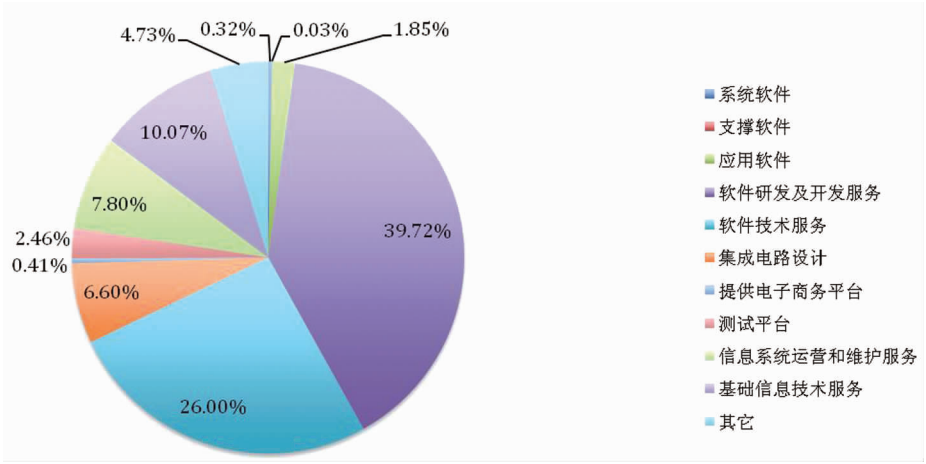


图 2 2013 年中国软件出口结构 (执行金额, 单位:%)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2014 年软件研发及开发服务金额为 120.39 亿美元，软件技术服务金额为 79.99 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 19.54%、21.35%，分别占出口总额的 40.06%、26.61%。2014 年软件产品出口执行金额 7.0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18%，其中系统软件 23.3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9.21%。此外，集成电路设计和测试平台均保持高速增长，其中集成电路设计出口执行金额为 33.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0.82%；测试平台服务 2014 年出口执行金额为 11.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88.36%（表 3、图 3）。

表 3 2014 年中国软件按出口方式出口状况 (单位：万美元)

	合同数 (个)	同比增长 (%)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总计	52265	- 0.81	3771517.68	17.55	3005780.69	18.51
软件产品	3591	- 24.30	123163.43	36.12	70889.52	27.18
系统软件	433	- 75.63	54729.63	417.25	23399.40	189.21
支撑软件	29	- 44.23	780.07	- 11.67	534.53	- 24.15
应用软件	3129	7.34	67653.72	- 14.38	46955.58	0.03
信息技术外包 (ITO)	48674	1.52	3648354.26	17.01	2934891.17	18.32
软件研发及外包	38302	1.78	2530320.42	21.71	2003953.18	20.25
软件研发及开发服务	24808	8.14	1530966.70	25.55	1203987.09	19.54
软件技术服务	13494	- 8.15	999353.72	16.26	799966.08	21.35
信息技术研发服务外包	4055	95.42	579112.99	82.45	466030.93	93.98
集成电路设计	2845	86.68	370140.35	78.39	336216.47	100.82
提供电子商务平台	317	90.96	13053.28	- 8.49	12117.97	17.19

续表 3

	合同数 (个)	同比增长 (%)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测试平台	893	131.95	195919.36	104.82	117696.49	88.36
信息系统运营维护外包	5971	- 14.49	476166.10	- 21.58	409648.63	- 9.71
信息系统运营和维护服务	3442	16.21	280257.18	5.40	243092.03	22.85
基础信息技术服务	2529	- 37.11	195908.92	- 42.60	166556.60	- 34.89
其它	346	- 72.45	62754.76	- 45.17	55258.43	- 53.99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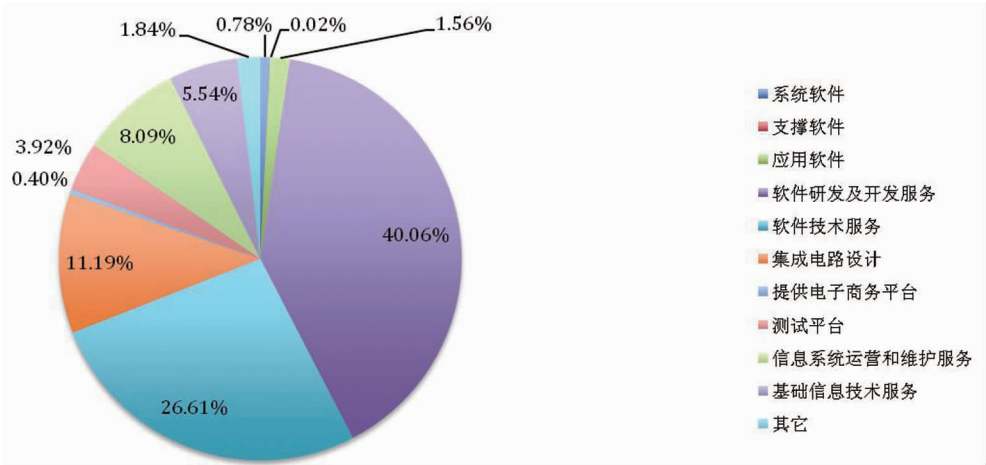


图 3 2014 年中国软件出口结构状况（执行金额，单位：%）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2015 年中国软件出口仍然集中在软件研发及开发服务（占比 45.23%）和软件技术服务（占比 20.25%），同时，应用软件和系统软件也有了大幅增长。此外，2015 年软件出口结构中增加了信息技术（IT）咨询服务、IT 解决方案等领域（表 4、图 4）。

表 4 2015 年中国软件按出口方式出口状况（单位：万美元）

合同类别	合同数 (个)	同比增长 (%)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总计	52173	- 0.18	4257815.77	12.89	3339303.5	11.10
软件产品	4106	14.34	272755.92	121.46	170818.03	140.96
系统软件	443	2.31	36332.84	- 33.61	33875.81	44.77
应用软件	3639	16.30	236003.66	248.84	136424.78	190.54
支撑软件	24	- 17.24	419.42	- 46.23	517.44	- 3.20
信息技术外包（ITO）	48067	- 1.25	3985059.85	9.23	3168485.47	7.96

续表 4

	合同数 (个)	同比增长 (%)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软件研发外包	36837	- 3. 82	2738648. 23	8. 23	2179456. 56	8. 76
软件研发及开发服务	25841	4. 16	1929968. 34	26. 06	1501684. 77	24. 73
软件技术服务	10929	- 19. 01	802336. 86	- 19. 71	672403. 91	- 15. 95
其他软件研发外包业务	67	-	6343. 03	-	5367. 88	-
信息技术服务外包	5380	32. 68	766445. 54	32. 35	594979. 23	27. 67
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	3846	35. 18	491613. 61	32. 82	418068. 57	24. 35
电子商务平台服务	253	- 20. 19	26474. 32	102. 82	19336. 5	59. 57
测试外包服务	859	- 3. 81	182968. 39	- 6. 61	109669. 53	- 6. 82
IT 咨询服务	66	-	8146. 96	-	5967. 24	-
IT 解决方案	132	-	11178. 17	-	7526. 15	-
其他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业务	224	-	46064. 09	-	34411. 23	-
运营和维护服务	5760	- 3. 53	452465. 42	- 4. 98	375170. 28	- 8. 42
信息系统运营和维护服务	3815	10. 84	301515. 57	7. 59	254287. 97	4. 61
基础信息技术运营和维护服务	1893	- 25. 15	148057. 95	- 24. 43	118781. 64	- 28. 68
其他运营和维护服务	52	-	2891. 9	-	2100. 68	-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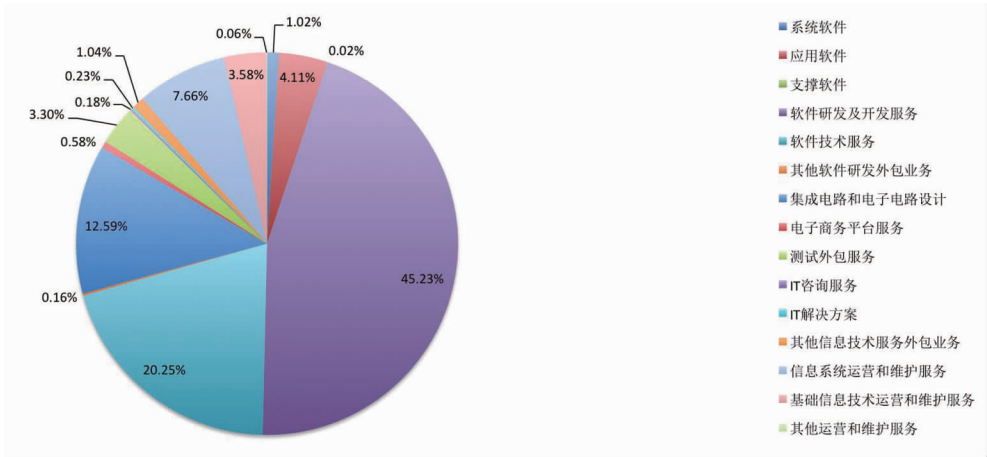


图 4 2015 年中国软件出口结构（执行金额，单位：%）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随着新技术发展及新兴服务业态需求不断增长，中国软件出口结构得到调整和优化，创新日益活跃。2015 年软件产品出口执行金额同比增长 140.96%。2015 年上半年新兴领域运营相关服务，包括在线软件的运营服务、平台的运营服务、基础设施的运营服务等

在内的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增长 18.1%；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包括在线交易平台服务、在线交易支撑服务在内的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收入增长了 22.9%。

（三）软件出口区域仍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呈现强劲增长态势

从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来看，中国软件出口的重心始终在东部地区，并呈现占比扩大态势，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发展基本平稳，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2013 年中国东部地区软件出口执行金额 213.26 亿美元，占 84.11%，其中山东、江苏、上海、天津同比增长超过 30%；2013 年西部地区执行金额 11.21 亿美元，占 4.42%，其中四川省增速较快，执行金额达 7.72 亿美元，同比增长 54.94%；重庆为 2.0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88%。2013 年中部地区执行金额 11.39 亿美元，占 4.49%，其中河南达 3.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1.89%；湖南达 1.5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6.15%，河南、湖南成为全国增长最快的两个省份。2013 年东北地区执行金额 17.67 亿美元，占比 6.97%，其中辽宁达 15.7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6%；吉林增速较快，同比增长 44.73%（表 5、图 5）。

表 5 2013 年中国各省市软件出口情况 (单位：万美元)

省（市）	合同数 （个）	同比增长 （%）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总计	52683	- 2.23	3207159.56	36.94	2535601.64	30.59
江苏省	13899	8.88	968480.42	48.47	821794.58	47.00
上海市	3602	- 15.01	425721.36	50.19	312097.30	41.82
北京市	4959	- 22.81	388333.72	17.35	309650.95	19.14
浙江省	11194	3.84	337603.79	14.96	275012.19	12.68
广东省	1745	- 29.35	266764.64	21.81	208285.04	12.43
辽宁省	5830	18.26	193499.08	14.58	157767.14	2.86
山东省	2771	- 23.22	241555.67	112.19	150500.29	71.13
四川省	912	- 26.09	107374.53	83.88	77259.89	54.94
江西省	769	36.59	42045.82	26.71	37542.84	25.15
天津市	976	- 17.01	56145.50	101.58	37514.20	31.70
河南省	52	- 14.75	30916.07	126.31	30742.68	211.89
重庆市	485	6.36	27763.49	20.76	20347.75	12.88
湖北省	436	- 27.81	21814.21	20.17	17939.42	2.45
福建省	1220	24.87	19275.54	15.21	16389.66	8.43
湖南省	426	63.22	19559.69	111.73	15698.10	126.15

续表 5

省（市）	合同数 （个）	同比增长 （%）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黑龙江省	529	- 4. 34	13899. 43	- 68. 91	15473. 95	- 35. 98
陕西省	727	- 5. 34	19779. 12	41. 67	13226. 79	0. 86
安徽省	427	- 30. 00	16622. 54	17. 08	11985. 07	- 5. 43
吉林省	122	37. 08	5736. 44	126. 73	3540. 11	44. 73
河北省	1542	20. 75	1756. 96	- 38. 58	1450. 17	- 46. 70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	33. 33	1132. 29	12. 37	524. 51	- 11. 6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1	-	609. 96	-	290. 71	-
云南省	4	0. 00	288. 00	14. 29	288. 00	44. 00
内蒙古自治区	3	0. 00	139. 65	- 19. 47	139. 65	- 19. 47
甘肃省	3	-	164. 25	-	75. 80	-
山西省	13	- 31. 58	64. 88	- 45. 93	64. 88	- 45. 93
新疆建设兵团	0	-	0. 00	-	0. 00	-
宁夏回族自治区	6	-	112. 51	-	0. 00	-
青海省	0	-	0. 00	-	0. 00	-
海南省	0	-	0. 00	-	0. 00	-
西藏自治区	0	-	0. 00	-	0. 00	-
贵州省	0	-	0. 00	-	0. 00	-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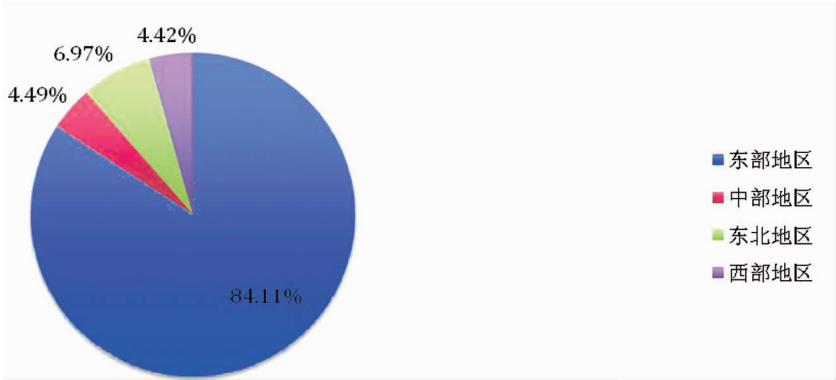


图 5 2013 年中国软件出口区域分布（执行金额，单位：%）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2014 年东部软件出口执行金额 259. 39 亿美元，占 86. 30%，其中河北、福建、江苏、

上海、广东、山东同比增长超过 20%，北京、天津、浙江同比增长分别为 11.68%、11.47%、17.59%。2014 年西部地区执行金额 14.62 亿美元，占 4.86%；其中陕西增速较快，执行金额达 3.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6.69%。2014 年中部地区执行金额 7.49 亿美元，占 2.49%，其中安徽达 1.4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79%。2014 年东北地区执行金额 19.07 亿美元，占 6.34%，其中辽宁达 17.5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43%（表 6、图 6）。

表 6 2014 年中国各省市软件出口情况 (单位：万美元)

省（市）	合同数 （个）	同比增长 （%）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总计	52265	- 0.81	3771517.68	17.55	3005780.69	18.51
江苏省	14439	3.89	1249968.20	29.06	1040555.82	26.62
上海市	4082	13.33	504998.57	18.62	384987.65	23.36
北京市	4095	- 17.42	440046.72	13.32	345810.65	11.68
浙江省	10604	- 5.27	421366.66	24.81	323399.02	17.59
广东省	1889	8.25	333878.48	25.16	251005.48	20.51
山东省	3184	14.90	205542.66	- 14.91	180861.89	20.17
辽宁省	5034	- 13.65	245292.46	26.77	175801.83	11.43
四川省	942	3.29	117852.36	9.76	92770.89	20.08
天津市	1247	27.77	41206.01	- 26.61	41818.53	11.47
陕西省	1089	49.18	36784.67	81.89	30991.53	126.69
江西省	567	- 26.27	28938.97	- 31.17	26418.04	- 29.63
福建省	1618	32.62	26533.04	37.65	23379.37	42.65
重庆市	442	- 8.87	25366.44	- 8.63	21592.05	6.12
湖北省	470	7.80	20675.86	- 5.22	17869.58	- 0.39
湖南省	630	47.89	24128.52	23.36	15111.24	- 3.74
安徽省	228	- 46.60	24781.68	49.08	14956.51	24.79
黑龙江省	375	- 29.51	14037.28	- 0.10	9356.64	- 39.73
吉林省	143	16.26	5706.23	- 12.83	5549.30	51.99
河北省	998	- 35.28	2209.48	25.76	2093.25	44.35
河南省	48	- 7.69	915.02	- 97.04	574.63	- 98.13
云南省	4	0.00	305.06	5.92	305.00	5.90
广西壮族自治区	120	500.00	611.68	- 45.98	258.17	- 50.78

续表 6

省（市）	合同数 （个）	同比增长 （%）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内蒙古自治区	3	0.00	188.01	34.63	188.01	34.63
宁夏回族自治区	0	-100.00	0.00	-100.00	81.51	-
山西省	6	-53.85	56.01	-13.67	29.57	-54.4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5	-54.55	47.33	-92.24	14.52	-95.01
海南省	0	-	0.00	-	0.00	-
新疆建设兵团	0	-	0.00	-	0.00	-
青海省	0	-	0.00	-	0.00	-
西藏自治区	0	-	0.00	-	0.00	-
贵州省	0	-	0.00	-	0.00	-
甘肃省	3	0.00	80.27	-51.13	0.00	-100.00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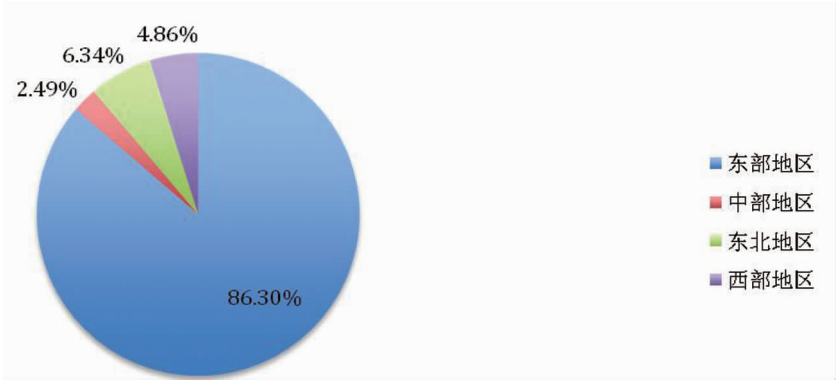


图6 2014 年中国软件出口区域分布（执行金额，单位：%）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2015 年东部地区占中国软件出口的 86.19%，其中浙江出口执行金额达 118.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32%。此外，河北、浙江、山东增速较快。西部地区占 4.90%，主要集中在四川。中部地区占 3.01%，其中江西达 4.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55.86%；湖南达 2.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2.45%。东北地区占 5.90%，其中辽宁执行金额为 17.25 亿美元（表 7、图 7）。

表 7 2015 年中国各省市软件出口情况 (单位: 万美元)

省 (市)	合同数 (个)	同比增长 (%)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总计	52173	- 0. 18	4257815. 77	12. 89	3339303. 50	11. 10
江苏省	15125	4. 75	1401452. 27	12. 12	1189530. 84	14. 32
浙江省	10884	2. 64	456455. 48	8. 33	434346. 51	34. 31
上海市	4217	3. 31	422034. 14	- 16. 43	355217. 96	- 7. 73
北京市	3680	- 10. 13	680977. 43	54. 75	316253. 35	- 8. 55
广东省	2186	15. 72	352888. 13	5. 69	298545. 08	18. 94
山东省	2629	- 17. 43	257059. 51	25. 06	230386. 01	27. 38
辽宁省	4760	- 5. 44	200179. 96	- 18. 39	172462. 48	- 1. 90
四川省	983	4. 35	154258. 51	30. 89	113289. 04	22. 12
江西省	667	17. 64	45082. 10	55. 78	41176. 20	55. 86
陕西省	876	- 19. 56	41564. 15	12. 99	28234. 61	- 8. 90
天津市	1308	4. 89	36698. 81	- 10. 94	27240. 58	- 34. 86
湖南省	468	- 25. 71	24964. 29	3. 46	23036. 44	52. 45
福建省	1678	3. 71	26877. 24	1. 30	22376. 66	- 4. 29
重庆市	482	9. 05	22412. 79	- 11. 64	21668. 77	0. 36
湖北省	759	61. 49	24696. 16	19. 44	19912. 82	11. 43
黑龙江省	315	- 16. 00	23090. 07	64. 49	18358. 53	96. 21
安徽省	156	- 31. 58	72582. 74	192. 89	16288. 00	8. 90
吉林省	166	16. 08	8273. 52	44. 99	6084. 82	9. 65
河北省	725	- 27. 35	5114. 80	131. 49	4130. 44	97. 32
云南省	5	25. 00	264. 85	- 13. 18	260. 00	- 14. 75
河南省	72	50. 00	526. 84	- 42. 42	219. 09	- 61. 87
广西壮族自治区	19	- 84. 17	202. 59	- 66. 88	126. 00	- 51. 20
内蒙古自治区	2	- 33. 33	75. 98	- 59. 59	75. 98	- 59. 59
山西省	6	0. 00	31. 27	- 44. 16	37. 89	28. 14
甘肃省	0	- 100. 00	0. 00	- 100. 00	31. 75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	- 80. 00	5. 36	- 88. 67	7. 82	- 46. 15
海南省	4	-	46. 80	-	5. 85	-
青海省	0	-	0. 00	-	0. 00	-
新疆建设兵团	0	-	0. 00	-	0. 00	-

续表 7

省（市）	合同数 （个）	同比增长 （%）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宁夏回族自治区	0	—	0.00	—	0.00	—100.00
贵州省	0	—	0.00	—	0.00	—
西藏自治区	0	—	0.00	—	0.00	—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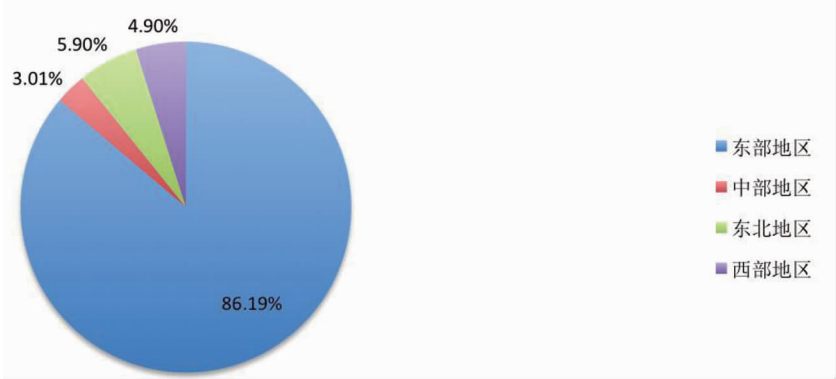


图 7 2015 年中国软件出口区域分布（执行金额，单位：%）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四）软件出口市场以美日欧为主，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

2014 年美国、日本分别位居中国软件出口目的地国家第一、二位，出口美国的执行金额为 76.9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5%；出口日本的执行金额为 42.21 亿美元，同比增长 9.92%。主要出口地区亚洲保持了较快增长，2014 年出口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的执行金额分别为 30.92 亿美元、18.43 亿美元、16.45 亿美元、13.42 亿美元，其中韩国、新加坡同比增长 35.91%、45.27%。此外，对欧洲出口也保持了大幅增长态势，出口德国、英国、俄罗斯的执行金额分别为 7.01 亿美元、6.07 亿美元、5.65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72.35%、48.85%、58.10%（表 8、图 8）。

表 8 2014 年中国软件出口主要市场（单位：万美元）

国家（地区）	合同数 （个）	同比增长 （%）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全球	52265	—0.81	3771517.68	17.55	3005780.69	18.51
美国	6630	—1.53	971216.81	11.61	769814.72	4.65
日本	17098	—2.47	501215.47	13.47	422097.71	9.92

续表 8

国家（地区）	合同数 （个）	同比增长 （%）	协议金额	同比增长 （%）	执行金额	同比增长 （%）
中国香港	6053	5.84	401824.80	28.58	309278.83	26.74
韩国	1524	-2.18	255804.89	35.49	184303.16	35.91
新加坡	1274	0.47	198341.00	47.95	164545.84	45.27
中国台湾	2468	-1.99	161241.11	13.80	134244.10	7.62
德国	1071	-0.56	72465.98	-16.47	70163.06	72.35
英国	1090	8.78	80568.80	8.18	60723.77	48.85
俄罗斯	571	1.06	66486.17	76.43	56546.38	58.10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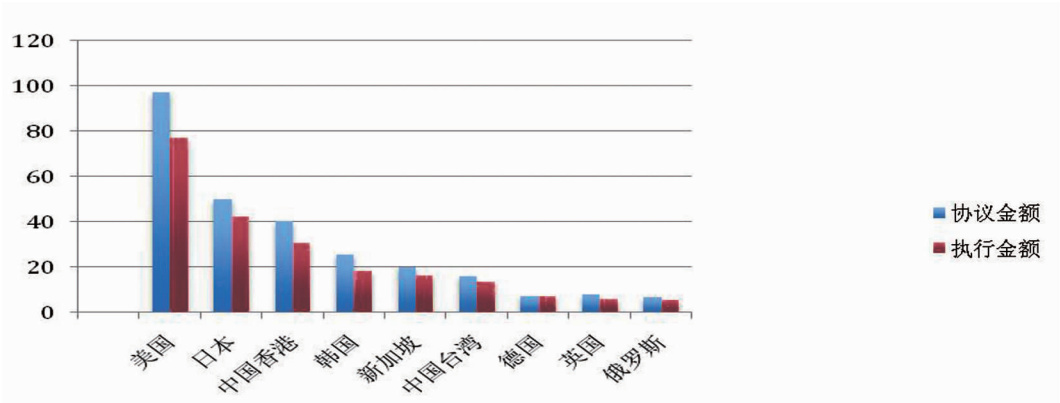


图 8 2014 年中国软件出口目的地（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五）软件出口企业以内资为主，国际化步伐加快

近年来，软件出口中内资企业已经成为主力。2012 年、2013 年、2014 年及 2015 年，内资企业软件出口执行金额占总额比重不断攀升，分别为 36.59%、37.12%、41.26%、64.08%（表 9、图 9）。说明内资企业对中国软件出口的贡献度明显上升。

表 9 2012 年—2015 年中国软件出口内资企业占比

年份	占比（%）
2012	36.59
2013	37.12
2014	41.26
2015	64.08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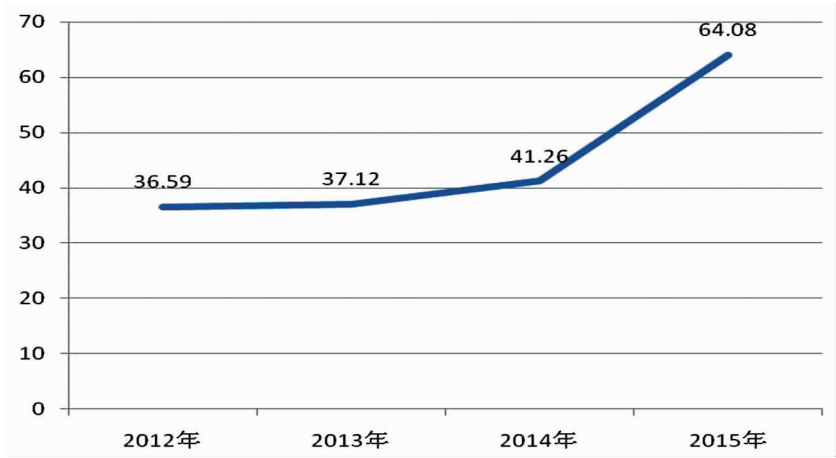


图 9 2012 年—2015 年中国软件出口内资企业占比 (%)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司。

近几年，在保险、信息化等领域，中国软件出口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化步伐加快。在金融保险、医疗健康、地理信息等服务领域中的相关软件产品和咨询服务得到迅速发展，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较高份额，在国际市场中也积极向价值链、产业链的高端攀升。2014 年软件出口额前 100 家企业实现软件出口 2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6.7%，国内单笔软件出口订单实现一亿欧元。中国软件企业加快了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并购迅速增长，一些软件企业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研发中心和产业基地。移动互联网、云计算、高端软件及服务的发展，有力促进了软件企业研发成果转化。如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自主研发的基于云平台的保险核心业务系统进行国际化示范应用和产业化推广，目前在香港、台湾、日本、英国、新加坡等地广泛应用。

（六）人才素质不断提高，创新创业能力显著增强

软件企业已经成为知识型人才就业的重要渠道。2015 年中国新增服务外包从业人员 127.5 万人，其中大学毕业生 66.9 万人，约占 52.5%。根据工信部统计，2013 年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470 万人，其中软件研发人员达到 180 万人，占 38.29%。2015 年上半年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从业人员超过 540 万人，同比增长 8.3%。根据中国软件开发联盟（CSDN）2014 年中国软件开发者调查报告，在参与调研的从业人员中，男性大约占 93.37%，其中 21~25 岁占 51.2%；26~30 岁占 31.53%；有 64.09%的从业者拥有本科学历，15%以上的从业者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此外，30 岁以上年龄群体拥有创业意愿或已经开始创业的人数超过 40%，其中，拥有 10~15 年工作经验的从业人员创业意愿最强。

（七）自主知识产权拥有量显著提升，众包、众创推动技术创新与服务模式创新

中国软件产业创新能力和应用水平不断提升，自主知识产权的拥有量明显增加。2014 年国内软件业专利数量达 19740 件，同比增长 5.95%；软件著作权登记 218783 件，同比增长 33%。近几年，软件服务模式创新加速，尤其是基于互联网、移动终端为主要技术载体的众包模式迅速发展，大大提高了创新效率。2015 年开源中国正式上线了第一期众包平台，初步实现作品和服务交易以及开发悬赏模块，这种方式主要通过前期积累的 200 万开发者资源进行软件众包。

“众创空间”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具有重要促进作用。2015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到 2020 年将形成一批有效满足大众创新创业需求、具有较强专业化服务能力的众创空间等新型创业服务平台。中关村已出现车库咖啡、创客空间、36 氪、天使汇、云基地、创业家等十余家新型创业服务机构。上海浦东软件园于 2015 年 5 月正式发布“浦软创业+”五年行动计划，将通过升级众创空间、建设在线孵化平台等方式，全面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八）出口基地城市、软件园区产业聚集效应日益突出

中国软件业出口已经形成以出口基地城市为中心、以园区为空间载体聚集发展的态势。北京、上海、大连、深圳、西安、天津、广州、南京、杭州、成都、济南等软件出口基地城市，充分利用软件园的优势条件，积极吸引优势企业、项目、资金、人才、市场等要素资源聚集，引领带动全国软件出口。根据工信部统计，2013 年出口基地城市的软件业务收入为 20874.28 亿元，占全国软件业务收入的 68.24%。

软件园区的基础设施、平台建设、服务体系日趋完善，产业集聚能力显著增强。2015 年工信部发布的《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竞争力报告》，揭晓了获得 2014 年中国骨干软件园区前十强，分别是：上海浦东软件园、北京中关村软件园、成都天府软件园、西安软件园、江苏软件园、沈阳国际软件园、厦门软件园、大连软件园、南京软件谷、杭州东部软件园。如，中关村软件园设有知识产权登记中心、软件产品质量评测中心、软件企业评估与认证中心等。其中软件产品质量评测中心投资 1.35 亿元建设全国最大的“三库四平台”（包括软件工具库、开放源码库和软件构件库三个库，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软件质量管理平台、软件开发试验平台、软件测试平台四个平台），为软件企业的产品开发、质量管理等服务。成都天府软件园是国家软件出口创新基地，也是目前发展最快的专业软件园区之一；大连软件园是国家软件产业国际化示范城市核心基地，成为国内最具规模的服务外包产业基地和产学研一体的生态科技园区；南京软件谷是中

国最大的通讯软件产业研发基地，已入驻软件及系统集成企业 250 余家，其中全国软件百强企业 21 家，全国服务外包前 20 强企业七家。

二、中国软件出口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出口产业链、价值链仍以中低端为主

目前美国主要从事系统软件等基础平台的开发研制及软件标准的制定，在上游主宰着整个产业。中国企业大多从事一般应用软件开发，只有少数从事高级应用类软件开发。根据商务部统计，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信息技术外包（ITO）占中国软件出口的比重分别为 97.18%、97.80%和 97.64%，2015 年 ITO 比重为 95.90%。系统软件、应用软件和支撑软件占比较小。目前美国在套装软件市场占据了大部分份额（图 10），2013 年全球套装软件市场规模为 3671 亿美元，美国占全球套装软件供给的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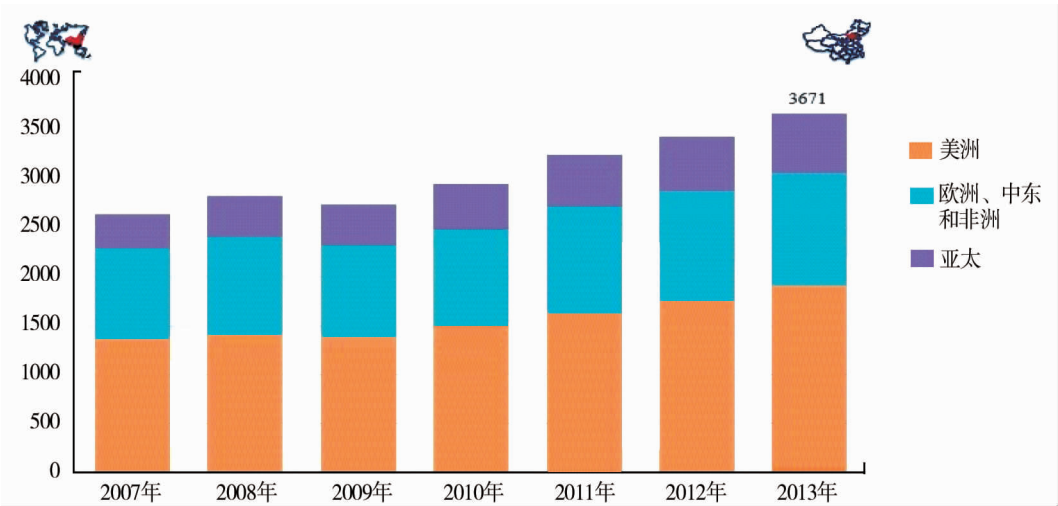


图 10 2007 年—2013 年全球套装软件市场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IDC。微信公众号：软件定义世界（SDX）。

（二）自主创新能力仍然不足

多数企业缺乏持续创新的动力和意识。有些企业由于技术人员不足，仅习惯于引进技术，缺乏消化吸收的能力，导致企业在技术方面持续落后，在市场竞争方面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目前中国高端软件主要依赖进口。如中国大型企业应用高端市场几乎被国外工控系统占领，国产控制系统难以进入重大工程的关键核心主体装备。

（三）软件企业规模小、竞争力弱

软件企业存在着小、散、弱的现象，管理水平低。目前国内软件企业超过 70%的公司

规模不到 50 人，且核心人才流失、人才流动性较强，多数软件出口企业对发包方的质量控制要求难以满足，对大型国际客户的吸引力很低，难以接到大订单和长期合作伙伴，缺乏抵抗风险的能力。近年来世界各国纷纷把软件产品视为服务贸易的重点，并设置一系列技术贸易壁垒，这尤其使中小型软件企业的生存面临危机。

（四）人才结构和区域分布不合理

中国软件人才结构呈现中间大、两端小的状况，高级科研人才、行业领军人才的高端人才严重缺乏，从事基础工作的人才也难以满足行业需求。软件人才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部、东北、西部地区相对匮乏。主要原因在于软件工程教育相对落后、体系还不够完善、缺乏有效的能力培训机制。软件出口企业的高端人才需要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语言和文化优势、能够及时了解前沿技术，同时还需要熟悉国际化企业的管理模式、熟练掌握国际标准和规范等。

（五）人力成本上升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

除汇率变化因素影响外，近年来，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导致软件出口企业利润明显下降，人力成本通常占软件外包企业营收的 60%~70%，而软件外包企业年均员工流动率在 30% 左右。

三、“十三五”时期中国软件出口面临的形势和机遇

（一）传统市场有望保持稳定，“一带一路”战略将拓宽新兴市场发展空间

“十三五”时期，全球软件市场需求的基本格局将产生变化。美日欧三大传统市场随着金融危机复苏有望保持平稳。美国仍将是未来最大的软件发包国，欧洲、日本随着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发展也将在智能制造、金融保险、医疗健康、企业管理、通信等领域日益扩大软件市场需求，为中国积极承接软件外包创造条件。目前中国软件企业通过加快技术创新以及派遣工程师上门服务、现场与远程结合等服务模式创新，提高了对美日欧国家软件出口的竞争力。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孟中印缅”“中巴”等六条经济走廊加快建设，将为中国软件出口开拓更广阔的新兴市场。处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信息化程度较低、数字鸿沟巨大，对软件产品和服务存在巨大需求。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预计，“一带一路”建设未来十年总投资将超过 50 万亿元，由此带来的直接 IT 商机将超过 5000 亿元，这为有条件的软件企业走出去，向沿线国家输出人才、技术和服务，建立销售网络、扩大海外市场提供了条件。此外，随着非洲地区加快开放，南非、

加纳、尼日利亚及东非沿海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手机、互联网普及率逐步上升，使中国软件出口蕴含着巨大商机。

（二）以网络智能、共创分享为主导的新产业革命将为软件业创新发展带来机遇

“十三五”将是以智能制造引领新型制造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德国“工业 4.0”战略、美国工业互联网战略以及“中国制造 2025”战略等，标志着传统制造业正在逐步向以绿色低碳、网络智能、超常融合、共创分享为主要特征的智能制造转型。网络化、信息化、数据化成为关键支撑将对软件业产生强大需求，带来市场机遇。目前中国正处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高端新兴产业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制造 2025”战略实施的关键取决于软件业的发展，这些都将为提升中国软件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创造市场机遇。

（三）新一代信息技术空前发展将为软件出口提供新动能

近年来，各国加快高速宽带、第四代移动通信（4G）网络、互联网协议六版（IPv6）网络、云计算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软件与信息安全越来越重视，对软件产业大力扶持。“十三五”期间中国网络建设累计投资将突破两万亿元规模，初步完成覆盖全国、高速、可靠、安全的信息基础设施网络，为软件业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将有利于推动中国软件企业的技术创新、服务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使软件价值链由产品和服务延伸，从而提升软件出口综合竞争力。2014 年中国物联网产业规模达 5800 亿元，同比增长 18.46%。目前物联网应用已进入全面快速细分发展的新阶段，需要软件业和硬件业的深度协同，也为软件业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根据高德纳咨询公司（Gartner）预计，到 2016 年基于云的安全服务市场产值将达 42 亿美元。大数据将成为各类软件企业争夺新兴市场主导权的重要领域。2015 年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形成一批满足大数据应用需求的产品、系统、解决方案，并在大数据处理、分析、可视化软件和硬件支撑平台领域形成国际领先的龙头企业。随着移动互联网用户高速增长，移动操作系统逐步向跨平台、跨终端发展以及生态系统、信息安全保障等方面要求越来越高，也为软件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新动能。

（四）服务业态创新和传统产业升级将为软件业带来机遇

新兴服务业态通过信息技术加速产业融合，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不仅为软件业创造大量需求，而且为处于软件出口价值链低端的国家在全球产业结构深度调整之中提高参

与度、重构价值链、加速产业链的细分化和专业化，推动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了机遇。“互联网+”传统产业是产业升级的关键所在。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传统产业中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更加需要软件业针对传统产业提供弹性化、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向传统行业提供垂直化、精细化的服务。因此，也需要软件企业向价值链的高端转化，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务内容。

四、“十三五”时期提升软件出口竞争力的战略思路

（一）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软件业自主创新能力

首先，通过软件技术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提高中国软件产品和服务出口的质量、标准和品牌影响力，适应国际市场需求，提升出口竞争力。应着力加大软件研发投入，重点加强核心关键技术、基础性研发的投入；着力提升软件创新设计能力，加强绿色设计、智能设计、网络设计的软件开发能力；力争在数控机床、机械装备、航空航天航海、轨道交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医疗健康、金融、电子商务、消费电子、智能交通等重点产业领域，以及国家安全、公共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软件研发和出口能力有较大提升。

其次，积极完善投融资体系、创新融资模式。利用“互联网+”构建开放创新融资平台。尤其要利用互联网金融和众创、众包、众筹、众扶等新的服务模式，促进提升中小微软件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完善创业投融资机制，为软件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形成创新活跃、开放合作、协同发展的软件产业创新生态。

（二）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形成出口市场多元化格局

一是保持美日欧三大主要出口市场稳步增长。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中美自贸区等一系列战略，均为对美软件出口创造了有利的市场环境。中国与欧盟的紧密合作、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等都标志着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有利于扩大软件外包市场。应鼓励有条件的软件企业到美国、欧洲、日本设立研发设计机构，尤其是通过并购当地软件企业获取核心技术、品牌和领军人才。

二是利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战略机遇，扩大沿线国家软件产品和服务出口，加快新兴市场布局。要加强应用软件、软件本土化等产品开发以及软件外包服务，更好地适应当地市场、文化、语言、政策环境等需要。应加大伊斯兰、阿拉伯地区国家的市场开发力度，拓宽“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市场空间。构建中巴信息走廊平台、扩大与孟加拉、缅甸的网络信息技术合作和软件外包，积极拓展与印度软件外包的合作空间。

（三）建立适应软件业需求的人才引进机制和人才培养体系

一是鼓励产学研相结合。推动高校、企业合作，通过项目实施进行人才培养，促进产教融合、协同创新。二是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教学科研体系。重点从个人能力、团队能力、交流能力、工程能力等多个层面培养复合型人才，以产业化中的问题为导向激励研究，加强基础与应用的结合。三是鼓励岗位培训。根据企业不同层次需求，制定长期性、实用性、前瞻性的培训计划，利用远程教育、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扩大培训教育规模。四是建立引进领军人才的体制机制，放开国籍、户籍、出入境等限制，强化分配激励机制，鼓励海外人才回流，吸引国际化管理人才。

（四）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制政策环境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关键环节，对于促进软件业发展和软件外包尤为重要。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法律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保护范围，力争建立与国际标准相接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尤其要严厉打击惩处盗版、侵权行为，培育良好的信用环境和市场秩序。此外，应围绕建立良好的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简化软件出口流程和手续，确保企业及时享受到优惠政策。

（五）提高在国际规则标准制定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要加强软件国际标准体系建设，在国际软件业的相关规则、标准制定方面掌握主导权和话语权。要加强对大数据、重点领域软件等标准的研制，建立安全软件的评测标准。

责任编辑：沈家文、杜振华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 GDP 增长的影响

田惠敏 刘 江

摘要：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资本输入国的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但作用的路径和程度并非线性，其中关键因素之一是资本输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文章根据中国 1983 年—2014 年间的相关数据，从人均收入发展阶段的角度实证分析了 FDI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发现自中国经济进入起飞阶段之后，人均收入的变化放大了 FDI 对于 GDP 的推动效应。但是自 2010 年之后，人均收入的变化开始抑制 FDI 对于 GDP 的拉动效应，尽管实证结果并不显著，却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应及时完善吸引 FDI 的政策。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经济增长 中等收入陷阱 创新 人力资本

作者简介：田惠敏，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研究员、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刘 江，北京物资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于资本输入国的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但作用的路径和程度并非线性，其中关键因素之一是资本输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转型所经历的将近四十年的过程中，FDI 总体上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并将继续发挥作用，同时面临的风险也在增加，尤其是“中等收入陷阱”导致的系列阻碍因素正在放大。本文选取 1983 年—2014 年间的相关数据，从人均收入变动阶段的角度考察 FDI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以及变化趋势，揭示 FDI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和机理，并探讨可行的战略方向以改善 FDI 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策略。

一、文献综述

（一）国际经验的研究

长期以来，是什么因素推动着 FDI 的跨国流动？邓宁（Dunning, 1970; 1973; 1974）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框架下，从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优势三个维度给出了解释。在之后的 40 多年 FDI 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尽管世界经济的形势和技术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该三大要素对于 FDI 的流动仍然表现出了较好的解释力，只不过方式有所改变，如许多国家中的跨国公司，开始采用兼并与收购的方式以逐渐取代直接设立新企业的方式。邓宁（Dunning, 2002）还认为，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地位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所以重点应是吸引国际直接投资。

从东道国的视角，关心的问题是 FDI 对于资本输入国会产生怎样的长期影响，是否可以从中受益，或在什么条件下获益？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不同的经验数据，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成果主要认为 FDI 有益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艾特肯（Aitken）和哈里森（Harrison）以及哈斯克尔（Haskel）等人（2002）选择了委内瑞拉和英国作为样本，乔尔姆（Sjoholm, 1999）的研究视角投向了印尼，贝克尔（Becker）、安德（Ender）和坦（Tan, 2006）考察了东盟国家，发现 FDI 的技术溢出同技术差距密切关联。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FDI 对经济增长起着促进的作用，主要是由于正的技术外溢效应（Balasubrananyam 等, 1996）。凯夫斯（Caves, 1974）、布罗斯多姆和佩尔森（Blomstrom and Persson, 1983）实证分析认为 FDI 通过其技术外溢效应推动了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经济增长。马库森和维纳布尔（Markusen and Venable, 1999）认为 FDI 使东道国有机会以低廉的价格获得技术含量高、质量好的中间品，为后续生产环节的技术升级创造条件。伊瓦森（Ivarsson）和奥维斯特姆（Alvstam, 2009）以瑞典为研究对象，认为跨国公司通常会对国内供应商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持，从而导致低能力供应商的技术升级。王晓红和沈家文（2015）认为，利用外资规模持续扩大、外资质量显著提高、外资结构更趋优化，外资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更加突出。

但是，也有文献得出了相反的结果。如布莱彻（Brecher）和芬德利（Findlay, 1983）发现，FDI 是导致一国贫穷的原因之一。卡克维克（Carkovic）和莱文（Levine, 2002）研究了 72 个国家的样本，发现 FDI 对经济增长并无显著影响。哈达德（Haddad）和哈里森（Harrison, 1993）对摩洛哥的研究，库科（Kokko, 1994）、Blomstrom et al.（1999）

对墨西哥的研究，都佐证了上述结论，原因在于东道国的国内企业缺乏必要的学习能力，无法产生出预期的外溢效应。Ari Kokko（1994）的研究发现本土企业由于对 FDI 的依赖，易陷入引资陷阱从而被困于低附加值生产环节，不利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发展。伽柏哈耶（Gabor Hunya，2002）对罗马尼亚的实证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传统产业如服装、鞋帽、金属产业发展，但阻碍了新兴产业的发展。塔纳（Tanna，2009）运用 75 个国家 566 个商业银行 2000 年—2004 年的面板数据，发现短期内 FDI 对生产率具有消极作用。而 Tam BangVu 和 IlanNoy（2009）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六个成员国的部门数据研究发现，FDI 通过与发达国家当地企业合作对经济发展存在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国家和经济部门之间存在显著不同。

（二）中国为背景的研究

基于中国的经验数据，也有两种研究结果。一类研究成果认为 FDI 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主要机理在于技术的外溢效用会提升中国技术的进步和改善企业效率（秦晓钟，1998；何洁，2000；沈坤荣，1999）。基于区域经济的视角发现，FDI 也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Wei et al.，2001；陈浪南和陈景煌，2002；王成岐等，2002；Ying，2003）。但是反向来看，中国产出的增长对 FDI 的增加却无所贡献（沈坤荣，2001）。从行业的视角，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样存在（陈涛涛，2003；严兵，2005；严冀等，2005）。但是因技术差距过大也会导致 FDI 技术扩散效应不显著的情况，这一点在西部地区较为明显（潘文卿，2003）。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别，往往还伴随着投资环境和配套基础建设的巨大差异，因而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FDI 的技术外溢效应。从整体和长期的视角看，FDI 会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并改善资产形成的质量（江小涓，2002）。总之，FDI 对中国经济增长起着推动作用，并且能够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引起经济增长方式路径的改变（江小涓，1999，2000，2004；Yao 和 Wei，2006；张卫东等，2005）。

基于产业结构层面变化，正是由于 FDI 大量进入中国加工工业，才有效推动了中国加工工业的扩张，有助于国内加工工业内部产业结构的改善（杨俊龙、张媛媛，2004；张琴，2012）。FDI 也会间接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中发挥催化剂的作用，进一步改善产业结构（周燕、王传雨，2008）。

当然也有相反的研究结果，认为 FDI 对于跨国的经济发展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好，资本的逐利本性往往并不一定会给东道国带来预期的技术进步，技术的外溢效应往往并不总是成立。邓宁揭示所有权优势始终是外资决定去留的根本性因素，即使该理论提出之

后的 45 年之后，在信息化和全球化加速发展的现代，跨国资本不是弱化了所有权的控制，恰恰相反，往往会凭借着自身的“先行优势”更好地吸引现代技术成果和改善管理制度，并创新投资方式，以巩固既有的优势。平新乔等（2007）的研究发现，大量的外资进入实际上并未缩小东道国企业与先进跨国公司在技术上的差距，却阻碍了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即使人员流动会导致 FDI 技术溢出的产生，行业内却不会存在明显的溢出（姚洋和章奇，2001）。包群和赖明勇（2002）将 FDI 的效用区分为直接和间接效应后发现，外企对国企没有明显受益于溢出效应。而且 FDI 对农林牧渔等低技术含量和吸收能力不足的行业具有负的溢出效应（祖强和梁俊伟，2005；李文臣和刘超阳，2010）。

（三）文献简评

基于上述分析，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发达国家，FDI 都不同程度地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产生着影响。邓宁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FDI 的流动方向，但在分析 FDI 为何可以持续发生的方面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解释。本文基于发展经济的视角，从人均收入的维度来考察 FDI 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作用机理及实证效应。这是因为人均收入的变化集中反映了东道国在所有权改革、技术创新以及管理水平上的进步程度。从深层次影响着 FDI 的流向和幅度变化。中国实行开放政策的 37 年以来，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均较之前有了质的变化，包括知识产权改革、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以及均衡的发展战略，人均收入水平发生了重大变化，相对于 FDI 的吸引和应用能力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中国已经经历从起步到起飞的阶段，目前开始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部分地区已经处于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过程之中。因此，从人均收入的发展阶段视角考察 FDI 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描述

纵观 1983 年—2014 年 FDI 在中国的总体特点，对于中国相关领域的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和种类以及企业经营管理起到了刺激效用，并且表现出明显的三大特点：第一是 FDI 的总量规模庞大。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 1983 年的 9.2 亿美元，发展到 2014 年的 1195.62 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增加了 129 倍（见图 1）。相对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此之大的规模都属罕见。第二是增速快。32 年间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实际利用外商其他投资额的算术平均增长率分别达 20.78%、15.90% 和 58.76%，远高于同期 GDP 的增长率，显示出极强的投资强度。第三是波动幅度大。尤其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头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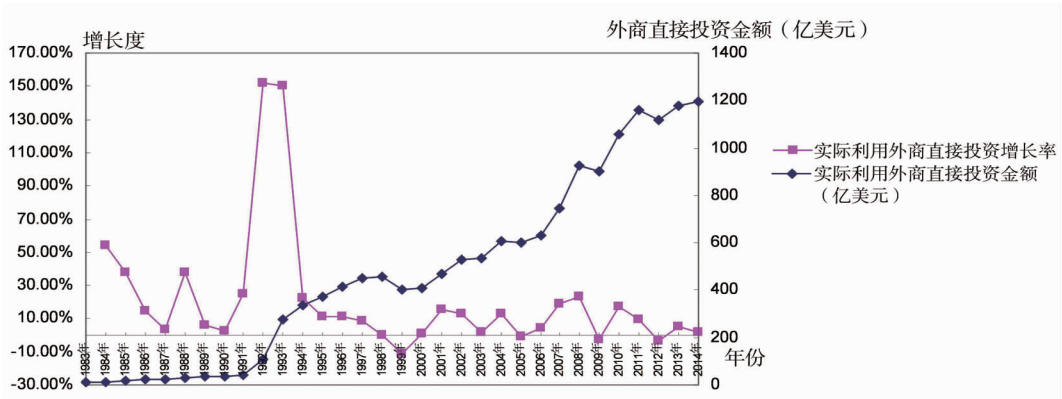


图 1 1983 年—2014 年中国 FDI 与 GDP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就阶段性的变化来看，在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后，2010 的增速又创下了过去十年内的新高，达到 19.31%，之后在 2011 年下降了 1.37%，2012 年又创下了过去十年来的新低 5.24%，2014 年也仅有 1.45% 的增长。事实上，同期的宏观经济正从高速向中高速转换。

FDI 与 GDP 的历年增速基本上呈现为相对稳定的关系（见图 2），只在 1992 年—1993 年出现了异常的变动，这两年恰好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起步期。自此之后，外资引入的速度开始放缓至相对正常的节奏。实际上，正是从上世纪的 90 年代初期始，中国的 FDI 和 GDP 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1983 年—1995 年，二者的相关程度数达 96.27%，1996 年—2014 年的相关程度高达 98.08%，分阶段考察的结果表明均高于 94.79% 的整体相关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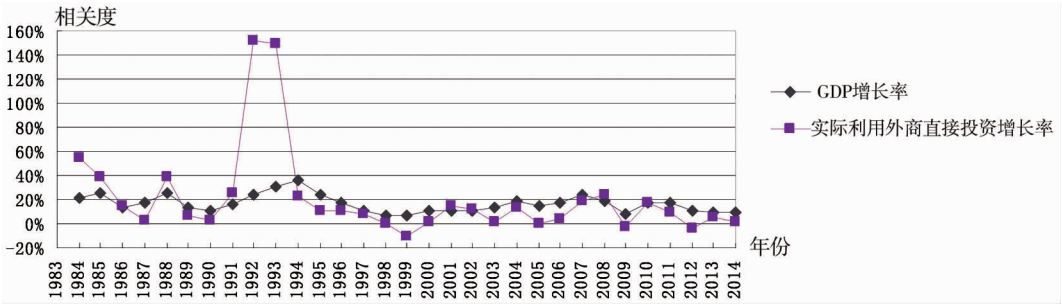


图 2 1983 年—2014 年中国 FDI 和 GDP 的增速时序图

注：FDI 以万美元计，GDP 的计算数据用亿人民币计。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同样有意思的是，从上世纪的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中国的人均 GDP（换算为美元）增速波动极为剧烈，分别在 1988 年、1993 年和 1995 年至少出现了 23% 的速增，

而在 1990 年和 1994 年又有近 10% 的大幅下降。同期的 FDI 的投资规模在迅速增加，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外资的扩散效应开始逐渐显现。总体上，中国的 FDI 与 GDP 之间呈现的是非线性的变动关系。

三、FDI 与经济增长关联性的经验分析

初步的分析所示，FDI 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与力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均收入的水平，本文拟参照汉森（Hansen）发展的门槛面板模型，将人均收入作为门槛变量，通过对数据进行自动识别来确定门槛值，以避免人为划分人均收入的变动区间带来的偏误，在确定了最佳的门槛数量和检验之后，确定相应的模型并进行参数估计，揭示 FDI 对于 GDP 的影响方向与程度。

（一）变量选定与数据来源

FDI 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会起到相对更明显的效应，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大的技术和管理制度差异，本质上是资本的综合比较优势地位，该优势只有在能为输入资本提供更有利的市场机会条件下，才会持续下去，激发出市场的潜力和更大一轮的投资效应。如果东道国实施更加开放的政策，输入资本的投资效用也会被放大。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从新市场的启动到活跃之间，必定存在一个时滞期。若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梯度不大的条件下，以及可以有效吸收来自于投资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的话，就有很大概率来提升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相反，则会使东道国丧失既有的优势，导致东道国企业的市场萎缩，严重打击东道国的整体经济，最终抵制 FDI 的扩张。可以综合反映东道国吸引 FDI 的能力的指标是人均收入水平。因为人均收入水平一般反映的是一国在技术、资源禀赋、企业活力和人力资本方面的综合能力，直接决定着外资流动的动力与规模。同时，人均收入水平也直接反映了该国吸引外资的能力和所处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自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在不断上升的通道之中（见图 3）。直观地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01 年以前的发展初期，第二阶段是自 2001 年突破了 1028 美元的“贫困陷阱”进入 1000~3000 美元的“起飞期”。2010 年突破了 4000 美元，2014 年达到了 7550 美元。按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 GDP 在 4126~12735 美元的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意味着中国自 2010 年进入了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我们将模型的被解释变量确定为 GDP，解释变量确定为 FDI，以人均收入为门槛变量。

控制变量考虑三个方面：一是在就业总量；二是从未来发展的创新潜力；三是城镇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的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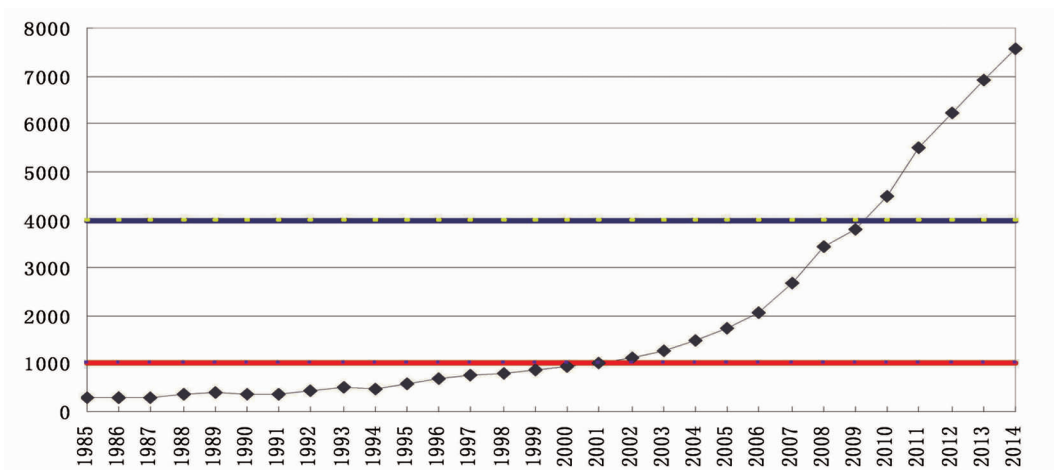


图3 1985年—2014年中国人均GDP（美元）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考虑就业总量是因为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同时加速发展的背景下，FDI在促进相关投资方面应具有显著的带动效应。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刺激更多的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本向外投资，促进东道国的生产和服务的调整；二是实现劳动力的转移和结构性的变迁。劳动力投入的变动将影响到经济总量的变化。然而，在技术升级加快和产业升级与替代的长期过程中，以及地区性的差别，最终将增加还是抑制总产出，存在不确定性，需要经验数据的验证。

决定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该国的创新潜力，其中一个必要的条件是有持续稳定的适龄劳动力比率的供给。换言之，一个社会中的老龄化应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才能为创新提供最为基础的源动力。经济体中劳动适龄人口占比和人力资本投资越高，该国的人口红利就越多。中国经济的增长恰恰进入了人口红利正在衰减的通道。老龄化率自1983年开始至2014年的32年间，除了1993年和1995年有所下降之外，其他年份均是在上升。1996年到2014年，连续增加了19年，年均增长2.43%。如果按照这一增长速度和增长规模，必然会抑制经济的创新能力和增长潜力，FDI的投资水平也会有重大的变化。为研究的方便，本文采用一减去老年化率的方式表示创新潜力，更符合表述的习惯。定义为创新的人口潜力。

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将在很长时间内不会发生质的变化，收入结构的城乡差别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人均收入水平的门槛效应强弱。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增长正在促使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经历着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过程。从1983年的1.8上升到1990年代初的2.4，再一直降到现在的1.8，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取得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成果。

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FDI 按照当年年末汇率换算为人民币，GDP 和人均收入水平（元）（income），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incomu）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元）（incomc）均按照相应的价格指数，以 1983 年作为基年作了价格平减。popu 表示人口的创新潜力。表 1 是对于所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GDP 的变动幅度最大，FDI 的变动程度次之，人口的创新潜力相对变化弱。

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1983 年—2014 年）

	gdp (亿元)	fdi (亿元)	income (元)	incomu (元)	incomc (元)	ratio	popu	emp (万人)
平均	38684.24	841.31	2973.59	1976.34	923.87	2.17	0.93	23474.19
标准误差	6238.80	98.05	450.75	150.55	77.43	0.03	0.00	1487.90
中位数	23128.65	996.32	1845.99	2312.32	1027.46	2.21	0.93	22014.00
变异系数	0.91	0.66	0.86	0.43	0.47	0.08	0.02	0.36
最小值	5998.50	18.18	582.33	564.60	309.80	1.82	0.90	11746.00
最大值	122021.86	1558.04	8920.90	3397.71	1870.17	2.47	0.95	39310.00

注：《中国统计年鉴》没有提供 1983 年—1986 年和 1988 年—1989 年老龄化率数据，本文是按照 1987 年和 1990 年数据相减取年平均值后，分别按照逐年同量变化的趋势填补上了缺失值，因为在上世纪 80 年代，人口的老龄化速度相对上升慢。同时，为使估计系数不至于过于太大，将老龄化率扩大 100 倍，不影响模型的估计结果。

（二）实证研究

根据研究的目的，我们设定的计量模型如下式（1）：

$$lgdp_t = \beta_0 + \beta_1 \cdot lfdi_t + \beta_2 \cdot lfdi_t \cdot lincome_t \cdot I(q > \gamma) + \sum_{i=1}^n \alpha_i \cdot x_t + e_i.$$

（1）

其中，lgdp 代表被解释变量，x 是控制变量，包括了就业水平 lemp，创新潜力变量 popu，城乡收入比变量 ratio，收入水平 lincome，同时也是作为门槛变量，γ 为特定的门槛值。为降低异方差程度，除城乡收入比变量之外，对其他变量均作对数处理。I(·) 是示性函数。e 为随机干扰项，服从独立同分布，t 表示年份。

如前所述，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从 1983 年到 2014 年的 32 年时间内，经历了快速的增长过程，总体上从低水平阶段进入了“起飞阶段”，又从起飞阶段开始进入了“中等发达阶段”。每一阶段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为避免直观人为划分收入水平阶段的主观性，我们用数据本身的特点来分析更有解释力。

首先要确定门槛的数量。为严谨起见，我们初步划分为三个阶段，相应地确定为两个门槛值。然后再根据统计显著性判断选择两个门槛值还是一个门槛值。确定门槛值的

具体方法是根据人均收入从低到高，分别作固定间隔的步长，估计不同门槛值的对应模型的残差平方和，以最小残差平方和模型所对应的收入水平为门槛值。

第一轮搜索结果确定的第一个门槛值是 1389 元，达到这一收入水平是在 1994 年。固定第一个门槛值之后，进行第二轮搜索寻找是否还存在着其他门槛值。搜索发现第二个门槛值是人均国民收入达 6609 元，这是 2010 年的收入水平。为进一步验证第一次搜索结果的准确性，我们固定第二个门槛值重新搜索第一个门槛值，结果发现第一个门槛变为 1460 元，达到该水平的年份是 1995 年。因此我们可以将第一个门槛值确定为第三次的搜索结果。图 4 显示了三次搜索的综合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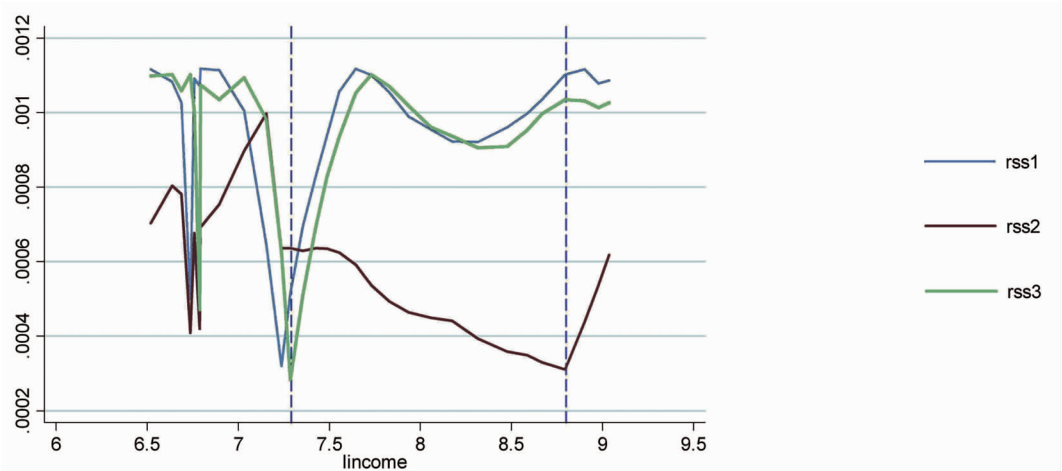


图 4 三轮搜索门槛值的结果

注：rss1、rss2、rss3 分别代表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搜索得到的残差平方和。

为便于比较，我们分别构建无门槛效应模型（1），以 1995 年收入为单一门槛的模型（2），以 2010 年为单一门槛的模型（3），同时以该两年为界的双门槛模型（4）。相应的参数估计结果列于下表 2 中。

表 2 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1)	(2)	(3)	(4)
<i>lfdi</i>	0.0142***	0.00704***	0.0140***	0.00676***
	(5.57)	(4.26)	(5.42)	(4.20)
<i>lemp</i>	0.254***	0.216***	0.247***	0.205***
	(8.53)	(12.73)	(7.58)	(11.56)
<i>lincome</i>	0.979***	0.969***	0.977***	0.965***
	(68.16)	(121.78)	(64.65)	(120.42)

续表 2

解释变量	(1)	(2)	(3)	(4)
<i>popu</i>	0.612	-0.762*	0.187	-1.371**
	(0.90)	(-1.86)	(0.19)	(-2.51)
<i>ratio</i>	0.0235**	0.0603***	0.0251**	0.0629***
	(2.14)	(7.94)	(2.20)	(8.36)
<i>xdd10</i>		0.000555***		0.000561***
		(7.90)		(8.23)
<i>xdd20</i>			-0.0000679	-0.0000949
			(-0.61)	(-1.63)
<i>_cons</i>	-0.583	1.102**	-0.0960	1.802***
	(-0.73)	(2.27)	(-0.08)	(2.83)
<i>N</i>	32	32	32	32
<i>F</i>	122577.8	343227.6	99682.3	313744.0
<i>AIC</i>	-225.6	-263.6	-224.0	-265.0
<i>BIC</i>	-216.8	-253.3	-213.8	-253.2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xdi 表示门槛变量在 2311 元时收入与哑变量的乘积项；xddi 表示门槛变量在 960 元时收入与哑变量的乘积项。

从表 2 可以发现引入外资的政策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这是一个稳健的估计结果。分别比较四个模型的结果是，无门槛模型的效果最差。单门槛模型未全面反映 32 年来 FDI 对 GDP 波动式进展的推动效应。相对而言，以 1995 年的收入水平划分的模型估计结果要好于以 2010 年收入水平划分的模型估计结果。第四个模型在整体显著性的指标 F 值，最小信息准则（AIC）和贝叶斯（BIC）信息准则方面，均优于其他三个模型，同时双门槛的系数估计结果也均显著。

具体来看，人均收入水平整体上促进了 GDP 的增长，弹性系数达到 0.97。1995 年之前，是人均收入水平快速变化的阶段，也是 FDI 大幅波动的时期。同期的 FDI 也出现了异常的波动，既有 1992 年和 1993 年的创记录的 153.07%和 135.42%的增长率，也有在 1989 年大幅下降 7.55%的历史记录。同期中国的 GDP 增长也呈现出过热的情况尤其是 1993 和 1994 年表现最为突出。

1995 年之后，人均收入增速也开始稳步提升，即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见图 5）。在此期间，国家相应地在许多领域放宽了外资的流入，如商业、金融保险、航空、律师、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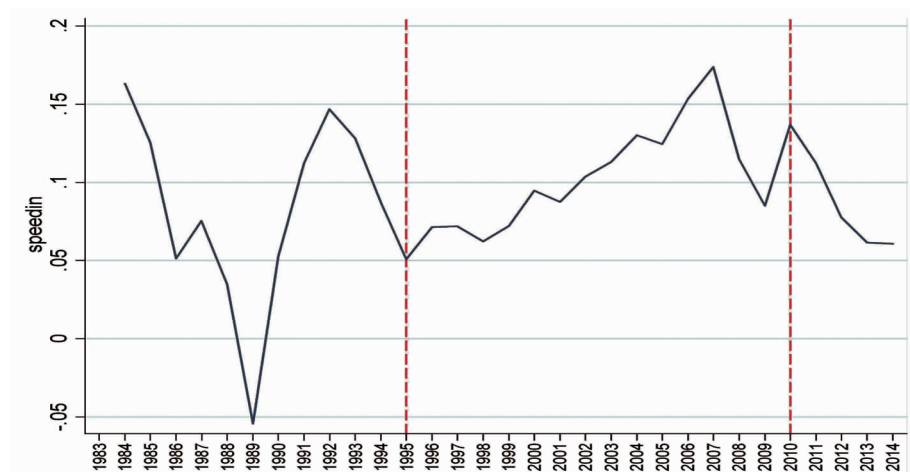


图 5 1983 年—2014 年中国人均收入增速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计领域，以及土地开发、房地产、宾馆、饭店、信息咨询和基础设施、能源和交通等领域。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和承诺，自 2002 年对投资准入的限制大幅度放宽，鼓励类目录由 186 条增加到 262 条，限制类目录由 112 条减少到 75 条，逐步开放金融、保险、电信、物流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鼓励外商投向中西部地区。尽管在 2007 年爆发了金融危机，但是政府出台的系列救市措施保持了人均收入还是处于增长的通道之中。在这一阶段，FDI 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在人均收入不变的前提下，GDP 相应会增加 0.06 个百分点。如果我们考虑到同时还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而收入水平在该阶段内基本上处于上升期，则进一步放大了 FDI 对于 GDP 的促进效应。这是一个良性的可以有效发挥 FDI 对于 GDP 拉动效应的通道。

然而，扩张的经济刺激政策自 2010 年后效用开始下降，相应的国民人均收入的增速也开始下降，进入了第三个阶段。FDI 对于 GDP 的拉动弹性在人均收入不变的条件下，下降了 0.01 个百分点。在此阶段，如果要维持 FDI 对于 GDP 的拉动效应不致减少太多，只能将人均收入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显然会导致我们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往往在过快的增长过程中将前期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与释放，往往难以得到有效调整。若源于发展战略偏误或有来自于外部的巨大的经济冲击，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如墨西哥、智利、巴西、菲律宾、马来西亚、南非以及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等，在 20 世纪 70 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就长期停滞于 4000~12000 美元阶段。

就中国而言，如何恢复到可以通过 FDI 促进 GDP 增长的第二阶段的通道之中，则需要中国的对外开放领域进一步拓宽，而不只是投资额的简单扩张。事实上，中国引进外

资自上世纪的 90 年代中期出现了拐点（见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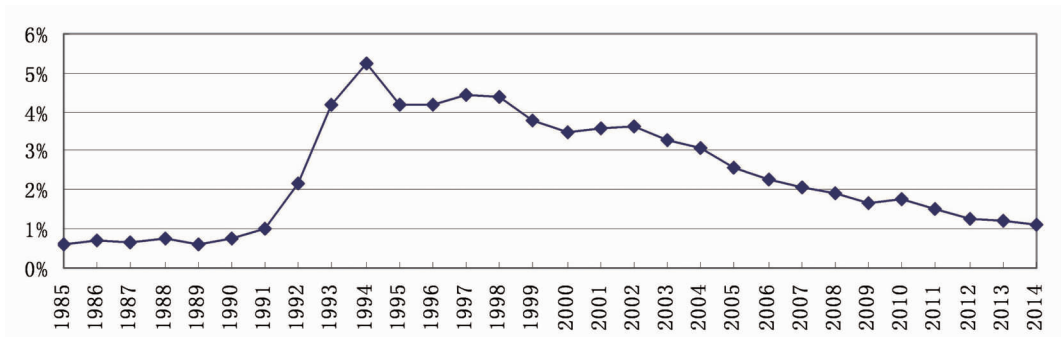


图 6 1985 年—2014 年 FDI 占中国 GDP 的份额变动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如前所述，一些就业效应突出的服务业行业领域，如教育、健康、医疗、金融、文化创意等领域，虽然在政策上有了突破，但开放程度不及预期，实际上操作过程中存在着玻璃门，还有就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要多于效率的视角。正是这些投资领域存在的事实上的限制，导致外资投资的边际效应逐渐降低，对于 GDP 的拉动作用不断下降。

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就业、人均收入水平和城乡收入比三个变量，均显示为正的弹性系数结果。如果前三个因素对于中国持续提升增长起到了预期的效果的话，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大所起到的经济拉动效应并不可持续。但从目前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来看，在短期内抑制这一趋势也并不现实。

创新潜力对于经济的提升作用表现为负数，表明中国的人口红利在过去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在未来中国的人口结构继续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创新的潜力必然会受到抑制，同时大幅增加企业的人力成本，从劳动力总量供给与劳动力成本两方面制约企业的发展，从根本上降低了对于外资的吸引力。

在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和国内经济不确定性放大的背景下，外资的引进规模出现了波动，实际上是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而不易被重视的信号，即真正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是投资者可以对目标市场有稳定预期的国家和地区，对于需要外资的国家而言，最需要的是提升对外资所内含的先进技术、管理制度和管理文化的消化与吸收能力，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外来资本内在的逐利本性和外在的三个条件会决定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方向和规模。FDI 流动的持续性则取决于东道国是否从外来的资本中获益以及获益程度。基于邓宁的

理论在全球化进展到现阶段依然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基于中国的经验，部分因素尤其是人均收入水平显示出更加突出的作用，从深层次上决定了资本的流入趋势。要形成有利于资本持续流入的机制，未来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

（一）完善竞争市场制度

FDI 对于 GDP 的促进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均收入水平。在人均收入水平进入上文分析的第三个阶段之后，如果收入水平不能有效提升，那么 FDI 对于 GDP 的负效应将会被持续放大，不能恢复到第二阶段的通道之中。

要提升国民收入水平，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做出实质性推进：第一是创造更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推进对内对外开放的立法、执法与司法建设，特别是完善中国的外资引入制度，使外资政策向国际规范化靠拢。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并增强信息透明度。第二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和完善权力清单制度。引导外商投向生产性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健全全社会诚信体系，创造和维护起可调动各类所有制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和创新潜力以深度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大环境。第三是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行先试作用，逐步在天津、福建、广东和其他沿边、内陆等不同区域设立自由贸易园区，合法推进外资准入进程，探索外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由过去靠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转变为靠市场机制、开放环境吸引外资。

这是通过引入 FDI 以提升中国居民收入的长期决定性因素，也是持续与外资形成共赢局面的必由路径。

（二）降低企业运行成本提供就业岗位

市场的活跃度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活力和对资本的吸引力。中国目前亟需的是给企业降低运行成本，推动供给侧的改革，即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的压力下，降低企业的税负压力，扶植企业应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在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和降低企业运行成本的双重作用下，直接的效果是提升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国民收入的增加，进而促进 FDI 对于 GDP 的拉动作用。

（三）加大中西部的投资力度

中国在经济总量周期性波动的同时，也存在着地区性失衡，而外资逐利的天然属性也必然存在着地区性的差距，而中国的中西部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地区最需要外资的支持。为此，一方面需要加大硬件投资。想要缩小地区 FDI 差距，就必须提高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通过改善投资硬件环境来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加大对基础设施的

建设，并带动民间资本的介入，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另一方面，中国引入外资的最终目标是逐渐弥补自身的技术差距，提升管理水平，并带动自身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将直接决定着承接 FDI 和技术创新及商业模式创新的能力。决定目标实现程度的重要因素是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承接 FDI 的能力、技术创新的能力。在人均收入提升的基础条件下，进一步加大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形成良性的循环。通过加大研发投入，鼓励内资企业对国外技术人才、品牌、营销网络等创新要素的吸引和使用，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人才培养的质量，进而以人才战略的完善推动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实现产业升级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四）优化外资产业结构

吸引外资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等领域，大力吸引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电子通信、金融保险、医疗教育等领域外资，在中国区域中心城市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投资研发中心、设计创新中心、财务结算中心、教育培训中心、总部基地等高端服务业。

同时推动服务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旅游、外贸、金融、保险等领域的利用外资，加强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现代农业方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加速先进技术转移和扩散，放宽高技术 FDI 准入门槛，限制低技术含量的项目进入。

参考文献：

1. 王晓红、沈家文：《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与趋势展望》，《国际贸易》2015 年第 3 期。
2. 秦晓钟：《浅析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特征》，《投资研究》1998 年第 4 期。
3. 何洁：《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世界经济》2000 年第 12 期。
4. 沈坤荣：《外国直接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管理世界》1999 年第 5 期。
5. 陈浪南、陈景煌：《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02 年第 6 期。
6. 王成岐、张建华、安辉：《外国直接投资、地区差异与中国经济增长》，《世界经济》2002 年第 4 期。
7. 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 7 期。
8. 陈涛涛：《中国 FDI 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研究》，《世界经济》2003 年第 9 期。

-
9. 严兵：《以竞争换技术战略与外资溢出效应》，《财贸经济》2005 年第 1 期。
 10. 严冀、陆铭、陈钊：《改革、政策的相互作用和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世界经济文汇》2005 年第 1 期。
 11. 潘文卿：《外商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世界经济》2003 年第 6 期。
 12. 江小涓、李蕊：《FDI 对中国工业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贡献》，《中国工业经济》2002 年第 7 期。
 13. 江小涓：《利用外资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管理世界》1999 年第 2 期。
 14. 江小涓：《内资不能代替外资》，《国际贸易》2000 年第 3 期。
 15. 江小涓：《吸引外资对中国产业技术进步和研发能力提升的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04 年第 2 期。
 16. 张卫东、熊广勤：《中部地区的 FDI 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华东经济管理》2005 年第 12 期。
 17. 杨俊龙、张媛媛：《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宏观经济管理》2004 年第 7 期。
 18. 张琴：《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2 年第 4 期。
 19. 周燕、王传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转变效应实证分析》，《中国软科学》2008 年第 3 期。
 20. 平新乔等：《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的溢出效应分析》，《世界经济》2007 年第 8 期。
 21. 姚洋、章奇：《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分析》，《经济研究》2001 年第 10 期。
 22. 包群、赖明勇：《中国外国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实证研究》，《经济评论》2002 年第 6 期。
 23. 祖强、梁俊伟：《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行业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5 年第 9 期。
 24. 李文臣、刘超阳：《FDI 产业结构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产业对策研究》2010 年第 2 期。
 25. J . H . Dunning,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 London : Allen and Union, 1970.
 26. J . H . Dunning,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73, (03) .
 27. J . H . Dunning, E . D, Economic Analysis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New York: Praeger, 1974.
 28. J . H . Dunning, Theories and paradigms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ctivities, The selection essays of John H Dunning. VOL 1, Cheltenham, UK.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2002.
 29. Aitken B, Harrison A, Do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ro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Venezuel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89) .
 30. Haskel E, Pereira S, Slaughter M, Does Inward Foreign Investment Boost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irm. NBER working paper8724, Cambridge, March, 2002.

31. Sjöholm, Productivity Growth in Indonesia: The Role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9.

32. Becker, R. , W. Enders and Lee, J. A, stationarity test in the presence of unknown number of smooth breaks. Journal of Time Series Analysis, 2006 (27) .

33. Balasubrananyam, Y, Salisu. M, Sapsford, 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rowth in EP and IS Countries. Economic Journal, 1996 (106) .

34. Caves, R. E, Multinational Firms,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Host – country Markets. Economica, 1974 (41) .

35. BLOMSTROM, M. , PERSSON, 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Spillover Efficiency in an Underdeveloped Economy: Evidence from the Mexic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orld Development, 1983, (11) .

36. MARKUS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s a Catalyst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 (2) .

37. ING IVARSSON, CLASE GORAN ALVSTAM, Local Technology Linkage and Supplier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The Case of Swedish Engineering TNCs in Emerging Markets . Competition & Change, 2009, 13 (4) .

38. Richard A. Brecher, Ronald Findlay, Tariffs, foreign capital and national welfare with sector – specific facto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3 (5), volume14, issues 3 – 4.

39. Carkovic, M. Levine R,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celerate Economic Growth.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ay, 2002.

40. Haddad M, Harrison A, Are There Positive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ed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for Morocco.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3 (42) .

41. Kokko, Technology, Market Characteristics and Spillover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4, 43.

42. Blomstrom M, Globerman S, Kokko A. The Determinant of Host Country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the Literature. SSE/EFI Working paper serie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October, 1999.

43. Ari Kokko, Technology, Market Characteristics, and Spillovers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4, (43) .

44. Gabor Hunya, Restructuring through FDI in Romanian Manufacturing. Economic Systems, 2002, (26) .

(下转第 93 页)

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国家战略研究

李罗莎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了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国家战略内容、观点与重大意义。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是以中国内蒙古通往蒙古国和俄罗斯中部、直达北冰洋入海口南北大通道，其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地位无可替代。指出这条走廊是中国面向北亚经济圈大开放和密切北亚区域合作新窗口。强调了内蒙古桥头堡的战略地位、蒙古国的战略重要性、以及水资源合作应成为重中之重。

关键词：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 水资源 内蒙古 国家战略

作者简介：李罗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前言

2014年9月11日中俄蒙元首会谈中，习近平总书记提议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发展战略进行对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提出，建设经济走廊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最佳路径选择。

一、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国家战略意义与可行性

（一）经济走廊概念实质

目前，中国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规划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

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建设（见图 1）。这六大经济走廊建设，有助于把中国“一带一路”重大战略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结合，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起示范和推动作用。



图 1 “一带一路”海上战略支点定位地图

（二）中蒙俄经济走廊国家战略

经国务院批准，中蒙俄经济走廊纳入国家战略版图。中蒙俄经济走廊分成两条路线：一条从东北地区到满洲里、再到俄罗斯和蒙古国（东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另一条从华北京津冀地区到呼和浩特、再到蒙古国和俄罗斯（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两线中蒙俄经济走廊互动互补，统称“中蒙俄经济走廊”国家战略。

从通道经济和区域经济角度看，若仅有东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则存在不足：一是进入蒙古国通道不经济。东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在境外绕行 200 多公里才进入蒙古国东部乔巴山，且不是蒙古国中心地带。二是区域经济合作不广泛。东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强化了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但无法覆盖和带动整个北亚区域经济活动与经济增长。

因此，构建一条连通中国内蒙古、蒙古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管区（位于西伯利亚地区中部）的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非常必要。这条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一可发挥内蒙古联通俄蒙两国的区位优势；二可实现与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对接；三可助力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实施；四可为中国环渤海区域和华北地区建起经蒙古国、俄罗斯到达欧洲的最便捷通道；五可把广袤的北亚区域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经济发展进一步带动起来。

（三）构建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是国家战略重大抉择

中蒙俄互为邻国，中蒙边境线长达 4710 公里，俄蒙边境线长达 3543 公里。蒙古国和俄罗斯是“一带一路”北亚沿线最重要国家，对于中国具有特殊战略价值，强化中蒙俄

地缘战略合作，是三国关系稳定的重要前提。

中蒙俄互为战略伙伴，在铁路运输、物流、农产品和矿产品、贸易便利化、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已有良好基础，更有开展全面合作的巨大潜力。构建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就是要把中方“一带一路”战略同蒙方“草原之路”倡议、俄方跨欧亚大通道建设有机结合，打造命运共同体。这不仅可以为中蒙俄三方合作提供新平台，给三国人民造福带来实惠，也必将为亚欧大陆振兴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俄罗斯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地区、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以及蒙古国构成的北亚地区，是目前世界上资源最富集、发展潜力最巨大但整体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通过构建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可把北亚地区目前尚未充分开发利用的地球上最大资源宝库，与中国倡导的节能减排、生态保护、低碳经济等一系列长治久安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结合，其长远收益是无法估量的。这不仅能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与合作共赢的大外交战略更加全面，更将是一项促进北亚地区包容性发展，从而带动整个欧亚大陆、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因此，构建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是中国新世纪国家战略重大抉择。

（四）构建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战略意义

构建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对中国节能减排、生态保护、发展低碳经济均有重要战略意义，特别对中国联通欧亚经济大通道及“北冰洋通航”具有极其重要战略意义。

1. 对国家能源资源的重要战略意义

当前，中国进入资源能源短缺时代。距中国最近的蒙古国矿产资源十分丰富，有世界上最大铜矿和世界上最大煤矿。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石油、天然气、以及森林资源则更为丰富。如果中国与蒙古国进行矿产资源合作、与俄罗斯开展石油、天然气和森林资源合作，对于解决中国未来发展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源问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而构建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是解决中国战略资源短缺的一个重要平台。

2. 对国家生态保护的重要战略意义

中国北方地区，最为严重环境生态问题是荒漠化和沙尘暴。专家指出，中国华北地区沙尘暴有44%来自内蒙古，而56%是来自蒙古国。中蒙两国可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蒙古国绿色发展政策的框架下，扩大生态环保合作，包括荒漠化防治、水资源保护与利用、森林及草原保护等领域的合作。而构建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是中蒙两国共同进行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彻底消灭这个地区荒漠化和沙尘暴的一个重要合作平台。

3. 对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战略意义

中蒙俄在清洁能源，特别是在风能、太阳能开发合作方面有极大潜力。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是风能、太阳能以及生物能源极为丰富的地区，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具有相当丰富的资源潜力，因而三国在开发利用清洁能源和发展低碳经济方面有广阔合作前景。而构建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则是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搭建一个重要平台，可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和清洁能源做出重要贡献。

4. 对联通欧亚经济大通道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要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目标，一定要建立更多的“欧亚大陆桥”。当前，中国国内有很多欧亚大陆桥方案已经或准备实现之中。从中国面向北亚地区大开放的角度看，内蒙古目前最发达的呼包鄂中心，拥有与华北发达地区及华中、西北等内陆地区相联结的最重要的战略枢纽位置，而构建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是建设中国中西部内陆地区通过蒙古国与俄罗斯的最新欧亚大陆桥的一个最佳平台，对中国联通欧亚经济大通道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5. 对即将到来“北冰洋通航”时代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全球气候暖化，令北冰洋的冰山以破纪录速度融化。在未来 10~20 年内，北冰洋可能出现通航大道。北冰洋航道全面开通，将会改变现有世界经济格局。通过构建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可以使中国中西部地区与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管区联结起来，并形成以新欧亚大陆桥为基础直通北冰洋出海港口的新铁路大动脉，那么在未来北冰洋成为世界又一新的海洋大通道后，中国可以占据到一个有利战略地位。这就是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对于即将到来的“北冰洋通航”时代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

（五）构建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可行性

新世纪后中蒙俄在北亚地区已有良好经济合作基础。中蒙俄三国间政治关系有较高水平。三国都经历了从过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有着相同的发展经历，同处于发展中阶段，经济互相依赖，政治层面立场接近，这都成为三方合作稳固的基础。进入新世纪后，首先是中蒙经济合作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蒙古第一贸易伙伴国，第一大投资国和最大援助国之一，特别是两国企业之间合作项目已进入建设新阶段。目前，中蒙两国企业大项目合作主要包括：山东电力基本建设总公司承建的蒙古南戈壁输电线项目，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的蒙古国乌兰巴托市政工程项目，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奥尤陶勒盖（OT 矿）项目，中国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 OT 矿风电融资项目，神华集团与蒙古能源资源公司、日本住友商事株式会社组成联合体获得与蒙政府开展的塔温陶勒盖煤矿（TT 矿）开发综合项目，被誉为“中蒙友好合

作典范”的中国有色集团与蒙古国图木尔廷敖包合作的锌矿项目，是中蒙矿业领域最大合作项目。

其次，进入新世纪后中俄两国经济合作关系也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中俄从早前以双边贸易和民间投资为主的阶段，转向以能源、资源和高技术合作为主，以及政府主导大规模投资合作的新阶段。尤其 2009 年以来，中俄在能源资源开发合作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突破。同时中俄在高技术合作方面也跨上历史新台阶。过去，中俄虽然在国家层面开展合作，但与中国相邻的俄罗斯东西伯利亚、远东地区态度不积极。近年来这一态势发生转变，与中国东三省开展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俄远东地区领导人对华合作积极性高涨，如，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行政长官公开表示“中国是一个无法阻止的强大火车头，我们应当坐上这个火车头并一同驾驭局势”。这种高涨的积极态势成为近期中俄远东合作关键“推动力”。这种中央与地方齐声呼唤中俄合作的场面还不多见。2014 年 7 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署了合同，计划开发俄罗斯远东地区，将建设长达 4000 公里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据蒙古国经济发展部估计，这条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不通过蒙古国，管道建设将会长达 4000 公里，若通过蒙古国则只需要 1500 公里管道建设。如果俄蒙中三国天然气管道一旦建成，蒙古国经济发展将会迅速提升，促进煤炭等生产能源大量出口，由此，蒙古国积极向俄罗斯建议共同实施“草原丝绸之路”项目，希望将蒙古国“草原丝绸之路”项目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结合起来。

综上所述，新世纪后中蒙俄在北亚地区已有良好的经济合作基础，为构建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奠定了深厚的可行基础。

二、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国家战略构想、内容与举措

（一）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国家战略构想

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国家战略总体构想：把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同蒙古国“草原之路”和俄罗斯跨欧亚大通道建设结合，以位于丝路经济带核心地位的内蒙古与蒙古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管区（位于西伯利亚地区中部）为中心区域，东连京津冀及渤海湾经济带，西连欧洲大陆，构建一条与蒙古国和俄罗斯连接的国际铁路大通道，一个既穿过蒙古国境内，又是亚洲临太平洋地区通向欧洲里程最短的新欧亚大陆桥。即通过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将中国环渤海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链接起来，形成一条从亚洲到欧洲潜力巨大的北方大通道。

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国家战略的要点：一是以走廊为载体，把中俄蒙三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对接，使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

议有效结合起来；二是把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现对接；三是建立中俄蒙新战略通道，推动欧亚大陆桥交通一体化；四是使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成为中蒙俄三国迈向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平台和主要抓手；五是使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成为中国向北开放重要窗口，推动中国经济与北亚经济深度融合。

（二）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主要内容

一是建设中蒙俄国际铁路大通道。可依赖已有线路来构建，比如通过京津冀—呼包鄂—二连浩特—乌兰巴托这条国际线路，形成中国京津冀进入蒙古国中心地带或蒙古国进入中国京津冀的里程最短的国际铁路大通道。关于这条中蒙俄国际铁路大通道，目前三国已有共识，正在积极商谈。

二是建设从蒙古国南戈壁省的世界最大铜矿（OT 矿）和世界最大煤矿（TT 矿）出发的一条南向专门铁路通道。即从距中国内蒙古边境仅 200~300 公里的南蒙 OT 矿和 TT 矿修建矿区专用铁路（普通标准轨），直接南下进入内蒙古后并入中国铁路网。这条专用铁路通道对中国具有特别重要意义。这项矿区专门铁路通道合作已谈了多年，并取得一定进展，应当成为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加以推进和完成。当前，因为还没有这条矿区专门南向铁路通道，蒙古国 OT 矿和 TT 矿的矿产出口，要么是卡车运输到中国，要么是通过漫长曲折的铁路运输到俄罗斯东部出海口。

三是建设立体化交通和全方位、网络状的大联通。加强建设“三带合一”（物流带、产业带、开放带）、“四路并进”（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立体化交通和全方位、网络状的大联通，既包括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大联通，也包括贸易、投资、金融等便利化大联通。重点推进通关和运输便利化，促进过境运输合作，研究三方跨境输电网建设。开展旅游、智库、媒体、环保、减灾救灾等领域务实合作。

四是将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与环渤海港口群连接起来。环渤海港口群作为经济腹地的贸易口岸，对地区经济规模特别是外向型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不仅会助力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实施，也必然给环渤海港口群的整合升级拓展带来新的动力。

（三）加大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力度的推进措施

为加大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合作力度，提出如下强力推进措施：

一是将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国家战略构想提升为国家战略，得到中央层面的高度重视和批准。

二是秉持共商、共建和共享理念，着力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跨境合作协议网络体系。

中蒙俄三国政府机构紧密合作极为重要，要充分发挥现有联委会等双边机制的作用，共同研究顶层设计、合作规划，推动签署合作备忘录或协议，加快海关、外汇、签证等领域合作，逐步消除商品、资金、人员等生产要素跨境流动障碍，致力为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提供切实有力支持。

三是在政府引导下，遵循国际通行规则，指导企业有序参与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活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企业的主体作用。

四是为建设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提供资金链。不断深化中蒙俄金融合作，可以通过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多种方式提供融资支持，同时采取金融创新方式带动民间资本（如 PPP 模式等），使资金链能满足大型基建需求，并在合作中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

五是建立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长期合作机制。使“中蒙俄经济合作论坛”和“中蒙俄经济博览会”成为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议事、决策、交流与协调的平台，进而成为中蒙俄三国合作机制重要组成部分。

三、蒙古国在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地位

蒙古国对中国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蒙古国与中国腹背相依，接壤边界线长达 4710 公里。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蒙古国南下可直逼华北京津；西进可切断中国新疆与内地联系，东进则可阻断东北地区与关内交通。蒙古国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程度是其他邻国无法相比的。为使中蒙两国不是成为相互担心的国家安全威胁，而是成为保障对方国家安全的战略屏障，必须使两国真正结成利益攸关的战略伙伴，进而成为命运共同体。而构建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就是发展新世纪中蒙俄全面友好合作关系、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最重要平台之一。

蒙古国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能源，矿业立国是蒙古国经济发展新引擎。蒙古国有 80 多种矿产，其中煤炭蕴藏量约 1520 亿吨、铜 2.1 亿吨、铁 20 亿吨、磷 2 亿吨、黄金 3100 吨、石油 80 亿桶。蒙古国的出口 90% 以上是矿产，其中 90% 以上销往中国，蒙古国是中国战略性矿产进口国。自 1990 年以来，20 年间中蒙经贸规模增长 50 倍。中国连续 15 年成为蒙古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投资来源国、产品出口国和最大援助国之一。蒙古国近年来发展主要依靠资源开发，单一资源出口驱动模式，不可能支持蒙古国可持续发展。而交通等基础设施问题长期制约着经济发展，蒙古国境内只有连接北京和莫斯科的国际大通道，铁路和公路建设严重滞后。

蒙古国是中国“一带一路”西出起点之一。蒙古国在“一带一路”、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有着独特战略地位和优势。蒙古国领导人已认识到，参与“一带一路”带来

的不仅是发展机遇，还有振兴经济的希望。通过参与“一带一路”来提升国际地位、加快促进蒙古国民经济发展、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已成为蒙古国社会共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4 年，蒙古国提出了“草原之路”对接“一带一路”倡议。“草原之路”实际指新建连接中俄、途经蒙古国的“五大通道”，即 997 公里高速公路、复线铁路、1100 公里电力网线、天然气和石油通道。目前蒙古国正在加紧规划建设连接俄罗斯、俄罗斯太平洋港口的铁路运输网。蒙古国的“草原之路”倡议，凸显了它在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战略地位。

四、水资源在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的重要性

水资源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水资源短缺也是正在实现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在中国北方中部和西部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尤为严重。前些年，中国国内及港台一些专家学者为解决中国水资源短缺，大声呼吁要搞一个规模巨大的“大南水北调”工程，要把中国西南部怒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水系的一部分丰富的水源调往历史上长期缺水的中国北方地区。但是这样一种构想几乎不具备实施的可能性。不仅如此，这些江河虽然发源于中国，但也流经印度等南亚国家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如果我们真要从这些大江大河上游将大量水源调入中国北部，势必给这些周边国家带来严重影响甚至生存危机，从而引发严重的国际纠纷。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一项比较现实的、分别从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调水，并形成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调水线路的“南水北调”工程。但是这项工程毕竟是对本国宝贵水资源进行“再分配”。一方面，即使这项工程全部完成，仅靠长江所调水源，也远远解决不了整个中国北方长期缺水的严重困境；另一方面，从长江水系大量调水会不同程度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水源开发和利用，并且对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长江水源本身目前就已面临不断减少的问题。

然而，距离中国北方最近的蒙古国水资源相当丰富。蒙古国水资源总量为 1920 亿立方米，其中河流与湖泊水资源为 1800 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为 120 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为八万立方米，是全世界人均水资源的九倍，是中国人均水资源的 34.8 倍。

更重要的是，距离蒙古国边境正北 200 公里是俄罗斯西伯利亚的联邦管区的贝加尔湖，它是世界上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其总水量约 23.6 万亿立方米，约占世界淡水总量的 20%。这个被称为“西伯利亚之海”的贝加尔湖虽在面积上是世界第八位，但它最深处达到 1637 米，平均水深超过 700 米，依靠这样的深度，贝加尔湖容纳了全球地表 1/5 的淡水总量。贝加尔湖不仅水量充足，而且极为清澈，水质极好，可以直接饮用。但这个巨

大淡水资源宝库竟然几乎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千百年来每年都有大量高清澈高含氧的湖水白白地流入了北冰洋。而在注入贝加尔湖的 300 多条河流中，最大的一条色楞格河就是发源于并主要流经蒙古国。

因此，有许多人开始提出和关注从俄罗斯的贝加尔湖调水经过蒙古国进入中国北部地区的“北水南调”工程。如果充分利用中国的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将俄罗斯边境及蒙古国北部相当丰富的水源调往严重缺水的蒙古国南方和中国北方，实现“北水南调”，那不仅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国北方严重缺水的状况，而且也会对蒙古国南方严重缺水状态起到极大的缓解作用。这对中蒙两国来说，都是一件利于两国百姓福祉和造福后代子孙的大好事。

当然，“北水南调”工程的反对者也有很多理由。一是“北水南调”距离长；二是“北水南调”成本大；三是“北水南调”投资多；四是认为俄罗斯由于担心会对环境和生态造成破坏，对从贝加尔湖调水根本就“不予考虑”。

但是实际上，中国通过与蒙古国及俄罗斯开展合作，大规模将色楞格河河水和贝加尔湖湖水引向严重缺水的蒙古国南方和中国北方地区，这样的“北水南调”工程是存在可行性的。

一是由于包括色楞格河和贝加尔湖在内的蒙古国北部地区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淡水资源极其丰富，“北水南调”引出的水对于这个地区极其丰富的水资源而言只是九牛一毛。这个地区是地广人稀，水资源几乎完全是白白地流向北冰洋，因此开发“北水南调”工程，不会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环境生态和人民生活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

二是现在中国已全面对外开放并融入世界经济，寻求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水资源对于国家人民生活、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远比能源和矿产资源更具战略重要性。因为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有很大可替代性，例如风能、太阳能、核能的开发利用，已成为今后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而水资源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在水资源方面，中国更应该跨出国界，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合作，“用别人丰富的资源来弥补我们短缺的资源”。

三是俄罗斯反对从贝加尔湖“北水南调”的态度近年来已有发生改变的迹象。早在 21 世纪初，蒙古国就提出了“北水南调”构想从俄罗斯贝加尔湖引水到中国，然而俄罗斯对蒙古国这个“北水南调”态度相当明确，不允许蒙古国在色楞格河上建坝，因为该河是跨境河，是流入贝加尔湖最大的重要河流。由于“北水南调”源头是从俄罗斯贝加尔湖调水，俄罗斯的态度当然就成为决定性的问题。但是某种变化正在发生，俄罗斯国家战略将会发生重大转折，不再以“自己消费”的态度来对待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巨大

而丰富的资源，要让这个全世界最丰富的水资源在国际水产品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毫无疑问，这将成为中蒙俄三国有可能开启“北水南调”合作的一个最新和最重要的信号，也为过去人们认为完全没有希望的事情提供了重要转机和可以进行研究和探讨的重要前提条件。

综上所述，中蒙俄三国开展水资源国际合作、实现“北水南调”宏伟目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现已存在。通过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这个平台，来切实推进中蒙俄三国“北水南调”合作大项目，具有独一无二的战略重要性。当然，从提出创意、达成共识、规划设计到工程建设，没有三五十年，几代人的努力是办不到的，但再难、再遥远也要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精神。

五、内蒙古在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战略作用

（一）内蒙古拥有构建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独特地缘优势和重要基础

1. 内蒙古独特的地缘优势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管区所构成的区域，是目前世界上各种资源富集、开发潜力巨大且又远未得到开发的区域；从地缘上说，这个区域又完全是内陆地区。因此，只有构建一条新欧亚大陆桥，才能为这个区域能源资源的合作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合作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合作开发利用和生态环保合作，创造出真正得以实现的前提和根本保障。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构想，就是要充分发挥内蒙古自治区这种独特的地缘优势。通过内蒙古与蒙古国及俄罗斯西伯利亚中部区域经济合作，构建一条向北大开放的新欧亚大陆桥，推动整个北亚地区进一步发展繁荣，进而为整个亚洲和世界经济发展做出新贡献。

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战略构想主要是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建立沿边经济带的思路来实现。这个思路凸显出内蒙古依托地缘优势的重要战略地位。要点包括：以内蒙古自治区主要交通走廊为中心线，将各口岸交通走廊转变为经济走廊；以口岸为中心点，通过边疆城镇建设形成边境经济带；以交通线为依托的纵向经济走廊与横向边境经济带融为一体，形成向北大开放格局。同时，以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比较发达的呼包鄂地区为枢纽，构建一条向北开放新欧亚大陆桥，使目前经济发展和交通运输较落后的西部地区宁夏、甘肃、青海等省份都能够“搭便车”，从而对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做出重要贡献。

2. 内蒙古拥有重要基础

内蒙古自治区拥有构建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基础。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内蒙古自治区发生天翻地覆变化，在经济、社会 and 科技的发展、人民

生活、基础设施、文化教育等各领域，都远超蒙古国，甚至也超过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尤其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在构建海陆空立体交通运输网络上得到长足进步。特别是呼包鄂中心地区在发展速度、经济实力、产业竞争力、城市化、城乡居民收入等方面已接近中国发达地区水平。不仅如此，呼包鄂中心地区已成为沟通中国华北、东北和西北经济联系的枢纽。因此，内蒙古呼包鄂中心地区拥有可以成为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能源与资源产业基地、重化工业产业基地、环保产业发展基地、发达农畜产业基地、轻纺食品产业基地、第三产业发展基地、交通与物流产业基地和科教文卫发展中心的重要基础。

内蒙古依托与蒙俄地缘优势，已经成为连接中国与蒙俄贸易的重要枢纽，在中蒙俄贸易中处于重要地位；但中蒙俄贸易快速发展未能拉动内蒙古经济增长。为依托中蒙俄贸易拉动内蒙古经济增长，提出建立内蒙古沿边经济带的思路，以五条主要交通走廊为中心线，将各口岸交通走廊转变为经济走廊；以口岸为中心点，通过边疆城镇建设形成边境经济带。以交通线为依托的纵向经济走廊和横向边境经济带融为一体，保障中国资源供给以及国家经济安全，积极贯彻中国“向北开放”战略，同时促使中蒙、中俄贸易互补性得以实现。

（二）发挥内蒙古建设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作用

内蒙古定位丝路经济带核心区，主要是深化与北亚地区国家的交流合作。

1. 行动方略

自古以来，草原丝绸之路就经由内蒙古出口。围绕“草原丝绸之路”对接蒙俄国家发展战略，内蒙古自治区提出的行动方略包括：

（1）重点依托内蒙古自治区沿边经济带上 16 个常年开放口岸（策克、乌力吉、甘其毛都、满都拉、二连浩特、珠恩嘎达布其、阿尔山、额布都格、阿日哈沙特、满洲里、黑山头、室韦口岸等）和两个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二连浩特、满洲里），加强与蒙古国边境口岸基础设施建设，采取措施提高口岸通关能力。一是积极推动甘其毛都—嘎舒苏海图、策克—西伯库伦口岸升格为国际性口岸（这两个口岸使蒙南戈壁省丰富的煤铜产品能更方便地直接南下进入中国）。二是尽早实现额布都格—巴彦呼舒、老爷庙—布尔嘎斯台、满都拉—杭吉、阿拉哈沙特—哈比日嘎口岸扩大为常年开放口岸。三是加快推进乌力吉—查干德勒乌拉口岸开放。四是建设形成融铁路、公路、航线、光缆、能源通道于一体，连接腹地、对接俄蒙、沟通欧洲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国际大通道。

（2）加强呼包鄂等腹地与沿边口岸对接互补，建设呼包鄂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产品集散输出基地、进口货物转化基地、区域性商贸中心、现代化国际物流中心、中俄蒙

经济文化会展中心等), 打造联接俄蒙与内地的集加工、贸易、流通、中继和进出口服务为一体的经济要枢。

2. “推进器”作用

内蒙古自治区依托“中蒙俄经济走廊”国家战略, 要充分发挥自身在打造西线中俄蒙经济走廊中的“推进器”作用。

(1) 向北开放“推进器”。向北开放, 与蒙古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管区对接, 借鉴北部湾经济圈、“大珠三角”经济圈和大湄公河经济圈等区域经济的合作经验, 探索建立内蒙古、蒙古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管区的“中北亚经济圈”。在能源资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城市建设、科技文化、疫病防治、投融资、水资源等领域开展“中北亚经济圈”区域经济合作。

(2) 建设三条亚欧大陆桥“推进器”。建设三条亚欧大陆桥, 是打造西线中俄蒙经济走廊优先考虑的战略重点。包括: 一是提速改造经满洲里至俄罗斯至欧洲的国际铁路大通道, 贯通满洲里至大连港、营口港的出海通道, 形成海铁联运大通道。二是提速改造经二连浩特、乌兰巴托至莫斯科至欧洲的国际铁路大通道, 不断提升与各支线的联通能力。三是打通经临河—哈密—阿拉山口—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国际铁路大通道, 打通环渤海湾地区通往新疆的便捷高速通道。同步推动经由呼银兰乌到西亚的高铁建设, 配套开通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和中部经济区通往欧洲的货运班列。

六、政策建议

(一) 将打造“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成为带动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最重要战略举措

将打造“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上升至国家层面, 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作为带动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最重要战略举措。

(二) 成立中蒙俄三方“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合作建设委员会”和联合工作组

一是成立中蒙俄三方“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合作建设委员会”。下设“国家安全工作小组”“绿色能源工作小组”和“水资源合作工作小组”。研究制定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规划, 包括建设具体内容、运作机制、路线图和时间表。引领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顶层设计, 推动制定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十年发展规划。

二是建立中蒙俄三方建立部长级会谈机制, 有关政府部门成立联合工作组。按照基

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金融合作“三位一体推进”的总体思路，编制“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早期收获务实合作计划”，及时推出一批易操作、见效快的项目和重点任务，指导企业有序参与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活动。

（三）成立“中蒙俄北水南调大项目合作”领导小组，把“北水南调”打造成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旗舰项目

成立“中蒙俄北水南调大项目合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组织开展可行性研究，提出规划方案，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及“中蒙俄经济走廊”国家战略，并在“中蒙俄经济走廊”重大项目投融资安排中列项。

（四）把内蒙古自治区“草原丝绸之路”建设纳入“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国家战略，充分发挥内蒙古自治区建设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桥头堡的战略作用

要极为重视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国全面陆路接壤及与俄罗斯部分接壤的独特地缘优势，把内蒙古自治区“草原丝绸之路”建设纳入“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国家战略，给予国家特殊政策，从而使内蒙古自治区能够在建设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中发挥极其重要的桥头堡作用。

（五）实施“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国家战略，应充分调动发挥各类企业的主体和协同作用

在推进西线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要充分发挥各类企业的积极作用。在政府引导下，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及企业的主体作用，推动各类企业协同“走出去”，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上北亚区域经济合作。

参考文献：

1. 李罗力：《北亚经济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 年版。
2. 李罗力：《构建北亚经济圈：中国新世纪的重大战略抉择》，《开放导报》2010 年 5 月 13 日。

责任编辑：沈家文、任朝旺

· 产业 发展 ·

进一步拓展农村市场的政策建议

元利兴 詹 琳 聂振邦

摘要：针对当前我国农村市场发展中存在供需、市场体制、社会保障、文化和政府监管等方面的障碍，建议坚持城乡统筹、内源发展的总体思路，有针对性地拓展农村消费、农村要素和农产品“三大市场”，以提高农民收入、加强制度建设、推动市场转型升级、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为重点任务，激活农村市场的“六大动力”，加快农村市场发展，促进我国经济实现扩内需、稳增长、调结构，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助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

关键词：农村市场 拓展 政策

作者简介：元利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博士；

詹 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

聂振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一、农村市场发展现状及制约因素

近年来，我国农村消费市场、要素市场及农产品市场三大农村市场得到快速发展，总体上呈现农村消费市场发展较快，农产品市场发展平稳及农村要素市场处于起步阶段的态势。但对于农村市场发展，仍存在市场自身、体制机制、社会环境、文化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制约因素，要加快农村市场发展就必须破解这些制约因素。

(一) 农村市场发展现状

1. 农村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2000 年—2014 年，农村消费市场规模由 1.5 万亿元上升至 5.4 万亿元（见图 1），年平均增长 16.4%。据预测，到 2020 年，我国农村消费市场规模将比 2014 年的水平翻一番，达到 10.7 万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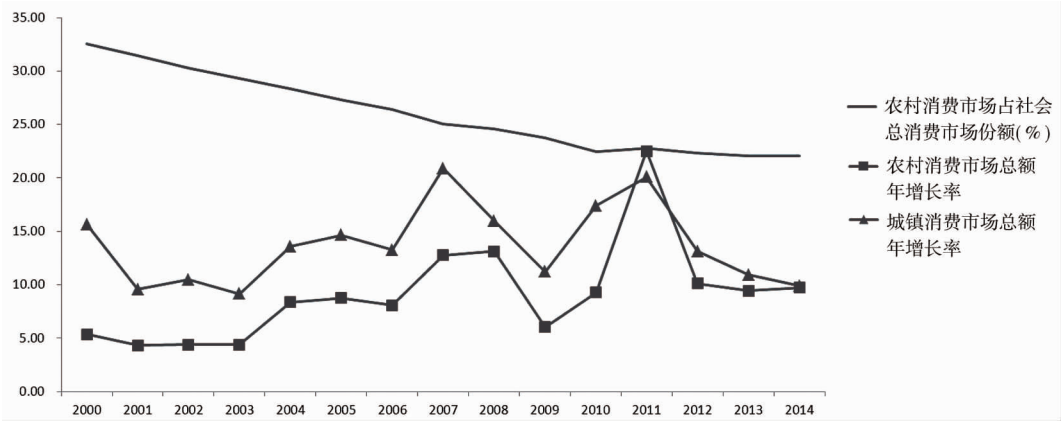


图 1 2000 年—2014 年我国城乡消费市场增长率变化以及农村消费市场比重变化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CEInet Statistics Database），2015。

2. 农村消费市场以生活消费为主，服务性消费和生产性消费不足。农村生活消费市场以农户的衣着等生活资料消费为主，文教、医疗等服务性消费比重保持相对稳定；生产消费市场中农户对生产性固定资产消费少，以非固定资产以外的家庭经营性消费为主。从 2005 年到 2012 年，农村生活消费市场比重逐步上升、生产消费市场比重逐年下降（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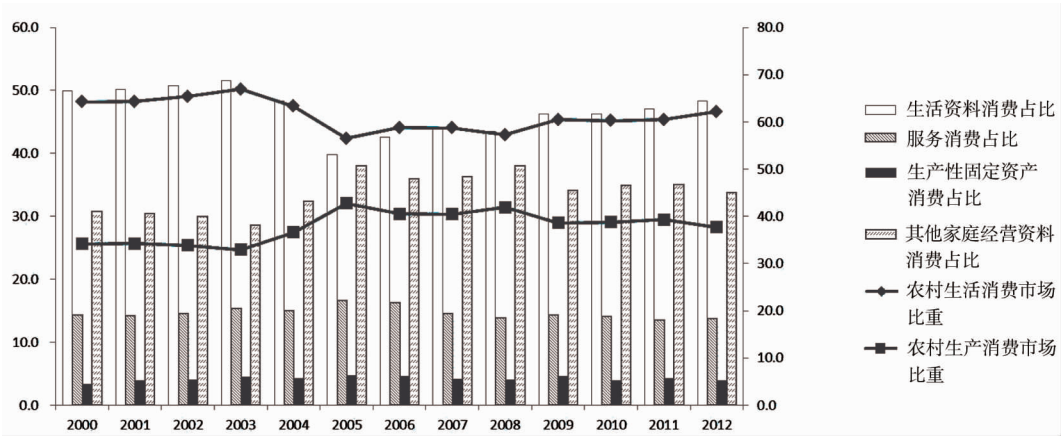


图 2 2000 年—2012 年我国农村消费市场构成变化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4》《中国统计年鉴 2014》。

在农村生活资料消费市场中，食品消费的比重缓慢下降；居住、交通通信与医疗保健消费占比增长较快；衣着及家庭设备用品消费的比重没有明显变化；文教娱乐消费比重则进一步下降（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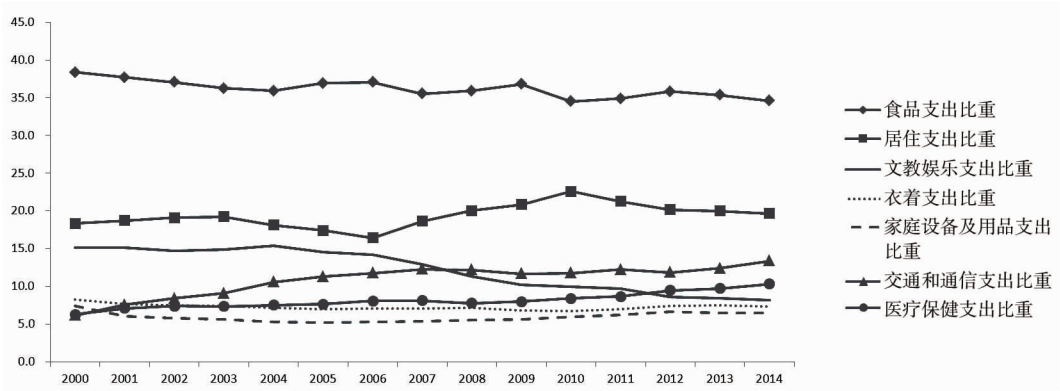


图 3 2000 年—2014 年我国农村生活消费市场的内部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

数据来源：2000 年—2013 年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CEInet Statistics Database），2014 年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4~2015）》，P75~76。

3. 农村消费市场自给率处于较高水平。当前，我国农业仍然是一种“生计型”农业，实物性收入与自雇工构成了农村居民生活与生产消费的重要部分，即自给性消费。2000 年以后，虽然农村两大主要消费——食品与家庭经营性生产资料消费的自给率不断下降，但是食品市场的自给率仍高达 43.6%（2012 年数据），进而使农村消费市场整体依然表现出较强的自给特点（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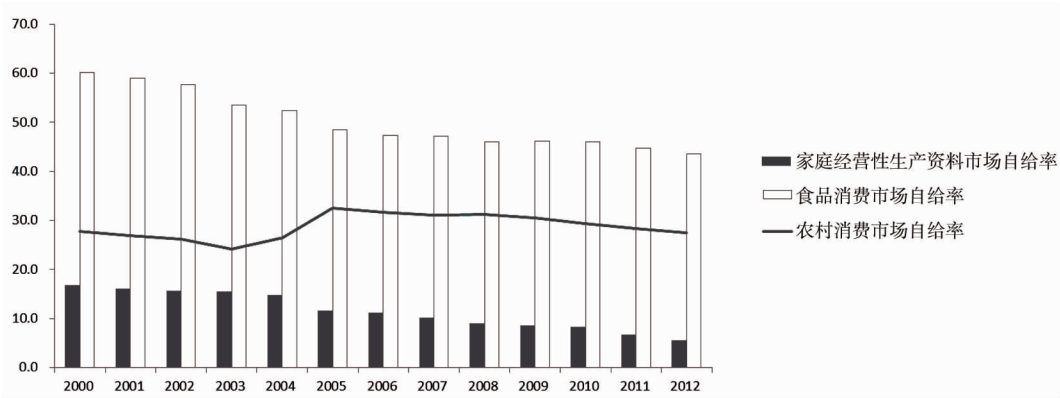


图 4 2000 年—2012 年我国农村市场的自给率变化情况 (单位:%)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CEInet Statistics Database），2015。

4. 区域间农村消费市场规模差距明显。从区域间农村消费市场看，东北部地区增长强劲，中西部地区表现疲软，东部则保持稳中有升。从各地区农村消费市场规模看，东

部地区的市场规模最大，2013 年市场总额接近 1.6 万亿元，占全国农村消费市场 40.6%；其次是中部与东部地区，占比分别为 29.5%与 20.3%。另外，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市场消费结构也略有不同，集中在食品与住房两方面（见表 1）。

表 1 2013 年我国分区域农村居民消费情况及生活消费市场构成

	农村消费 市场规模 (亿元)	增长 率 (%)	农村消费 市场占当 地消费市 场份额 (%)	农村生活资料消费市场结构						
				食品消 费占比 (%)	衣着消 费占比 (%)	居住消 费占比 (%)	家庭设备 及用品消 费占比 (%)	交通通信 消费占比 (%)	文教娱乐 消费占比 (%)	医疗保健 消费占比 (%)
全国	38913.1	11.6	22.1	33.6	7.2	19.1	6.3	13.0	7.9	10.0
东部地区	15815.5	0.8	18.7	35.1	6.6	18.0	5.9	14.1	8.5	8.9
东北地区	3697.1	11.8	21.4	32.6	8.3	16.3	4.3	13.5	9.2	12.7
中部地区	11495.3	-1.4	27.9	33.0	6.8	21.7	7.0	11.3	7.4	10.4
西部地区	7905.2	-1.0	27.4	32.4	7.7	19.8	7.2	12.8	7.2	10.5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4》。

5. 规范的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尚未形成。一方面，农村土地流转速度和规模逐步上升。2004 年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农业补贴与扶持力度的不断增加，农地流转速度和规模持续上升，流转规模从 1997 年的 5100 万亩上升至 2014 年 6 月的 3.8 亿亩，流转比例由 2.7% 提高至 28.8%。但另一方面，真正规范化的农村土地交易市场尚未形成。农村土地流转仍以亲友间的协议流转为主，2014 年有超过 35% 农地属于此类流转。另外，由村委会作为代理，统一村集体成员农地经营权对外流转的比重达 20% 以上。

6. 农村劳动力市场水平偏低。农村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是造成农村劳动力市场水平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 2012 年统计数据，农村居民平均文化水平主要为初中水平及以下，因此农村劳动力在非农就业领域主要从事技术含量不高、门槛较低的体力型临时性工作，随着年龄增大和体质衰退又将逐步退出这些就业领域。同时，农村劳动力在工资待遇、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享受不到和城市劳动力一样的水平，从而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较低。

7. 非正规金融仍是农村金融市场的主要构成。农村资本市场主要由固定资本市场与金融资本市场构成，但是农村固定资产累积速度慢、结构单一，信贷资金缺口仍然较大，非正规金融仍然是金融资本市场的主要构成。2014 年农村固定资产总投资 1.08 万亿元，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51.3 万亿元的 2.1%，比重较低。并且农村 70% 左右的固定资产投资以住宅投资为主，远高于城镇与社会住宅投资比重，投资结构单一，基础设施

等固定资产投资严重不足。因此，在进行金融信贷时，金融机构无法对农村住宅进行合理估值，并且无法防范违约风险，因此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依然较低。

8. 农产品市场流通交易等方式正在发展转变。近年来，全国农产品经过批发市场的交易占总量的 70%以上，各种集贸市场占近 20%，超市、电子商务、农社对接等新型流通方式约占 10%，“农户+市场”的农产品直接交易正逐渐被取代。截至 2013 年底，全国共有农产品批发市场 4469 家。

9. 农村人口变化将对农村消费市场产生影响。由于城镇化加速推进等因素，自 2010 年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 3423 万人，到 2014 年我国城镇人口达到 74916 万人，乡村人口达到 61866 万人，城镇人口比乡村人口多 13050 万人，农村人口下降趋势不断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增速可能会趋缓。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农村收入和消费支出的统计，由于农村人均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都保持较快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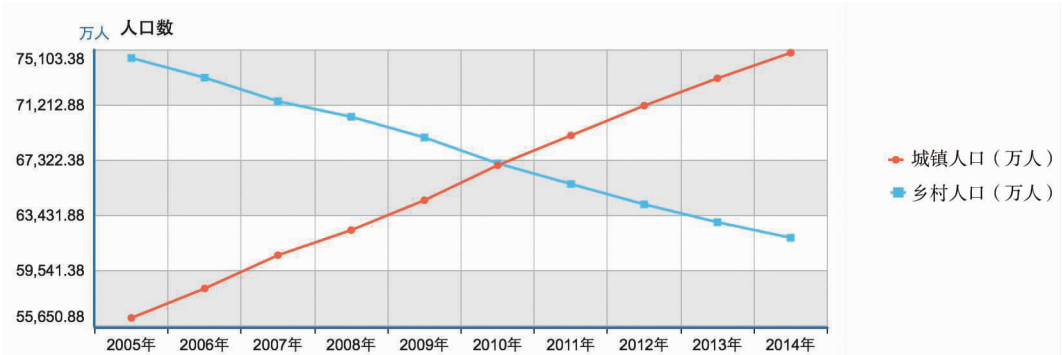


图 5 2005 年—2014 年我国城乡人口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进一步拓展农村市场的主要制约因素

1. 市场供需因素是制约农村市场拓展的直接原因。一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有限的需求能力制约了农村市场快速拓展；二是供应产品不能满足农村需求；三是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影响了农村消费市场转型升级；四是农产品价格低、收益差、农产品国内外价格倒挂等原因造成对农业生产资料消费降低；五是农村居民生活品消费严重挤占了生产资料消费。

2. 市场结构不完善制约农村市场发展。一是市场主体规模偏小、组织程度低、缺乏可以依托的大型流通组织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制约农产品市场发展；二是东中西区域市场布局不合理也影响了市场整体的均衡发展；三是交易结构以传统现货交易为主，通过期货和电子交易、竞拍等现代交易手段较少；四是消费市场和要素市场匹配不协调制约农村市场发展；五是市场中介组织不完善和对中介组织不够重视制约农村市场发展。

例如，农村要素市场的中介组织，包括土地交易服务、资金融通服务、劳务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指导服务等中介机构匮乏严重制约市场发展。

3. 体制机制不完善制约农村市场发展。一是市场制度安排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市场进一步拓展，与土地权益相关的交换比较少；二是政府控制资源配置政策造成的资源要素由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严重制约甚至影响了农村市场发展潜力，严重制约了农村市场发展；三是政府服务及监管体制尚不能适应新时期农村市场发展，基层政府对农村市场引导能力和服务水平较弱，造成农村市场基础设施落后，农村消费升级难以满足富起来的农村居民消费需求，造成农村“空洞化”严重，形成恶性循环。

4. 社会保障不完善制约农村消费市场发展。农村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社会保障不健全、不完善，尚无法保障农村居民养老、医疗、教育和基本生活问题，农村居民在这些方面的支出负担太大，同时也造成农村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大大增加，从而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影响了即期消费，严重制约了农村市场的消费需求。

5. 科技文化发展落后影响农村市场升级。一是科学技术难以普及阻碍了农村市场的转型升级。长期以来，农村成为普及科学技术的“死角”，造成农村经济生产效率低下，农村居民素质难以提高，阻碍了对工业消费品的需求，尤其影响到农村科技市场成长和农村市场转型升级。二是由于缺乏科学技术，农村市场新型流通业态发育迟滞，连锁经营的农产品超市比例较低，大多是通过农贸市场或摊点进行销售，农产品期货市场更是发育严重不足。三是农村传统消费文化影响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例如，重视储蓄积累、忽视当期消费，重视物质消费、忽视精神消费，这种消费观念和传统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村消费的增长。

6. 基础设施落后制约农产品市场功能发挥。总体看，我国农产品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仍较薄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市场功能作用发挥。一方面，农村流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流通组织设置分散，缺乏规范的流通规则 and 有效监管，造成流通体制不完善也制约了农村市场发展。另一方面，农村消费市场网络建设落后，销售网点少，销地终端的农贸市场大多仍以小地摊、大集贸为主，交易环境差，布局不合理，电商等新兴市场刚起步等影响了农村消费市场效率。另外，目前多数农产品市场经营是以场地、设施出租等物业管理收入为主，市场衍生产品收入为辅，市场本身并不是农产品流通的主体，形成“大市场、小业户”格局。

二、进一步激活农村市场发展的动力

保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科技投入、转变消费观念、

加快农村市场顶层设计、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激活农村市场发展的六大动力。

（一）收入持续增长是拓展农村市场最直接的持续动力

受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推动，未来农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大来源都要发挥作用，农民收入增长进入“多轮驱动”的时期。其中，家庭经营收入对主产区农民增收影响显著；工资性收入是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劳动力外出省份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财产性收入寄希望于深化改革，盘活农村土地和集体经营性资产；转移性收入需要强化政府对农民收入的支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保持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是保持农村市场动力、活力和潜力的最重要因素。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拓展农村市场的基础动力

一方面，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有助于提高农民消费信心和能力。完善农村社会保障，解决农民的养老、医疗、就业、和最低生活保障等问题，把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分离出来，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以增加农民的消费信心，激发潜在购买力，扩大消费。另一方面，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发展现代农业、集约农业等新型农业，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让农民持久增收，提高生活消费水平，通过消费拉动生产，促进农村市场发展。

（三）加大科技投入是激活农村市场的创新动力

依靠科技进步来拉动农村经济增长，进而拓展农村市场开发。一是加大科技投入及新兴技术运用可以促进农村技术要素市场的发展；二是加大科技投入可以提高农村生产效率，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三是新兴农业技术、流通技术、电商等新兴技术将极大地拓展农村市场范围。

（四）转变消费观念是激活农村市场的文化动力

加快推动农村文化结构现代化转型，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观念转变。通过文化政策引导农民的生活消费向着科学文明、健康、可持续方向发展，不断加大农民消费中的文化含量，引导农民建立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从而有利于促进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促进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

（五）农村市场顶层设计的拓展农村市场的制度动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

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进一步拓展农村市场方面要根据国家总体战略思路，构建农村市场体系顶层设计，促进农村消费品市场、农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之间协调发展，制定农村市场总体发展思路、路径和举措，确保农村市场健康发展。

（六）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激活农村市场的战略动力

城镇化有利于实现城乡市场和资源对接，增加农民外出就业，提高农民收入，释放农村对住房、家用电子电器产品、生活用品的消费需求，同时城镇化将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促进城乡资源科学合理均衡配置、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改革，逐步解决教育、医疗、社保等问题，有利于促进农民其他消费，推动农村市场的发展。农业现代化有利于直接促进农业要素投入和农村市场新型主体发展，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效益，加快农产品消费结构转型升级。

三、拓展农村市场的思路、目标和重点任务

（一）总体思路

1. 以提高农民收入为中心。实施城乡统筹发展基本方略，坚持工业反哺促进农业发展，城市支持带动农村市场发展的基本方针。切实保障和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要把提高农民收入作为进一步拓展农村市场的中心，把满足农民消费作为目标，坚持既能满足农民需求，又能增加农民收入的原则。

2. 激发农村市场内源式发展动力。坚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和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和释放农村市场的内源式发展动力。把农村市场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作为进一步拓展农村市场的战略路径。

3. 推动农村市场协调发展。统筹考虑农村消费品市场、农产品市场、农村要素市场之间的关系，实现三者协调发展。充分调动农村市场各主体的积极性，有效整合各主体的作用，积极构建各类市场主体参与的农村市场体系。加快制度政策创新、市场机制创新、资源要素创新，构建高效运行的农村市场体系。

（二）总体目标

通过进一步拓展农村市场，稳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需求，提升农民生活质量；通过拓展农村市场，创新农村市场发展模式，逐步构建完善的农村市场体系，带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效益和质量；通过拓展农村市场，带动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通过拓展农村市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逐步创新和完善农村治理模式；通过拓展农村市场，逐步推进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保的协调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促进农村全面发展，全方位推动城乡一体化，最终推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

（三）重点任务

1.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激发农村消费市场。构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保持收入持续增长；引导农村居民消费观念，进行科学消费；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培育农村消费市场主体，加快农村消费市场网络建设，完善农村市场产品供需结构，实现农村消费市场转型升级；进一步规范农业生产资料市场，整顿市场秩序，加大对商业欺诈行为的执法打击力度，同时要拓展农业生产资料市场渠道，引入竞争机制。

2. 加强制度建设激活农村要素市场。农村要素市场改革关键就是要加大农村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真正突破束缚农村要素市场的制度桎梏，释放和激活农村要素市场内生活力，构建城乡一体的要素市场。重点工作是深化农村劳动力市场改革，促进土地要素的市场化，积极培育农村金融市场，农村要素市场发展要与农村市场整体发展相协调。

3. 推动市场转型升级激活农产品市场。促进农产品市场转型升级要加大农产品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水平，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实施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完善对农产品补贴制度，强化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完善农产品定价机制，在试点基础上，及时扩大推广目标价格制度；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规划工作；加快培育有竞争力的新型市场主体；提高产品质量标准，加大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加大农产品网络建设，大力发展农产品物流；积极培育各类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包括信息、金融、技术等中介服务组织。

4.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激活农村市场。一是优先保证农业的财政投入，提高使用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强化社会化服务，进一步拓宽外部增收渠道，提高农民消费能力；二是对于农产品市场要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加快全国农产品市场体系转型升级，开发创新农产品期货交易，加大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三是对于要素市场主要通过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创新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方式，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5. 推动城乡一体化为核心内容的新型城镇化激活农村市场。一是通过新型城镇化有效激活农村市场，刺激消费需求总量扩张，提高农村消费水平；二是通过新型城镇化优

化农村消费结构，推动农村消费市场转型升级；三是通过城镇化破解阻碍农村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有利于农村要素市场发展；四是通过城镇化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城乡一体的市场体系；另外，通过城镇化可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释放农村市场潜力。

四、进一步拓展农村市场的政策建议

（一）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推动城乡市场一体化

一是加快推进农村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实现城乡市场流通体系有效链接，实现农村消费市场和农产品市场一体化；二是加快农业产业化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促进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三是消除城乡二元多等级市场格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统筹城乡生产要素资源配置，促进城乡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互动，建立统一有序的城乡一体化要素市场；四是统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释放农村消费市场潜力；五是统筹城乡体制改革，全力构建城乡消费、农产品和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

（二）采取切实举措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构建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提升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尤其要以占多数的中等收入农村居民为主体。一是要充分调动农民自主创业和增收的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要“多予少取”，更要“放活”，革除束缚农民增收的体制弊端。努力拓展农业和农村外部增收空间，通过引进外部工商企业和当地创业等方式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二是加快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延伸产业链，通过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增加农民工工资性收入；通过加快农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建立和完善土地要素市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三是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和农产品结构，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和机械化，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通过提高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四是加大政策落实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加大对涉农资金使用管理，依法严惩克扣涉农补贴资金、农村乱收费、乱摊派、违法征地等现象，切实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三）培育和构建多元化的农村市场体系

一是调整和完善农村市场结构，对农村消费市场、农产品市场及农村要素市场要统筹规划，协调发展；二是发挥大企业在引领农村市场方面的重要作用，以政策引导大企业在农村的产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服务投资等，促进农村市场快速发展；三是培育多元的农村市场主体，在坚持农民是农村市场最重要的主体基础上，大力培育多元

化的新型农村市场主体，包括农村农业合作组织、中介组织、企业、要素交易服务机构等；四是优化农村市场体系产品结构，加大农村消费市场和农产品市场转型升级，破解阻碍农村要素市场发展的制度机制障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要素市场快速发展；五是构建现代化农村市场流通体系，合理规划和布局农村市场，优化配置农村流通资源，通过现代流通方式建立起高效、畅通的现代化流通体系。

（四）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释放市场消费能力

加快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一是加快完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资金渠道，形成以社会养老为主体、家庭养老为补充的社会养老模式；二是完善农村医疗养老保障体系，大力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提升农村医疗服务水平，构建以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医疗保障模式；三是加大农村教育事业投入，提升农村地区教育质量和水平；四是强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加大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扶持支持力度，通过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农民消费后顾之忧，释放消费潜力。

（五）完善对“三农”支持的财政政策

一是完善对农业的财政补贴方式，主要包括对农业科技、水利、主要粮食作物、保险等方面的补贴，减轻农产品价格扭曲的状况；二是加大对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与农村市场发展紧密相关的公共事业财政投入，解除农村居民后顾之忧；三是以政府财政投入为引导，吸引各类资金向农村回流，建立多种社会资本参与的多元化农村市场投入机制，为农村市场发展打通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四是对农村小微企业、新创企业、个体户等实施免税减税政策支持。

（六）构建对农村市场的金融支持政策体系

一是采取对农村金融进行补贴、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对农村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可减免营业税等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对农村市场的支持；二是加快发展形式多样、渠道多元的农业保险，分散农业生产经营风险，加快农业发展；三是加强政策引导和正向激励措施，引导信贷资金返回农村，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四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建立政府引导资金加各类资金的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农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金融投资主体，投资农村和农业；另外，要进一步加快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对农村市场的支持力度。

（七）以科技创新驱动激活农村市场

一是促进农业经营单位与农业生物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农业工程技术、农业装备

技术单位通过技术入股、技术承包等形式进行合作，领办创办协办涉农科技型企业、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提高农业集约化、产业化、现代化生产经营水平；二是鼓励和推动农村市场高新技术，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电子商务、物联网等技术的推广和使用，创新农村市场运行方式；三是加强政策引导，在建设有关“三农” 科技创业孵化服务和技术交易等平台，实施有关重大科研项目计划，引导科技人员围绕农村市场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应用，以科技为核心带动金融、信息、人才等要素加快向农村市场集聚，鼓励大学毕业生、复转军人、进城务工人员回乡创业。

（八）引导教育农民向现代科学消费观转变

引导农村居民改变传统观念，进行现代消费、科学消费观念和方式。通过广泛开展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积极组织群众的自我教育等活动，引导农村居民合理消费，拓展新型消费，提高生活质量同时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采取树立典型，开展现场教育，大力宣传当地科技致富户、艰苦创业者、现代企业家的事迹，共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推动各类创新要素融合互动，广泛开展农村社区教育等方法，创造有利于农民转变观念、通过创业创新带动和引领消费的社会环境。

（九）加快完善农村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机制

要加快建设农村基础配套设施，需要进一步创新完善农村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机制，可通过创造有利政策条件，引导财政资金、信贷资金、集体资金、社会资金甚至外资参与，构建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农村市场基础设施建设长效机制。对大型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农产品市场网络等具有较强收费功能的项目，可利用建设—经营—转让（即 build—operate—transfer，简称 BOT）等模式进行融资建设；对具有较强外溢性、投资规模大、投资时间长、收益性较为明显的大中型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如大中型农田水利设施等，采用公私合作模式（PPP）进行融资建设；对投资量大、周期长、收益稳定的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农产品加工基地等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可采用以项目所属资产为支撑的证券化模式进行融资建设。

（十）大力推进“互联网+” 激活农村市场

大力推进“互联网+” 激活农村市场，推动农村市场电子商务发展，通过新型消费业态带动农村消费市场发展。一是大力推进“互联网+ 农业”，拓展农业发展空间，促进农业要素有效流动，提高农业科技能力，加速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二是“互联网+ 农村产业”，通过互联网拓展乡村特色旅游、特色农产品加工等产业快速发展；三是通过互

联网拓展农村创新创业空间，实现农村劳动力当地创业就业，提高农村劳动力收入；四是通过发展互联网金融解决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缓慢问题，为农村市场快速发展提供金融保障。

（十一）加快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

一是加快农村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民住房所有权确权颁证工作是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的根基和前提，加快确权工作可以促进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水平提高，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二是培育多元化农村土地流转主体，包括农户、村集体、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三是加大力度培育土地流转管理及中介服务组织，包括土地合作社、土地银行、土地托管、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农村土地产权交易所等；四是释放农村土地抵押融资功能，建立抵押处置机制，增强土地流动性；五是建立规范的农村土地转让、转包、互换、出租、入股和土地信托等管理体系，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六是加强对土地流转市场的监管，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十二）加快推动农村金融资本市场化改革

一是建立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推动不同类型农村金融机构健康发展，包括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民营银行、社区银行等，完善不同类型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机制；二是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和农村金融征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支付环境，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三是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扶持政策体系，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降低存款准备金等政策支持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四是完善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分担体系，建立农村金融担保体系，加快农村农业保险市场发展，建立风险补偿基金降低农村金融市场风险；五是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快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快发展农村互联网金融。

（十三）加快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

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突破城市户籍制度改革限制，形成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全面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均等化建设，完善农村劳动力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农村劳动力合法权益；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加快建立完善的农村劳动力服务组织，加强劳动力市场管理及服务水平，提升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水平。

（十四）进一步加强农村市场监督管理

一是加强农村市场管理，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惩罚机制和奖励机制，保证我国农村市场商品流通有序的进行；二是加大执法力度，坚决禁止假冒伪劣商品流入农村市场，

尤其是与生产活动息息相关的化肥、种子、农机等商品，规范市场秩序，保护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三是加大对农村劳动力工资收入监督检查，防止收购农民农产品“打白条”、拖欠农民工工资和欠薪等损害农村劳动力权益问题。

参考文献：

1. 金三林：《内需增长的支撑：农业转移人口消费特点及发展趋势》，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4 年版。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4 年版。
3. 丁兆庆：《“四化同步”发展下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 年版。
4.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3－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
5. 严旭阳主编：《中国农村消费市场发展概论》，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6. 郁建兴等：《从行政推动到内源发展：中国农业农村的再出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7. 朱信凯：《中国农村消费市场：理论与实践》，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 年版。
8. 邵作昌：《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对策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责任编辑：李 蕊、方 虹

(上接第 66 页)

45. SAILESH TANNA, 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 International Evidence from the Banking Industry. Managerial Finance, 2009, 35.
46. Tam Bang Vu, Ilan Noy, Sectoral analysi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rowth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2009, (19).
47. Y. Wei, X. Liu, S. Song. and Romilly P, Endogenous Innovation Growth Theory and Regional Income Convergence in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1, 13 (2), P 153 – 168.
48. Ying, Understanding China’ s Recent Growth Experience: A Spatial Econometric Perspective.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03, (37), P613 – 628.
49. Shujie Yao, Kailei Wei,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resence of FDI: The Perspective of 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cs. Research Paper, 2006, (33) .

责任编辑：沈家文、杜振华

· 名人观察 ·

纵论中国经济十年之痒

樊 纲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处于加速转型期，改革重点不应放在对旧制度的修补上，而应发展新制度。只要大力发展新制度，旧制度最后可以趋向于无穷小，慢慢就淘汰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阶段，私人经济不够发展，国有垄断还存在，金融市场不发达，人民币还不可以自由兑换，监管、调控机制也很不完善。

一、整体：两次过热，余波未了

如果给过去十年的中国经济画一个走势图，将会呈现两个巨大的波峰，体现出“两次过热”。

第一次是 2004 年到 2007 年。那次是形势使然，美国正处于房地产加金融的大泡沫时期，带着全世界一起过热。中国的出口每年增长 30%~40%，加上国内已经搞了很多改革，尤其是房改后，地方开始搞土地财政，企业也投资、政府也投资，经济一下子就热起来了。为抑制过热，2006 年中国的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货币政策连续收紧，信贷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都出现了大幅回落，央行也不断减少房地产开发的资金支持。那段时期，房价一度被控制在合理的水平范围内。直到现在，一提到“宏观调控”这个词，人们的印象就是政府不让干这个、不让干那个。中国经济的特点是三个“马上”：一刺激马上火起来，政府马上防过热，经济马上又下去了。

第二次过热出现在 2009 年到 2010 年。随着 2008 年 9 月国际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中国经济迅速下滑，出口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风险。在此局面下，中国政府于当年 11 月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预计到 2010 年底大约需要投资四万亿元人民币，外界将其解读为“四万亿刺激计划”。随着各项措施的快速推进，中国经济不仅停止了下滑，而且出现了令全世界惊讶的“逆势增长”。2009 年第一季度末到第三季度，短短半年内，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就从 6.1% 的谷底反弹到 8.9%。10 月末，官方宣布四万亿计划取得明显成效，前九个月全社会

投资增长 33.4%。但是，从“四万亿”出台之日起，国内外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就从未停止过，并呈现两极分化态势。自由派观点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会扰乱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修复机制；干预派则强调，政府的反危机措施挽救了中国经济，甚至称四万亿的刺激力度还远远不够。当时世界金融危机的势头太猛，各国普遍采取了刺激政策，中国政府的干预是在整个大环境下的选择。不过，中国政府的刺激大了点。刺激一年后，经济开始过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房价的爆发式上涨。政府又掉头“泼冷水”：2010 年 4 月，住房限购政策出台，之后连续打压，但过热的后遗症却延续至今，尤其是产能过剩。有了过热一定有过剩，这是经济规律。产能过剩背后是不良债务，债务背后是不良企业，这些都是过热的典型结果。

中国经济为何容易过热？最重要的原因在地方政府。我们曾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借债，但 2009 年危机一来又放开了，地方政府借了大量债务。债多了，投资就多，经济就热，直到现在我们还处在清理、应对过热后遗症的状态中。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不需要控制宏观变量。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全国就业水平，这些都由中央政府负责；地方政府的债务，最终偿债责任也在中央。所以地方上是有钱就花，能借钱就借钱，能扩张就扩张，这符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利益。我们不能说怪谁，因为制度就是这样的，这种机制导致中国经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这么多年一直循环来循环去。对于过热的风险，政府的基本对策就是预防。当然，当世界性经济危机到来时，还是要采取刺激政策，托住经济，但力量不能太大，否则又要过热了。

二、个体：此起彼伏，水涨船高

对老百姓来说，宏观政策离生活太远，国民经济运行最直接的结果莫过于收入与消费。过去十年中，国民收入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农民工收入的上涨。2006 年，国务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农民工月收入在 800 元以下的占群体总数的 72.1%。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 年农民工人均月收入突破 1800 元；2014 年达到 2864 元；2015 年突破 3000 元。与此相对的，是曾经风光无限的白领阶层收入的相对停滞。2015 年 7 月，国内某大型人力资源网公布了当年夏季全国 32 个主要城市白领月薪排行表。数据显示，二季度全国白领平均月薪 6320 元，其中北京以 7873 元排名第一，上海、深圳分别以 7546 元和 6935 元名列第二、第三。然而，早在 2007 年时，国内某研究机构公布的《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中，排名第一的上海月均收入是 5350 元，深圳 5280 元、北京 5000 元。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物价的高涨，不少城市白领感觉自己的收入不仅跑不过房价增速，甚至已经跑不过通货膨胀率。就过去五、六年看，农民工收入上涨的速度确实比白领要

快。尽管如此，农民工仍然是低收入阶层。更关键的是，他们在城里留不下。我们调查的数据显示，他们平均干八、九年就回到农村，我们称之为农民工早退。这几年为什么闹“用工荒”？如果他们不回去，新人又进来，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用工荒”的出现，说明中国过早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这才导致农民工工资快速上涨。不仅是农民工，大量白领乃至中产阶级也在“逃离北上广”。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中，一线城市的就业机会并没有大幅增加，而生存成本，尤其是住房压力却节节攀升。加上沿海经济的纵深发展，曾经热衷挤进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在北京、上海打拼几年后，往往趋于理性，退到二、三线城市定居，劳动力市场逐渐实现供求均衡。

相比于收入的增速，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在过去十年中的蹿升更加引人注目。2006 年，还没有关于中国人境外消费的统计数字，到 2015 年，中国人境外消费金额已经高达 1.2 万亿元，成为闻名全球的旅游消费大户和“行走的钱包”。在国内，电子商务网站也在十年中迅猛崛起。去年，中国网购总额达到 3600 亿美元；“双 11”期间，天猫销售额突破 100 亿元只用了 12 分 28 秒。过去十年，出国留学、出国旅游变得越来越容易。而且人民币大幅升值，购买力不断提高，大家出去都是扫货的。还有投资，十年前，没有多少人知道理财产品，现在多少老百姓天天琢磨理财的事？

尽管如此，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依然在拉大。十年前，全球富豪榜和世界 500 强里还几乎看不到中国内地富豪和企业的名字，现在不仅进去了，而且排到了靠前的位置。但是，当中国富豪的财富水平已经跟国际接轨，甚至达到一流时，中国老百姓的财富排名仍然相对偏后。根据世界银行 2015 年 7 月公布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数据，中国以 7380 美元的人均年收入，在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60，排名第一的挪威则超过了十万美元。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早在 2009 年，世界银行的报告就显示，当时占中国人口 0.4% 的富人，掌握着社会 70% 的财富。如果去掉富豪人群，普通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又将排在什么位置？过去十年，我们最富的和最穷的差距的确拉大了。那些占总劳动力 70% 的群体，农民、农民工，生活质量仍然很低，他们财富不多，更没什么金融资产。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内一位出租车司机说：“我羡慕韩国人，闹金融危机说明他们有钱啊！”当时韩国正闹危机，有资产才会有危机。尽管贫富差距仍然巨大，中国人整体更加有钱仍是不争的事实。今天，中国经济的每一次波动都会引发全球关注，十年前这还无法想象。

三、纵论“十年之痒”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白领压力的变大。过去十年，大学毕业生激增，但白领岗位和经济增速都没那么快，市场供求发生变化，导致竞争更加激烈。

以前大家觉得进了国企很舒服，现在国企的工作压力也很大，这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我们不能叶公好龙，口头上拥护市场经济，现实中又希望过得舒舒服服的，有高薪铁饭碗。市场经济从来不是舒服的经济。

我不同意“中国人口红利耗尽”的观点。现在劳动力确实出现短缺，但不是因为中国劳动力少了、孩子生少了，而是农民工早退。之前我们没有重视这方面的问题，没有让他们留下的机制，导致大量农民工回流。这正是新型城市化所强调的：农民工的市民化。城市化是人的概念，不是土地的概念。其实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只要为他们提供子女教育这一项措施，他就不走了。其他的方面，如住房、低保等可以逐渐跟上。

过去十年，虽然收入和消费都在提升，但工薪阶层在花钱上还是小心谨慎、精打细算，也不敢生病，因为一旦失去工作，收入就断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仍然落后。另外，中国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很少，大家主要还是靠工资，慢慢地积累资产。财产性收入主要是房产和金融资产。十年前，中国人均金融资产在一万元左右，这是把农民工都算进来的。现在虽然还没有具体统计数字，但相信有较大增长。不过，要想完全靠财产性收入生活，在中国也不现实，未来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我们的税收也要考虑财产税。房产税讨论了很久还没征收，股票等金融资产收入也不征税。其实财产税可以均贫富，如遗产税可减少富二代的比例。大部分税负有可能落到中产阶层头上。现在一提财产税，有钱的就反对，没多少钱的也反对。其实发达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富人因为开公司，有各种避税的办法，而中产阶层逃不了。过去十年，我们对低收入阶层基本是免税的，但对月收入在两万元以上的白领、金领，税率一下子就上去了，这不利于中产阶层的发展。毕竟我们重点还是要发展橄榄核的中间部分，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能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因此，中国的税收结构还要调整。税率要有利于人才的稳定，激励向上发展的空间。

我不赞成中国像欧洲那种高福利。从经济学角度，高福利导致了高债务，欧债危机就是典型。福利的问题在于，一旦你设置了制度，就收不回去了，父母那代给，现在不给了，大家就要抗议。福利越来越多，人口越来越多，寿命越来越长，但经济不可能永远增长。你设置的时候可能财政很有钱，但经济一波动，债务问题就来了，难以为继。所以在福利问题上还是保守一点好，别动不动就补贴、承诺。大家还是多努力一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更强一点。

经过十年发展，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产业水平上还有很大差距。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去年中科院一个研究机构发布了《中国现代化报告 2015》称“中国工业落后德国 100 年”。虽然引发了外界质疑，但也能反映一些问题。我们的汽车产业，很多品牌说起来都是

国产的，其实发动机还做不出来；飞机之类的产品就更不用说了。科技、服务、金融等领域，我们起步都比较晚。其实我们真正的差距不是技术，而是专注程度、专业精神。西方一个家族几代人、十几代人专注琢磨一件事，各个环节不断积累，产品价格就比我们高十倍。中国是后发国家，这些年增长较快，新事物较多，大家很难耐得住寂寞。企业和个人都普遍浮躁，只要挣钱快、挣钱多就改行，沉不下心认认真真去做几代人的事业。

中国企业和个人现在都很热衷创新。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要跳跃式地急于求成。现在说到创新和创业好像很简单，星巴克里支个电脑就算创业了。虽然互联网大大降低了信息成本、提高了销售量，但没有解决产品本身的升级问题和专业化程度。如果产品不能做得更精尖，仍然不是一流产品。

长三角和珠三角是过去十年专业性提升最快的地区，但也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这是正常的。以前中国经济规模不大，现在则需要到世界各地找资源，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会更加明显。过去十年，政策优惠都集中在中西部，沿海真的是靠自己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了民营企业、高新科技的转型。未来的地区差异会缩小，内陆部分人口流向沿海，剩下的无论是人均收入还是生活质量都会相应提高。小城市货币收入虽少，但实际收入比例高，大城市则相反，最后达到内陆与沿海人均收入的均等。另外，我在内陆住的房子比你在北上广大多了，不堵车、空气好、压力小、寿命长……这些因素都要算进去。幸福指数不仅仅是数字，虽然你挣两万我挣一万，但你的生活质量没我高。

过去十年为今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因为两次过热，接下来的十年我们还得花些时间清理遗留问题。中国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今后能避免过热，持续改革，再获得 10 年到 20 年的高增长完全可能。当然，这种增长应该是正常的，不是 GDP 年增长 10% 以上，那从来都是过热增长。7%~8%，再少一点可能 6%，都是正常的高增长。等中国真正走出去，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强国，百姓生活才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国还需要时间。中国各个产业都有潜力，但最关键的潜力还是改革制度，把制度红利尽可能都挖掘出来。发展教育也是重中之重。中国人的知识潜力巨大，之前我们没有创新很正常，因为落后太远，只能赶紧学，吸收、消化、引进，再加上点山寨。学到现在，已经越来越接近前沿了，未来我们实现真正创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作者为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艾 冰

发电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张廷克

在巴黎气候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系列承诺，其中关键一条就是 2030 年我国碳排放要达到峰值，并且要力争尽早实现。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我们的能源生产以及低碳、清洁、安全、高效发展，提出了倒计时，确定了一个目标。对我国能源企业，尤其是能源生产企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尽管我国是最大的碳排放国家，但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未来要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经济社会要发展，能源需求会增加。以电为例，截至 2015 年底，我国电力装机容量达 15 亿千瓦，人均装机却只有 1000 千瓦，而美国是 4000 千瓦，欧洲、日本是 3000 千瓦，韩国、台湾也有 2000 多千瓦。我国要实现全面小康，将来能源需求肯定会增加，尽管速度慢一点，但还是要增加。比如到 2030 年，行业内认为，电力要从现在的 15 亿千瓦增加到 30 亿千瓦，到那时人均也就 2000 千瓦，是目前韩国的水平。如果到 2050 年全面实现现代化国家建设目标，不说赶上美国，就是赶上日本、欧洲的人均 3000 千瓦，我国的装机容量就要达到 50 亿千瓦。因此，对能源企业来讲，如何实现低碳、清洁、安全、高效发展，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以能源生产、消费革命的态度来积极应对我们的能源供给与消费。

从电力来讲。必须大力发展低碳清洁能源，不断提高其比重。通过技术进步、市场引导等手段，既要增加能源供给，也要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到 2030 年之后还要减排。一是大力发展水电。到 2030 年之前，我们是有这种潜力的，目前可开发的水电只开发了一半，是两亿多千瓦，到 2030 年要达到四亿千瓦是可能的。但是开发成本会越来越高，尤其是到西南部的西藏、川藏、滇藏等地开发，需要各方面的政策支持，包括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二是加快发展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我国风能、太阳能的资源非常丰富，2015 年底装机规模已达 1.7 亿千瓦，规划到 2020 年将超过三亿千瓦。也有专家预测，到 2030 年可能达到八亿千瓦，风电、太阳能发电各超过四亿千瓦。现在从技术来讲，已经

具备条件，十年前太阳能发电单位千瓦造价两万多元，度电电价两元多还亏本，但是现在其造价可以控制在八千块钱，电价八、九毛钱就能盈利。新能源发展空间巨大，技术创新也尤为重要，可以进一步提高效益、降低成本，要给能源企业一个好的市场预期。三是更安全、高效地发展核电。现在三代、具有四代特征的核电已全面进入示范阶段，一旦在工程实施和商业化上取得成功，将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四是积极推进天然气发电。电力多元化发展，将为我国提供高品质的低碳清洁能源。

合理控制煤电开发节奏，实现清洁高效发展。我国一次能源 70% 是煤炭，这是我们的能源基础。煤电如何实现高效清洁，首先要通过技术进步降低煤耗、减少排放。到 2020 年之前，现存煤电要通过改造基本达到燃气排放标准，新建项目要执行这些标准。这些标准在世界上是最先进的。美国的能源部长到华能上海石洞口电厂考察时，曾为我们采用的一流节能环保技术感到震惊，也使我们感到骄傲。其次，煤炭消费要有一个总量控制，应增加高效清洁煤电用煤。我国现在煤炭消费用在发电领域的比重在 50% 左右，而发达国家可达到 90%。小锅炉、冬季取暖等煤炭利用效率低、不环保，将来可以由高效清洁煤电替代，从总量上减煤量，减少一些污染物排放。

如何开展能源消费革命？要努力提高电力消费在整个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电力本身是清洁高效的，比如电动汽车出行、用电取暖、用电做饭，通过改变传统的用能方式，实现节能减排，包括零排放社区，这些在国外也都正在实践。这也是供给侧改革，一种投资观念的革命。华能作为行业领先的发电公司，每年有 70% 的投资用于开发低碳清洁能源项目。“十二五”期间，华能低碳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年均提高两个百分点，根据规划，2030 年将达到 50% 左右。在技术进步方面，以华能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电站为代表的高效清洁煤电在国内、乃至全球起到了引领作用。核电领域，我们在山东荣成石岛湾核电基地正在建设具有第四代核电特征的、世界首座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主要设备制造技术攻关基本完成，工程进展顺利；与此同时，第三代核电大型先进压水堆示范工程的设计及建设准备工作全面完成，开工在即。这些项目的实施将加快华能核电从起步走向成熟，有力推进电力供给侧革新，实现创新发展。水电领域，2015 年西藏雅鲁藏布江干流第一个大型电站华能藏木电站顺利投产，为后续西南水电开发积累了良好的工程经验。

（作者为中国华能集团副总经理）

责任编辑：李 蕊

药品审评审批改革新举措

吴 滇

药品不仅关系公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还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进步密切相关。鼓励创制新药、确保药品安全、促进公众健康是药品监管部门、医药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共同愿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药业快速发展：目前我国药品销售约占全球 15% 的市场份额，可以生产全球 2000 多种化学原料药中的 1600 多种，化学制剂 4500 多种，疫苗年产量超过 10 亿个剂量单位，是世界第二大医药消费市场。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公众用药需求得到满足，药品研制能力提升明显，生物医药已经列为国家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鼓励和引导药物研发和创新，已经成为从政府部门，到研究机构、医药企业，乃至全社会的普遍共识。创新的推动作用正在逐步显现，创新的驱动效应正在逐步形成，以仿为主，仿创结合的局面初步形成。但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是 4800 多家药厂基本上都生产仿制药，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现象严重，同质化竞争激烈；二是生产企业多、小、散、乱格局还未真正改变，低水平重复申报现象十分突出，审评积压严重；三是创新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一定差距，缺乏具有真正原创意义的药物上市。

问题倒逼改革。改革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既是立足当前解决审批积压的迫切需要，又是着眼长远提高药品质量的治本之策；既是稳增长、惠民生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医药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医药强国的必由之路。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总体要求就是要紧紧围绕保障公众健康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这个大局，以提高药品质量为核心，以解决注册积压为重点，以鼓励创制新药为导向，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当前与长远相结合，加快建立更加科学、高效的审评审批体系。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在药品审评审批改革中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提高药品审批标准。按国际首创批准新药，按原研药标准批准仿制药。新批准的仿制药要以原研药品作为参比制剂，确保质量和疗效一致。对过去已批准上市的存量药品，分期分批推进与原研药品质量疗效的一致性评价。

二是鼓励药品研发。2015 年 11 月 4 日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在 10 个省（市）进行药品上市许可人制度试点，将药品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分开。一方面，允许研发机构和科研人员申报新药上市，以实现科研成果在药品上市许可转让中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上市许可持有人可以委托其他企业生产，使新产品迅速占领市场，有利于抑制低水平重复建设。

三是提高审批效率。优化流程，简化程序，增加审评人力资源，力争 2016 年基本解决药品注册申请积压，2018 年完成国家基本药物口服固体制剂的质量一致性评价。

四是开展数据打假。针对临床数据不真实问题，2015 年 7 月下旬开始，我们启动药物临床试验自查核查工作，打击试验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确保申报资料真实可靠。在此，着重谈谈临床试验数据核查。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核查，是国务院改革药品审批制度的重要任务，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要求的重要举措，目的是以此为切入点，规范我国药物临床试验乃至整个药品研发、生产和经营行为，提高审评审批质量和效率，推动医药行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实现上市药品有效性、安全性和质量可控性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更好地满足公众用药需求。总局前期组织开展了三次临床试验核查，发现了一些药品管理混乱、违背试验方案开展研究，分析方法不科学等数据不完整、不规范方面的问题，也发现了诸如试验药物不真实、编造数据、修改数据、瞒报数据等不真实甚至造假的问题。应该说数据造假和不规范、不完整是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要区别对待，区分处理。数据造假是主观故意，严重违背职业道德，性质恶劣，是此次核查重点，必须狠狠打击，严厉查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数据不完整和不规范是技术水平和能力问题，要给予企业改正、重新申报的机会，维护药品生产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护企业新药研发的积极性。

保护公众健康，保障公众用药的可及性和可获得性是药品监管部门的神圣职责。当前我国新药研发的势头前所未有，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我国制造质量、开展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大环境对新药创制非常有利。我们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以制度创新推动制药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使中国制造走上中高端发展之路。

（作者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副局长）

责任编辑：艾 冰

以全面深化改革引领中国经济 发展和体制改革

——《发展和改革蓝皮书 No. 7》首发式暨
“确保全面深化改革落地生根”研讨会综述

杜树雷 孙凤仪 王再文

摘要：《发展和改革蓝皮书 No. 7》首发式暨——“确保全面深化改革落地生根”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落地实施、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和深入交流，认为蓝皮书不仅是对确保全面深化改革落地生根的一次系统探索和尝试，更是对切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强大正能量的有力汇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是历史的必然更是现实的需要，形成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扩大开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持续推动力、完善的社会保障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保证等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和见解。

关键词：发展和改革蓝皮书 全面深化改革 落地生根

作者简介：杜树雷，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硕士；

孙凤仪，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副研究员、博士；

王再文，国家发展改革委培训中心教授。

为了及时追踪和评估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落地实施情况，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举措取得扎实成效，更好地引领新常态，探路新改革，2016年1月10日，由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在北京联合举

办《发展和改革蓝皮书 No. 7》首发式暨“确保全面深化改革落地生根”研讨会。

会上，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邹东涛教授、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原副主任宋晓梧、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凤仪、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晓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经济学院副教授孙守纪等专家学者和特邀嘉宾，分别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落地实施、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劳动力成本问题、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领域进行了专题讨论和深入交流，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和见解。

一、全面深化改革是历史的必然更是现实的需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十八届五中全会绘制了“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新一轮中国改革步入深水区、攻坚期，在取得阶段性成果后亟待再接再厉、乘势而上，不断取得新成效。

（一）蓝皮书是对确保全面深化改革落地生根的一次系统探索和尝试研究

蓝皮书主编、著名经济学家、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邹东涛教授发表了“确保全面深化改革落地生根”的主旨演讲，对策划编著蓝皮书的初衷、写作过程和现实意义进行了介绍。他指出，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战略部署，高度重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2014 年党中央又作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决定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引领经济发展；2015 年显然是至关重要的一年，成了重大方案落地实施观成效的一年。正是为了“追踪评估”全面深化改革落地实施的情况，引领新常态，探路新改革，发展和改革蓝皮书团队决定编撰出版《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 No. 7》。2016 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新年伊始，《发展和改革蓝皮书 No. 7》的发布，为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一剂良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显著成绩，部分领域改革取得较大突破。随着改革向纵深挺进，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弊端和既得利益阻碍会越发凸显，改革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将更加复杂。在新时期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蓝皮书从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根本矛盾出发，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梳理，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建设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促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深

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 11 个方面，集中重点总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措施和改革进展，与此同时，对于改革过程中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和潜在风险，也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对科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升改革成效有着独特的意义。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增速连续六年放缓，全面深化改革迫在眉睫。但同时，改革也需要不断调整创新，与时俱进，“新常态”的提出就是一个重要信号。蓝皮书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方向，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科学地阐述了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问题。蓝皮书指出，必须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产业专业升级、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不断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攻坚克难，努力使全面深化改革在新的一年里取得重大突破。

（二）“十三五”时期的宏观经济形势和经济新常态下的劳动力成本问题

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公室原副主任宋晓梧展望了“十三五”时期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走向，他结合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对外贸易等方面，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今年中国的宏观经济走势，分析讲解了当前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同时，对“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有关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解读，比如劳动力成本、社会保障制度、集体谈判以及工会和工人之间权利的问题等。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新常态”的核心特征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转变和要素配置日趋合理等方面。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存在结构性失衡，导致劳动力总量上处于过剩状态，而有效供给上存在结构性短缺或过剩，包括在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结构等多个方面。由于中国正处于“刘易斯拐点”的过渡时期，国内劳动力市场供给总量增幅趋缓，整体上缺乏灵活性，并且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劳动力供给在不同维度上呈现不同特征。同时，劳动力素质和劳动力成本持续提高，但相对于发达经济体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劳动力素质提升与人力资本投入仍是长期目标。

（三）深化体制改革是解决 2016 年经济困难的尚方宝剑

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仇喜雪认为，2016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为结构性改革把准了节奏，抓住了关键点。推进结构性改革，要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

治办法化解经济难题。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最终实现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整体改善。

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自古以来财税体制始终发挥着治国安邦的基础性和保障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财税体制改革成为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军，逐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体制框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提出了加强预算、完善税收制度以及推进央地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的总体要求，为构建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财税制度奠定了基础。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凤仪对 1993 年以来财税改革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和展望，认为 1994 年实施分税制后的财税体制改革更多呈现出渐进式、试验性和选择性改革特征，而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是一次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制度创新和系统性重构。但对照全面深化财税改革的基本目标，两年多来预算改革和“营改增”进展较快，其他领域改革进展相对不够显著，关键环节的改革尚待突破，主要改革任务仍相当艰巨。财税体制改革进展不够顺利的主要因素在于思想观念、改革机制、既得利益、配套改革等方面的障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攻坚克难，以敢于触及矛盾、敢于涉险滩的历史担当，厘清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机制和建议，既审慎稳妥又坚定果敢地推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顺利有序实施。

孙凤仪指出，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要牢牢把握转变地方政府观念、创新财政投入方式、遵守国家税收法定、建立现代全口径预算制度和提高直接税比重等重点进行一体化推进，不断建立健全财税改革的协作联动、试错容错、创新激励、评估实施、转化应用以及监督问责等工作机制，为确保各项改革措施顺利开展做好七个方面工作：一是尽快收缩政府和财政的生产建设职能。按照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地方政府要彻底转变观念，退出投资权。二是统一公平税制，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公平竞争，促进社会公平。加强市场监管，为市场主体创造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按照财税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加快推进和完善税制。三是进一步减少财政行政审批，加强依法治税，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坚决落实国家统一制定的普遍性降费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四是创新财政资金管理和政府投融资模式。积极创新财政资金管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建立财政存量资金与转移支付安排、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库款调拨等挂钩机制，创新财

政资金投入方式，以财政杠杆撬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五是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安排。六是尽快建立完整、规范、透明、高效的现代预算制度，硬化支出预算约束，健全复式预算体系。七是健全中央及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通过科学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强化宏观调控和统筹协调职责，不断完善顶层设计，防范和处置系统性风险，推进强制性标准体系改革。

三、扩大开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持续推动力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以开放促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论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开放是一种胸怀、一种思维、一种气度，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抉择，是一个重要而又紧迫的时代课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晓红教授认为，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以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不仅证明了改革开放政策的伟大，而且积累了用开放倒逼改革的成功经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中，开放仍然是重要内容，并且是改革的重要推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要以“一带一路”战略为统领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以全面扩大开放倒逼深化改革，以全面扩大开放倒逼转型升级，以全面扩大开放促进加快发展。现阶段我们不论在扩大对外开放还是在深化国内改革上都面临着一些问题，在改革开放中要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一是在全球治理的层面中国的话语权还不够高。我们不仅要积极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而且要引导全球规则的制定，不断提高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方案，体现出一个世界大国应有的地位。同时，要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特别要按照“一带一路”战略，与沿线国家构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二是在外贸转型升级和高标准国际贸易规则的对接上还存在不足。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的质量，注重创新设计和品牌打造，在提高产品本身质量的同时，不断提高服务质量。逐步健全保障体系，完善财税、金融、海关、质检等方面政策，强化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撑。三是在推动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加快海外投资和产业化布局的过程中，面临着企业活力不高、不熟悉当地法律习俗等诸多问题。因此，要不断完善和用好各类交流合作平台，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的政治、舆论、文化、商业和商贸环境。

四、完善的社会保障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保证

社会保障是关乎基本民生福祉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制度安排，也是公众关注度最

高、反映最敏感、聚焦最持久的重要民生领域。如果说“十二五”是新型社会保障体系从长期渐进的试验性改革状态走向成熟、定型的重要过渡期，那么“十三五”必定是步入成熟、定型发展的新阶段，即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并真正踏上更加公平、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中国式福利国家台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经济学院副教授孙守纪以中国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例，分析了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背景、形成原因和发展历程，指出中国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应对资金不足的短期矛盾方面是相对成功的，在没有完全解决转轨成本的情况下，通过扩大覆盖面、做小和挪用个人账户初步解决了短期矛盾，即养老基金资金不足的问题，但是也对统账结合的制度设计造成了伤害和扭曲，制度实际运行情况与当初的制度设计目标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长期矛盾方面还存在很大欠缺。

纵观世界范围内根本的改革措施中，名义账户制的本质属性非常契合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长期矛盾。为此，我们需要客观地评估统账结合制度的成败得失，回顾历史、放眼未来，借鉴国际经验，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推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名义账户制改革，不再强调个人账户的积累功能、扩大个人账户规模、发挥个人账户的记账功能以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加强精算平衡，促进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

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实践

（一）以上海一门式政务服务看基层治理现代化

上海一门式政务研究中心总监苏博讯介绍了上海一门式政务改革实践，特别是其在大数据应用方面的创新经验，即围绕着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这两个方面，通过互联网数字技术解决行政审批的标准化、阳光化、透明化以及部门协同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实现行政服务在物理、信息和数据三个不同层面的一门式。一门式政务服务在审批改革的同时，完成大数据的搜集和应用是很重要的一点。一方面，数据汇集需要从基层入手，数据只有在基层才是实时的，各个职能部门的其它数据都是一个相对静态的结果。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方式，利用数据技术手段，从企业和老百姓的办事需求出发解决老百姓办事难的问题。这个过程体现了两个特点：一是大数据的应用不仅仅是高技术企业的专利，在信息共享方面需要有能对大量数据进行梳理，能够熟悉老百姓和企业办事流程与需求的中间企业，真正为基层做事。二是一门式政务服务的核心是通过技术创新，把各个职能部门无形地连接在一起，通过新

技术做好政府间的连接，也做好政府和企业、社会的连接。上述两个特点使政府各部门之间更容易达成改革共识，也促使基层政府下决心推动落实这项简政放权的改革。

（二）国家推动中小企业“双创”政策落地生根的思考

山西临汾中小企业培训中心主任郭晓宏分析了现在中小微企业发展面临的“五个问题”“三个误区”和“三点建议”。其中，“五个问题”包括：一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双创”的大环境下，政府的机构改革、职能转变速度之快，使得社会对政府职能部门的理解不透彻。二是中小微企业发展当中，企业家注重自己的个人实践，而对企业自身发展的认识和定位不准。三是企业家的思维和理念存在不确定性。四是企业改革之后的生存能力问题比较突出。五是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社会定位存在问题，缺乏一些政策上应有的亲切关怀。“三个误区”分别是：一是目前“双创”的开展盲目从新，特别是新三板上市和“互联网+”。新三板上市被大家演绎成为中小微企业服务，但是很多企业只看中利益没有看中结果。在“互联网+”的应用上，不明真相的易租宝就是一种把企业当成唐僧肉的典型，所有服务机构都是瞄着企业的钱袋子而来的。二是通过技术服务把企业当成试验田，而没有把对应的责任和利益融合进来，容易造成企业盲目投资和经济损失。三是把企业当墙头草现象使得相关政策缺乏连续性，企业家在多边的政策环境下无所适从。针对中小微企业“双创”的情况，郭晓宏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中小微企业在人才培养这方面，注重把企业人才引进和企业自身培养紧密地结合起来，通过和高校联合培养和企业冠名招生，不失时机地把企业展示出去，形成自身的人才培养和发展理念。二是积极主动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通过把社会责任和自己的品牌、企业的发展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为企业未来的发展赢得口碑、赢得地位、赢得机遇，这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三是进一步完善中小微企业服务机构的功能，不断拓宽服务领域、改进服务方式、深化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在基础建设、融资服务、平台优化、综合培训等方面提供便利，力促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责任编辑：李 蕊、方 虹

推动智库期刊转型，促进学术期刊发展

马博飞

2016 年 3 月 28 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全球化》编辑部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智库期刊沙龙活动。此次活动由《全球化》副主编王晓红主持，邀请了《改革》杂志主编王佳宁和《财贸经济》编辑部原主任王迎新两位业界知名专家，就“如何办好学术期刊”的主题进行了讲座与讨论。

一、新型智库建设和期刊转型

王佳宁主编针对“新型智库建设和期刊转型”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以来，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研究逐渐成为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王佳宁指出，目前各界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认识普遍存在两个误区。一是误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建立了很多新型智库，而实际上不足 300 家。因为大量的研究机构不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甚至并非实体研究机构。二是没有认识到新型智库要有独立观点的发布。新型智库的典型特征不是跟进和解读，而是要有独立观点发布，其研究成果能够影响公众预期。

王佳宁认为，智库期刊转型问题包括如何转型、转型的标准和转型的效应三方面。第一，智库期刊要坚定服务中央决策的办刊方向，选题要兼顾学术层面和政策层面。第二，要重视针对性研究、储备性研究和前瞻性研究。针对性研究的选题有两个主要来源，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文献、一个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热点社会现象；前瞻性研究主要针对相关规划，如在全球化背景下解读“十三五”规划、在国际化背景下研究如何借鉴国外的城镇化发展路径；储备性研究要求对一些发展趋势作出判断。第三，期刊转型要以传播正能量为导向，满足社会需求，考虑文章转引情况的同时，还要注重同行期刊的

互动，实现资源共享。

王晓红副主编用“新、实、专、准”四个字来概括王佳宁主编的主要观点。“新”指智库期刊要突出创新性；“实”表示每一项选题策划要落到实处；“专”即专业化，智库期刊肩负学术和政策层面的双重功能，要在某一专业领域起到引领作用；“准”则是指对政策的把握要准。

二、办好学术期刊的四要素

王迎新主任针对“如何办好学术期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介绍了目前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情况，阐述了学术期刊的定义、本质、特点和功能，重点强调了搭建学术平台的四个支撑，即编者、作者、读者和评者。第一，编者是学术期刊的主导，尤其是主编，起着指导思想的关键作用。《财贸经济》自创刊以来，坚持基础理论与对策研究的紧密结合，逐渐形成了权威性、理论性、可读性、实践性的办刊特色。此外，编辑是编辑部的主力军，也是办好学术期刊的关键因素，要注重学者型编辑的培养，提升自身的业务水平、编辑技能，强调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第二，作者是学术期刊的主体。一方面，自然来稿要慎重筛选，细致审稿；另一方面，要主动争取优秀稿源，建立稳定的作者团队。第三，读者是学术期刊的推动者，需重视读者的反馈意见，并主动征求读者的意见。第四，评者是学术期刊的监督者，可以保证期刊的政治方向、创新性、差错率等不会出现问题。评者的监督对办好学术期刊起到了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这四个要素彼此具有联动关系，办好学术期刊，四大要素缺一不可。

王晓红副主编认为，学术期刊的严肃性首先表现在它的规范化上，包括文章格式、标点、语法等最基本的问题要特别注意；学术期刊的研究方法应博采众长，与国际接轨；在国际化发展方面，要开拓与国际学界的交流；此外，责任心是办好学术期刊非常重要的基础，要求每位编辑具有高度的责任心。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蕊

为中国对外开放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而奋斗终生^{*}

——深切追思著名专家王子先

李 蕊

摘要：2015 年 12 月 15 日，我国著名对外开放问题专家、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巡视员王子先因病与世长辞。子先同志一生虽然短暂，但研究成果丰硕，尤其在外资外贸、服务外包、全球价值链、时尚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卓有建树；2004 年患鼻咽癌之后，子先同志仍未放弃自己深爱的政策研究工作，拖着病体深入基层，带领同志们报送了一大批有创见、有深度、有影响的研究报告，多次获得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批示。子先同志无私的奉献精神、克己奉公的高尚品质、经济学家的使命担当、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不仅是公务员的楷模，也是专家学者的榜样。

关键词：王子先 对外开放 政策研究 追思

作者简介：李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助理研究员。

我国著名对外开放问题专家、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巡视员王子先，生于 1963 年 4 月，1987 年 7 月进入商务部（原外经贸部）工作，2015 年 12 月 15 日因病与世长辞。子先同志无私的奉献精神、克己奉公的高尚品质、经济学家的使命担当、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

^{*} 本文为李蕊根据专家提供材料整理而得。

不仅是公务员的楷模，也是专家学者的榜样。为此，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作出了向王子先学习的批示，他的逝世也引起了业界同仁的沉痛怀念。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沈丹阳同志回忆道：子先在商务部工作数十年如一日，累计起草和撰写了近千篇调研材料、政策报告和各类研究文稿，多次参与中央文件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起草，为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和宏观决策作出了突出贡献。子先同志 2004 年患鼻咽癌之后，仍未放弃自己深爱的政策研究工作，一边打针吃药苦战病魔，一边拖着病体冒着酷暑高温深入基层，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鲜活材料，带领同志们报送了一大批有创见、有深度、有影响的研究报告，多次获得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批示。正是这样一份投身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爱岗敬业、勤勉干事、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精神信念，支撑着子先同志在平凡的机关政策研究工作“冷板凳”上，一坐就是近 30 年，默默无闻地为国家发展贡献智慧和心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一、治学严谨 勤称楷模

子先同志一生虽然短暂，但研究成果丰硕，尤其在外资外贸、服务外包、全球价值链、时尚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卓有建树，先后在《管理世界》《财贸经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宏观经济研究》《全球化》等报刊发表论文 100 多篇，出版专著《论金融全球化》《加入 WTO 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及其对策》《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新一轮开放战略》，主持并参与撰写《关贸总协定与中国企业经营指南》等政策理论著作近十部，这些论文和专著在服务中央决策、推动理论发展、指导基层实践中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和广泛影响。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燕生介绍，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他在担任国家计委（现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子先在外经贸部（现商务部）工作时期，两人就是最好的学术合作伙伴。他们一起去苏南调研外贸和外资发展情况；一起讨论“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有关对外开放的计划或规划思路、重点领域及保障措施；一起研究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政策和实践问题。他说：“子先学友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学术精神始终伴随着我们。”子先是中国对外开放领域最优秀的理论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实践推动者之一。他涉足的研究领域众多，从“三来一补”的贸易方式主动参与国际工序分工体系，到调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积极性引入外来竞争压力；从综合化解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外汇短缺和资本短缺瓶颈，到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启动内生性增长因素；从推进经济特区、高新区、综合保税区，到“走出去”培育全球综合运作能力，他都站在了开放理论和政策推动的最前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教授王晓红介绍，她在读博士研究生时就知道子先，子先从事对外开放领域的研究颇有名气，堪称学习的楷模和典范。在她眼里，子先同志始终是一个不计个人名利得失，一心为了国家利益，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建言献策的人。求真务实、脚踏实地、一丝不苟是他一以贯之的学风，他的多数文章都是独立完成的，从不以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找人捉刀代笔、沽名钓誉。他一生在对外开放、服务业等领域研究颇有建树，源于他严谨认真的学术风格。他们经常在一起参加学术交流和研讨会，每一次发言他都精心准备，而且总是认真听取其他专家的发言，几乎不早退场。他写文章从不敷衍，每一篇论文都抓住前沿热点问题，思想前瞻、文笔洗练，对理论研究者、政府决策者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每一篇文章的字里行间，都闪烁着作为一名公务员、一名专家学者的使命、责任与担当，闪烁着他热爱祖国、人民赤诚的热爱和炽热的情感，闪烁着他学术、对真理不懈追求的勇气。这些充满着探索与创新的论文，就像他的孩子一样，是他生命的延续，也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

中国商务出版社常务副社长、总编辑钱建初介绍，他第一次跟子先同志深入交流源于商务部原副部长张祥主编的《知识与国际经济贸易》。在编辑的过程中有很多数据需要核实，当时子先同志在外经贸部发展司政研室任处长，钱总编去求助他的时候，无论再忙，他都先放下手中的工作，热情地帮助核实数据，并对整本书的结构和内容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们俩的第一次冲突是在 2002 年为子先同志著作《加入 WTO 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及其对策》终审时，当时钱总编感觉子先同志有个观点与当时的主流说法不太相符，便给他打电话希望能够修改，但他断然拒绝，并表示文责自负，如果出版社坚持修改，便撤回书稿不再出版。他的那份决然与坚定和印象中温文尔雅、谦逊大度的子先判若两人。十多年过去了，子先当时在书中提出的很多观点和建议从现在的情况看也是正确甚至是超前的。

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姜荣春在 2007 年—2008 年曾到商务部政研室交流一年，近距离见到子先同志奋斗历程中的一个小小片段。她回忆，除了日常工作，印象里主要是跟着子先同志和其他同事做了两件工作。一是参与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系列纪念活动。那时候出去调研，通常利用晚上熬夜早晨起早或乘车时在路上修改稿件，子先同志提意见她落实，一般反复多次，才会最终提交。二是参与撰写关于世界经济发展情况的研究报告。大约 2008 年 3 月，子先同志凭借多年从事经济形势和涉外政策研究工作的丰富经验和敏感，指导她起草一份深度研究报告。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和反复修改完善，在子先同志的悉心指导和世经室其他同事的通力合作下，这个报告在 6 月最终完稿并提交给部领导，在金融危机之前对于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做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前瞻性分析。后来，金融危

机全面爆发，该报告得到多位部领导高度重视。子先同志所做的研究工作很多，几乎都有广泛的良好反响，不少为政策制定、学术研究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实质性重要贡献。比如，早在2006年—2007年，子先同志就注意到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对于经济转型的重要性，主编了国内第一本生产性服务业报告；十七大之后，他指导大家就对外开放相关内容做了逐条系列解读发表在政研室网站上，引起了较好反响。

二、为人宽厚 言传身教

除了对经济问题的卓越研究能力，在做人方面，子先同志处事公道，儒雅平和，善于为他人着想，即使跟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同事一起工作和相处，也从不以身份地位压人。另一方面，他忘我的工作热诚和投入，深刻敏锐的见解，迅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充满人格魅力，所以，无论到哪里，他的身边总是围着一群求学上进的年轻人自愿追随。

王晓红谈到：“当他得知我也是中国社科院毕业的，十分高兴，一点没有司长的架子便认了我这个师妹，那时我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院工作，对于外资外贸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有幸结实这位大名鼎鼎的师兄自然感到十分高兴，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热情、质朴与谦和。所以，我便直呼师兄，从不称他的官衔。”“在与子先的长期合作中，我不仅增长了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感受到他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感受到他强大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2013年，子先开始主编《中国时尚产业蓝皮书》并担任课题组长，他诚挚邀请我担任副组长，于是我们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合作研究。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时尚产业的发展报告，子先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个‘螃蟹’并不好吃，时尚产业是一个新领域，概念是陌生的、边界是模糊的，没有可借鉴的研究成果，没有现成的资料、数据，更没有现成的专家队伍，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子先亲自设计研究框架、邀请专家顾问，多次组织研讨，组建研究团队。每次我撰写的报告交给他，他都要先夸奖鼓励一番，然后提出许多修改意见，他的工作方法很艺术，所以总是潜移默化地就能接受他的观点和看法。虽然他工作事务繁忙，但从不当甩手掌柜，最后统稿工作都是他严格把关，一遍一遍地对每一篇报告提出修改意见，每个专题都要几易其稿。因为他的严格要求，我也从不懈怠，所以，课题研究在创新性、前瞻性、科学性、理论性、应用性上都有许多突破，获得委托单位中欧国际商学院和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在社会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教授杨丹辉回忆：“我与子先兄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我还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导师王洛林教授介绍我认识了晚我

一年入门的子先，因子先比我年长，加之对他的学问人品敬仰有加，所以多年来一直称呼他为师兄。那时节的子先兄风华正茂，工作和学术已颇有建树，在外经贸领域声名渐播。王老师是希望我能够好好向他请教和学习。初次见面，子先兄待我非常亲切，特意带我到政研室参观，给我分享了对外开放的一些新理念、新思路，彼情彼景至今历历在目。在随后交往中，子先兄平易质朴的待人处事风格一以贯之，这也是他最为感人的品格。”

姜荣春介绍：“离开政研室这些年，我们从未间断学术交流和探讨，也经常会有不同看法，对这些不同看法，我从来都是毫无顾忌、直言不讳，当然，更多时候，是我认识不够全面深刻。即使有些观点他不同意，即使我的认识有明显漏洞，他也从不让我难堪，总在合适时机恰到好处指出，让人有幡然醒悟又如沐春风之感。同时，他始终自觉保持对新事物的开放心态，非常愿意倾听和接受新观点，经常主动修正自己的看法。”

三、殚精竭虑 不畏病魔

“他一生没有别的爱好，只是喜欢工作，喜欢搞研究”子先的妻子黄晓敏回忆，“2004 年 5 月，子先得了鼻咽癌，2005 年查出了肺转移。这么多年，他对自己的病情从来不过问。为了不让他知道自己的病情，每次到医院检查、拿药回来，我都把上面的标签拿掉，他也从来不问。”在他家里摆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朱镕基总理与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的合影，另一张是温家宝总理与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的合影，他都是起草组的成员，他十分珍爱这两张照片。

张燕生回忆：“直到子先病重，每次见到他，总是讨论外经贸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很少听他谈及自己的疾病、家庭和困难。他把自己的整个生命贡献给了国家开放大业，他把自己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最心爱的研究事业。子先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永远值得朋友们怀念和尊敬的人。”

王晓红回忆：“我与子先认识大约是 2006 年，我们一同参加中央政研室‘深港经济融合研究’课题组。记得那年我们与课题组一同去深圳调研，他已经身患癌症，但仍然精神抖擞，走路虎虎生风，一点看不出有病的样子，所以大家都说他‘红光满面，身体恢复得不错’。课题组的调研行程安排很紧张，几乎马不停蹄，白天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还要深入到中兴通讯、大族激光、盐田港、罗湖口岸、华侨城等地进行调研，中午不能休息，晚上还要总结调研情况，几乎是连轴转，我当时有些不适应这样快节奏的工作方式，感到调研很苦。对于一个病人应该更难适应，但子先在调研中从未有过任何懈怠，他每到一处都认真记录，提出富有创新性的见解，令当地政府十分尊重。

在那次调研中，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把他的职务写成了处长，他便当了一天‘处长’，丝毫没有怨言。由于他在对外开放领域的研究具有很深功力，课题组长、时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的郑新立同志就把‘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交给了他，请他撰写‘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是一项重大战略’这一专题。课题研究最终得到了中央领导和当地政府的高度评价及认可，也为后来中央制定粤港澳紧密合作框架发挥了重要参考作用。”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凌云回忆：“与子先师兄的第一次会面是2006年冬季的一个傍晚，具体日子已经记不清了，谈了什么也记不清了，唯一的印象是，子先师兄的嗓音似乎有些低沉。后来才知道，他那时已经在与病魔做着坚强的斗争。他著述等身，研究几乎涵盖中国对外贸易、世界经济的各类问题，很多研究成果都转化为了政府政策。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子先师兄居功至伟。近些年，在身体越来越虚弱的情况下，他仍在艰难地探究如何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如何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等等极具前瞻性的问题。”

杨丹辉回忆：“与子先频繁互动与合作是在2007年之后，那时他虽已身患重疾，但身体状况还好，始终坚守在研究一线。他在大量研究和实地调研基础上，敏锐地观察到世界范围内服务外包引领服务业变革的新趋势以及加快社会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重大现实意义。我们一起合作了商务部的课题《我国社会服务业对外开放战略研究》。在课题研究过程中，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亲自参与课题调研、专题研究以及书稿的撰写编纂。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献身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使命感，正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财富，也一直是我的榜样和工作学习中的激励。尽管饱受病患折磨，但他笔耕不辍，新作频出。特别是在深圳特办的工作经历，使他有機會深入到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他对中国新一轮扩大开放又有了很多新的见地。子先兄把这些新的观察和思考凝结在《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新一轮开放战略》这部力作之中。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病患的折磨已使子先兄几近失声失聪，我们之间除了邮件来往，见面讨论工作主要靠书写交流。他思想活跃、思维敏捷，经常很快就写满一张纸，每次见面都会留下厚厚一沓交流笔记。如今睹物思人，维叹天不假年，惋惜悲怆之情满溢心中。”

四、最好的纪念

沈丹阳表示，王子先同志因病去世，商务战线从此失去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政研干部。“文思应时运，春耕夏耘献计商务伟业犹在望；英才承天悯，纸残墨冷挥毫开放华章未终篇。”子先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力量长存世间。子先同志近30年的商务政策研究经历及其感人事迹，本身就是以生命书写忠诚、践行理

想的真实写照，是对爱岗敬业、埋头苦干精神的最好诠释。我们愿以他的宝贵精神力量为指引，沿着他走过的道路奋力前行，为商务事业乃至国家繁荣富强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这应是对子先同志最好的纪念。

钱建初表示，斯人已乘黄鹤去，但子先那种对学术的执着和严谨，不唯上、不跟风，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向着真理柳栗横担、直入万峰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光大。

杨丹辉说：“与子先兄多年的交往使我深信，生者的悲痛并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我们缅怀他，更要学习传承他‘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和奉献精神，让有限的生命释放出更多奋发向上的正能量。”高凌云说：“子先师兄走了，我失去了挚爱的兄长、亲人。悲痛之余，愿我们这些后来者，能继承他的遗志，为中国对外贸易由大渐强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行贡献微薄的力量。”

王晓红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子先虽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却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核心价值观：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无私奉献，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无愧于时代的召唤，奉献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责任编辑：徐德顺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6年3月以来，国际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和判断。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世界经济脱轨风险”正在加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6年3月8日警告称，世界面临不断加剧的“经济脱轨风险”，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以刺激需求。IMF越来越担心全球经济状况，因为看到了进一步放缓的种种迹象，其很可能继续调降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目前的估计值是3.4%。

IMF第一副总裁利普顿在华盛顿发表讲话时警告，全球经济“显然正处于一个微妙时刻”。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紧急行动，针对不断放缓的经济增长以及大宗商品和金融市场动荡带来的新威胁作出回应。他对全美商业经济协会表示，现在是坚定支持经济活动，把全球经济置于更稳健基础上的时候。世界经济中“最令人不安”的问题之一是过去一年“全球资本及贸易流动骤减”。全球经济当前所处的情况意味着：如果世界不能采取行动刺激需求，一场新的低迷有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现实。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金融市场认为“许多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已耗尽弹药，或者失去了动用强大火力的决心”。

（二）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6年3月9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未来数月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虽然中国经济企稳，但多数发达经济体增长疲软。美国、英国、加拿大和俄罗斯经济增长将放缓；德国和巴西经济增长将减速；印度和法国经济将企稳，而之前的先行指标预示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将加快。实际上，OECD发布的主要经济体

先行指标没有一个显示经济将加速增长。其中一个鼓舞人心的迹象是，先行指标再度预示中国这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增长将保持稳定。

（三）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概率为 30%

摩根士丹利将今后一年内全球经济遭受衰退打击的可能性由 20%上调至 30%。以 Elga Bartsch 为首的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在 2016 年 3 月 14 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尽管他们不相信全球经济会在今年衰退，但是低油价持续冲击以及为刺激经济增长所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其感到担忧。预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2016 年美国经济增长将从 2015 年的 2.4%放缓至 1.7%，2017 年美国经济增长为 1.6%。考虑到低增长的经济环境，全球经济仍然极易受到冲击。这些冲击因素包括许多金融状况失控的情景，例如美联储、欧洲央行或日本央行以及新兴市场多变的资本流向，尤其是中国。此外，还有中东地区冲突问题引起的地缘政治风险，以及涌向欧洲和土耳其的难民流等。摩根士丹利并不是今年全美第一家发声对全球经济增长表示担忧的银行。2016 年 2 月，以 Jonathan Stubbs 为首的花旗集团策略师就曾警告称，全球经济可能会陷入“显著且同步性”的衰退当中，并且股市将进入熊市。

（四）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有四个新现象

2016 年 3 月 20 日，IMF 副总裁朱民指出，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更加联动，使得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远超我们的想象，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在加强，流动性紧张产生的市场波动在不断扩大，全球经济丢失了 1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也严重拉低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经济的实际增长水平比潜在增长水平低 1.5%，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实际增长水平则比潜在增长水平低 1%。总体来看，发达国家 GDP 增速每下降 1%，就会带动发展中国家下降 0.4%；而发展中国家 GDP 增速每下降 1%，也会带动发达国家下降 0.2%。

朱民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有四个新现象：其一，贸易增长速度放慢。贸易增长速度通常都是 GDP 增长速度的一倍，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大概也要超出 50%～60%。但 2008 年—2013 年，全球第一次贸易增长速度低于 GDP 增长速度，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为什么贸易会如此急剧地下跌？这是个重大问题，也是世界经济学家正在研究的热点。其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动速度也在急剧下降。国际金融危机以前，全球 FDI 约占 GDP 的 5%，危机以后的 2013 年，全球 FDI 只占全球 GDP 的 2.8% 左右。一方面，全球化在加速推进，全球化基本的标志是贸易和投资全球化；但另一方面，现在贸易和投资全球化在下降，贸易流和资本流也在下降，与此同时因为信息技术的快

速发展，资金流动的速度加大，所以全球的关联度、互动度大大加强。这个两元悖论的实质是，实体意义上的全球化在下降，虚拟意义上的关联度在上升，而虚拟关联度产生了比实体贸易和资本流更大的金融和 GDP 的冲击。这是今天全球经济金融一个非常重要的两元悖论，也是所有宏观管理者面临的巨大挑战。其三，在货币政策方面，各国都面临两难处境，都在实行货币宽松政策，但该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效用正逐渐减小。这不能说是货币政策失效，需要探讨的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否有效。在经济增长疲弱的情况下，总需求不足，还需要继续用宽松货币政策来刺激总需求，但是只有总需求的政策没有供给方面的政策来做结构改变的话，这个总需求的政策不可持久。其四，一个巨大的困惑表现在劳动生产率方面。今天科技创新层出不穷，但全球的劳动生产率却在下降。全世界的劳动生产率，美国、英国、中国，包括以高科技新闻闻名的以色列，在过去三年的劳动力增长率水平为零，这是世界面临的巨大悖论。

（五）世界经济正在复苏但仍然脆弱

IMF 总裁拉加德 2016 年 4 月 5 日警告称，世界经济正在继续复苏，但仍然处在脆弱阶段。她在德国法兰克福表示，经济有所增长，我们没有处在危机当中。不太好的消息是，经济复苏仍然过于缓慢、脆弱，复苏持续能力面临的风险也在增大。由于经济增长率“在太长时间内维持在极低水平”，以至于许多人“完全没有感受到”。我们需要警惕，但不必惊慌。经济增长动力有所损失，但若决策者们能直面挑战、共同应对，全球信心提高以及全球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将极为明显。

在 2016 年 1 月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IMF 将 2016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为 3.4%，将 2017 年增长预期下调为 3.6%。并警告称，与 2015 年 10 月报告相比，目前预计全球经济活动的提高将更为缓慢。中国经济放缓以及再平衡、大宗商品期货价格下跌以及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出现的紧张状况，将继续对 2016 年—2017 年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拉加德警告称，受到上述影响，过去半年来，全球经济前景已进一步弱化。在美国，强势美元造成经济增长表现平平；在欧元区，投资不足、高失业率以及高负债率抑制了经济增长；日本方面，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率均低于预期。与此同时，中国向更加可持续增长型经济的转型过程已导致经济增长放缓，而巴西与俄罗斯的经济下降幅度超出预期。除此之外，中东地区受到了原油价格下跌的沉重打击。她表示，长期存在的“危机遗产”，即高债务、低通胀率、低投资、劳动生产率低下以及某些国家的高失业率，对发达国家构成风险；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商品期货价格下跌、高企业负债以及起伏不定的资本流动等。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亚洲开发银行预计中国 2016 年经济增速为 6.5%

亚洲开发银行（ADB）2016 年 3 月 30 日发布的一份年度经济展望称，在亚太地区增长放缓之际，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将位于中国政府所设目标区间的下限，明年的增速还将进一步回落，预计 2016 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将为 6.5%、2017 年为 6.3%。中国政府在 2016 年 3 月初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为本年设定的增长目标为 6.5%~7%，未来五年的平均增速为 6.5%，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一增长水平只能通过过度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来实现。

中国投资活动大幅放缓，尤其是在房地产领域和其它资本密集型产业，这将继续对经济增长造成压力，尽管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及环保相关投资的支出可部分抵消该影响。同时，ADB 预计中国消费增长将保持稳健。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将继续应对产能过剩的问题并需要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受中国增长放缓以及主要工业国家复苏乏力的拖累，预计亚洲地区今明两年的增长速度将为 5.7%，低于 2015 年的 5.9%。ADB 经济学家魏尚进在一份报告中亦称，中国增长放缓以及全球经济复苏不均衡等因素正在抑制亚洲的整体增长。

（二）中国经济再平衡的进展低于预期

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 2016 年 3 月 31 日下调中国的评级展望，由“稳定”调至“负面”，认为中国经济再平衡的进展低于该机构预期；中国政府和企业杠杆率预料将恶化。但标普仍维持中国 Aa3 的债信评级不变。这是继穆迪 3 月 1 日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至“负面”之后，又一评级机构在 3 月下调中国的评级展望。

标普确认中国长期 AA- 和短期 A-1+ 的主权信用评级，并对中国的汇款和可兑换性风险评估为 AA- 评级。预期未来五年中国在经济再平衡方面会取得温和进展、信贷增长将放缓。标普相信未来三年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可维持在至少 6%，但政府和企业的财务杠杆将恶化，投资占 GDP 的比率或高于认为可持续的 30%~35% 的水平，在目前有主权评级的国家中最高。标普调整中国评级展望的原因，还包括改革的步伐和深度可能不足以减轻信贷推动经济增长带来的风险。负面评级展望反映该机构预期中国政府信用度面临的经济和金融风险正逐步上升，这可能导致今年或明年评级下调。标普进一步表示，若中国试图以远高于名义 GDP 增长率的信贷增速维持经济增长率在 6.5% 以上的可能性上升，从而使得投资比率高于 40%，就可能发生评级下调。上述趋势或将削弱中国经济应对冲击的弹性，限制政府的政策选项，并且增加趋势增长率更大幅度下滑的可能性。标普估计，内地信贷与 GDP 的比率将由 2016 年低于 165% 升至 2019 年的 180% 左右。

（三）未来 15 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达 6%

据《环球邮报》日前报道，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加拿大央行方面表示，仍然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加拿大银行高级副行长卡罗琳·威尔金斯 2016 年 4 月 5 日表示，中国经济未来 15 年仍有潜力保持每年 6% 的增长，经济规模翻一番多，并且继续保持对加拿大商品的进口。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原油消费国，其所购买的基本金属也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尽管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也减少，但是其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仍会保持高位，而且会从更高的基础上增长。她认为，中国经济放缓到更加可持续的速度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之举。

（四）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不可能引发“硬着陆”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 2016 年 4 月 6 日发布的一份特别报告指出，尽管高企的不良贷款水平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但全球投资者担忧的中国经济放缓问题不太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硬着陆。目前，惠誉仍维持对中国信贷评级前景的稳定评级，其先前对中国主权评级为 A+，但因中国的经济杠杆较高而且还在不断上升，未将中国的评级上调至 AA。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对于债务不断累积的中国来说，高杠杆率仍然是关注的焦点。惠誉补充说，今年中国的债务水平将会继续上行，但中国仍能平安渡过令投资者惴惴不安的不确定性。从长远来看，结构性改革至关重要。惠誉预期中国 2016 年和 2017 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6%~6.5%，而中国官方 2016 年的目标经济增长率是 6.5%~7%。

事实上，中国 2015 年 8 月的人民币贬值震动了全球金融市场，导致资本外流激增，因为市场预期中国政府将通过人民币贬值提振经济。随后，人民币就受到了审查。有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允许人民币贬值，是为了刺激国内经济增长。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的两年内人民币贬值了 6.8%。对此，惠誉则认为，中国有意愿也有方式使人民币兑新的一篮子货币的汇率不出现下滑。分析师指出，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将会带来风险和代价。人民币贬值对全球经济将是一个重大的负面冲击，这可能促使中国采取相关行动。惠誉进一步指出，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也将破坏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过渡进程。到目前为止，中国正在努力推进从依靠制造提供动力的增长模式，向依靠消费提供动力的增长模式转变。走弱的人民币在增强出口公司获利性的同时，也会拉低家庭的实际收入。中国从早期依赖制造业的经济模式转换到更注重消费的经济模式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人民币大幅贬值会对其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当前靠信贷驱动、投资密集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相比较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国有企业重组伴随着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大范围的裁员而言，这一次的国企重组可能会更循序渐进。

（五）15 年后中国重塑全球经济

英国金融时报 2016 年 4 月 6 日报道称，咨询公司麦肯锡旗下研究机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年消费额将从 2015 年的 2.5 万亿美元上升至 2030 年的 6.7 万亿美元，翻一番还多。到 2030 年，全世界城市地区每一美元的支出中，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贡献 12 美分。上述报道称，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像西方婴儿潮一代在其年富力强时期那样，重塑全球经济。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将 15~59 岁年龄段的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该机构预测，到 2030 年，中国 15~59 岁年龄段的人口将从 5.21 亿增至 6.28 亿。与相同年龄段的前几代人相比，这一代中国消费者更加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更愿意将收入中的更大一部分用作支出。这些消费者现在正达到这样一个收入门槛，在这一阶段，服务方面的支出将迅速增长。麦肯锡认为，中国城市月收入 2100 美元（约合 13614.3 元人民币）以上的劳动年龄家庭，所占的比例预计将从 2010 年的 4% 升至 2030 年的 54%。这将推高中国城市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均消费从 2010 年的 4800 美元（约合 31118.4 元人民币）升至 2030 年的 1.07 万美元（约合 69368 元人民币）。这与发达经济体当然还有差距。麦肯锡预计，北美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均消费将从 2015 年的 3.9 万美元提升至 2030 年的 4.8 万美元。但中国的优势在于人多，到 2030 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增至 6.28 亿，而北美只有 1.91 亿。

麦肯锡这份调研报告发现，中国消费者正在变得更愿意花钱。调查显示，在被问及如果你一年多赚 10% 会怎么花钱的时候，43% 受调查的中国消费者选择花掉，远高于北美、西欧和日本；只有 13% 的中国消费者选择还贷款，而该比例在北美为 41%。对于中国中产阶层劳动者来说，在食物上的花费占据了将近一半的支出，7% 用于住房和水电杂费。到 2030 年，30 岁以下群体的教育支出，将占到中国整体消费增长的 12.5%。仅次于瑞典预计将达到的 12.6%，瑞典该年龄群体将把教育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上。而其他多数主要国家教育支出对消费增长的贡献预计会逊色许多，无论是美国和日本之类的国家（目前两国平均对每个孩子的教育支出是中国的 4~5 倍），还是尼日利亚和印度（平均对每个孩子的教育支出约为中国的 1/7）。

责任编辑：李 蕊、徐德顺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2017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 年 4 月)				
世 界	3.4	3.1	3.4	3.5
发达国家	1.8	1.9	1.9	2.0
美 国	2.4	2.4	2.4	2.5
欧元区	0.9	1.5	1.5	1.6
日 本	0.0	0.4	0.5	0.1
发展中国家	4.6	4.0	4.1	4.6
印 度	7.3	7.5	7.5	7.5
俄罗斯	0.6	-3.7	-1.8	0.8
巴 西	0.1	-3.8	-3.8	0.0

世界银行(2016 年 1 月)				
世 界	2.6	2.4	2.9	3.1
发达国家	1.7	1.6	2.1	2.1
发展中国家	4.9	4.3	4.8	5.3

英国共识公司(2016 年 4 月)				
世 界	2.8	2.6	2.4	2.8
美 国	2.4	2.4	2.0	2.4
欧元区	0.9	1.5	1.5	1.6
日 本	-0.1	0.4	0.6	0.5
印 度	7.3	7.5	7.6	7.7

注: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 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2014 年度数据为印度官方大幅上修后数据,而 2015 年及 2016 年数据系参照官方修订后数据的预测结果。3. 各经济体 2014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作了调整。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2017 年 预测值
世 界	3.4	2.8	3.1	3.8
进口				
发达国家	3.4	4.3	3.4	4.1
发展中国家	3.7	0.5	3.0	3.7
出口				
发达国家	3.4	3.4	2.5	3.5
发展中国家	2.9	1.7	3.8	3.9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6 年 4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2017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 年 4 月)				
发达国家	1.4	0.3	0.7	1.5
发展中国家	4.7	4.7	4.5	4.2
英国共识公司(2016 年 4 月)				
世 界	2.6	2.1	2.6	2.8
美 国	1.6	0.1	1.3	2.2
欧元区	0.4	0.0	0.3	1.4
日 本	2.7	0.8	0.0	1.6
印 度	6.0	5.0	5.3	5.3

注:1. 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2. 各经济体 2014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作了调整。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5 年		1.9	0.9	4.3
	1 月	1.7	0.8	3.8
	2 月	1.9	0.9	4.1
	3 月	2.0	1.0	4.2
	4 月	1.8	0.8	4.3
	5 月	1.9	0.9	4.3
	6 月	1.9	0.9	4.3
	7 月	1.9	0.9	4.1
	8 月	1.9	0.9	4.3
	9 月	1.8	0.7	4.3
	10 月	1.9	0.9	4.3
	11 月	2.1	1.0	4.6
	12 月	2.2	1.1	4.8
2016 年				
	1 月	2.4	1.2	5.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5 年							
	3 月	1.2	-0.8	4.0	51.5	53.1	51.9
	4 月	-1.2	-5.5	3.8	50.8	51.6	50.8
	5 月	-1.8	-5.0	3.6	51.1	51.7	51.2
	6 月	-1.2	-4.6	4.2	50.9	51.2	51.2
	7 月	-0.6	-2.5	3.6	50.8	51.3	51.0
	8 月	0.0	-1.8	4.2	50.4	50.6	51.0
	9 月	0.0	-2.7	3.1	50.4	50.5	50.9
	10 月	1.2	-1.0	3.7	51.1	51.6	51.7
	11 月	0.6	-1.6	3.4	51.0	52.2	51.2
	12 月	0.0	-2.5	3.3	50.7	51.5	50.8
2016 年							
	1 月	1.2	-0.4	3.7	50.9	51.5	51.4
	2 月	0.6	-1.5	3.5	50.0	50.3	50.4
	3 月				50.5	51.2	51.2

注：1. 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 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4 年		2.4	2.7	-0.6
	2 季度	4.6	3.8	1.2
	3 季度	4.3	3.5	1.8
	4 季度	2.1	4.3	-1.4
2015 年		2.4	3.1	0.7
	1 季度	0.6	1.8	-0.1
	2 季度	3.9	3.6	2.6
	3 季度	2.0	3.0	1.8
2016 年		1.4	2.4	0.1
	4 季度			
	1 季度	0.5	1.9	1.2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5.3	3.4	3.8
	2 季度	5.6	9.8	9.6
	3 季度	7.9	1.8	-0.8
	4 季度	2.5	5.4	10.3
2015 年		4.0	1.1	4.9
	1 季度	3.3	-6.0	7.1
	2 季度	5.2	5.1	3.0
	3 季度	3.7	0.7	2.3
2016 年		0.4	-2.0	-0.7
	4 季度			
	1 季度	-1.6	-2.6	0.2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4 年		2.4	2.7	-0.6
	2 季度	2.6	2.6	-1.0
	3 季度	2.9	3.0	0.0
	4 季度	2.5	3.2	0.4
2015 年		2.4	3.1	0.7
	1 季度	2.9	3.3	0.4
	2 季度	2.7	3.3	0.7
	3 季度	2.1	3.1	0.7
2016 年		2.0	2.7	1.1
	4 季度			
	1 季度	2.0	2.7	1.4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					单位:亿美元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减进口额	
2014 年		5.3	3.4		3.8		2015 年	22236.2	-5.1		27633.7		-3.1		-5397.6		
	2 季度	5.1	4.3		3.9			2 月	1858.7	-1.7	-1.9	2244.2	-3.5	-3.4	-385.5		
	3 季度	6.1	3.7		3.1			3 月	1867.4	0.5	-4.1	2389.2	6.5	0.4	-521.8		
	4 季度	5.5	2.4		5.4			4 月	1884.1	0.9	-3.4	2317.9	-3.0	-3.1	-433.8		
2015 年		4.0	1.1		4.9			5 月	1870.7	-0.7	-5.2	2305.2	-0.5	-3.7	-434.6		
	1 季度	4.8	2.6		6.5			6 月	1869.1	-0.1	-4.4	2331.8	1.2	-2.0	-462.7		
	2 季度	4.7	1.5		4.8			7 月	1872.0	0.2	-4.9	2309.1	-1.0	-3.1	-437.1		
	3 季度	3.6	1.2		5.6			8 月	1828.1	-2.3	-7.3	2333.5	1.1	-2.2	-505.4		
2016 年	4 季度	3.1	-0.6		2.9			9 月	1852.9	1.4	-5.0	2296.1	-1.6	-3.6	-443.2		
	1 季度	1.9	0.3		1.2			10 月	1831.5	-1.2	-7.4	2286.3	-0.4	-4.9	-454.8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11 月	1809.0	-1.2	-7.8	2244.7	-1.8	-5.0	-435.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12 月	1802.8	-0.3	-7.5	2249.8	0.2	-6.5	-447.0		

表 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失业率	非农雇员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环比折年率	同比				
2015 年		0.6		5.3	290.7		
	3 月	-1.1	0.6	5.5	8.4		
	4 月			5.4	25.1		
	5 月			5.5	27.3		
	6 月	3.5	0.8	5.3	22.8		
	7 月			5.3	27.7		
	8 月			5.1	15.0		
	9 月	2.1	0.6	5.1	14.9		
	10 月			5.0	29.5		
	11 月			5.0	28.0		
	12 月	-3.0	0.3	5.0	27.1		
	2016 年	1 月			4.9	16.8	
2 月				4.9	24.5		
3 月				5.0	21.5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4 年		1066.1		3165.5		-2099.4	
	1 季度	-1034.7		577.7		-1612.3	
	2 季度	653.2		771.3		-118.2	
	3 季度	955.9		969.7		-13.7	
	4 季度	491.7		846.8		-355.1	
2015 年		3798.9		2999.7		799.2	
	1 季度	1983.2		774.9		1208.3	
	2 季度	893.9		855.5		38.4	
	3 季度	417.0		689.7		-272.7	
	4 季度	504.8		679.6		-174.8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4 年		0.9	0.7	0.9
	1 季度	0.2	0.0	0.2
	2 季度	0.1	0.2	0.2
	3 季度	0.3	0.4	0.3
	4 季度	0.4	0.5	0.2
2015 年		1.6	1.7	1.3
	1 季度	0.6	0.5	0.5
	2 季度	0.4	0.3	0.3
	3 季度	0.3	0.5	0.3
	4 季度	0.3	0.2	0.6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1.3	4.1	4.5
	1 季度	0.4	0.8	1.2
	2 季度	-0.5	1.0	1.1
	3 季度	0.4	1.6	1.5
	4 季度	0.6	1.2	1.2
2015 年		2.7	5.0	5.7
	1 季度	1.4	1.4	2.1
	2 季度	0.1	1.7	1.0
	3 季度	0.4	0.2	1.2
	4 季度	1.3	0.2	0.9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5 年		0.5		181.2	10.9
	2 月				11.2
	3 月	0.4	0.5	30.5	11.2
	4 月				11.1
	5 月				11.0
	6 月	0.0	0.8	57.3	11.0
	7 月				10.8
	8 月				10.7
	9 月	0.0	0.6	46.2	10.6
	10 月				10.6
	11 月				10.5
	12 月	0.0	0.7	47.2	10.4
2016 年					
	1 月				10.4
	2 月				10.3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4 年		0.9	0.7	0.9
	1 季度	1.1	0.6	0.7
	2 季度	0.7	0.6	0.8
	3 季度	0.8	0.8	0.9
	4 季度	0.9	1.1	1.0
2015 年		1.6	1.7	1.3
	1 季度	1.3	1.6	1.1
	2 季度	1.6	1.7	1.2
	3 季度	1.6	1.8	1.2
	4 季度	1.6	1.5	1.6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1.3	4.1	4.5
	1 季度	2.5	3.7	4.2
	2 季度	1.2	3.4	4.2
	3 季度	0.7	4.6	4.4
	4 季度	0.9	4.7	5.1
2015 年		2.7	5.0	5.7
	1 季度	2.0	5.3	6.0
	2 季度	2.6	6.0	5.8
	3 季度	2.5	4.6	5.5
	4 季度	3.4	3.6	5.2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环比	同比		环比	同比	出口额
	出口额	增长	增长	进口额	增长	增长	减进
月份		(%)	(%)		(%)	(%)	口额
2015 年	20406		5.4	17932		2.3	2475
2 月	1722	4.1	4.8	1489	2.9	1.1	233
3 月	1726	0.2	11.6	1551	4.1	9.8	175
4 月	1715	-0.6	9.2	1519	-2	5.6	196
5 月	1705	-0.6	2.7	1493	-1.7	0.1	213
6 月	1720	0.9	12.6	1526	2.3	6.8	194
7 月	1731	0.6	7.2	1506	-1.3	0.7	225
8 月	1668	-3.6	5.7	1474	-2.1	2.8	193
9 月	1679	0.7	0.8	1483	0.6	-0.4	196
10 月	1683	0.2	0.4	1488	0.3	-0.6	195
11 月	1709	1.6	6.2	1483	-0.3	4.4	226
12 月	1705	-0.2	4	1484	0.1	3.5	222
2016 年							
1 月	1669	-2.1	-2	1441	-2.9	-2.8	228
2 月	1680	0.7	1.3	1478	2.6	2.1	202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5 年		1718.0	1437.0	236.0
	2 月	331.0	348.0	-17.0
	3 月	234.0	-214.0	448.0
	4 月	287.0	163.0	124.0
	5 月	132.0	311.0	-179.0
	6 月	161.0	172.0	-11.0
	7 月	-72.0	230.0	-302.0
	8 月	-28.0	3.0	-32.0
	9 月	597.0	298.0	299.0
	10 月	426.0	405.0	21.0
	11 月	-450.0	-490.0	-4.0
	12 月	23.0	75.0	-52.0
2016 年	1 月	-99.0	66.0	-165.0
	2 月	211.0	677.0	-466.0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4 年		0.0	-0.9	0.1
	1 季度	1.2	2.3	-0.2
	2 季度	-2.0	-5.0	-0.2
	3 季度	-0.6	0.0	0.3
	4 季度	0.6	0.6	0.3
2015 年		0.4	-1.2	1.1
	1 季度	1.0	0.2	0.2
	2 季度	-0.3	-0.8	0.5
	3 季度	0.3	0.4	0.2
	4 季度	-0.4	-0.8	0.5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1.3	8.3	7.2
	1 季度	2.7	6.0	6.1
	2 季度	-4.7	0.1	-4.3
	3 季度	-0.9	1.5	0.6
	4 季度	0.1	3.2	1.1
2015 年		0.0	2.7	0.2
	1 季度	1.4	2.1	1.9
	2 季度	0.3	-4.6	-2.5
	3 季度	0.2	2.6	1.3
	4 季度	0.1	-0.9	-1.4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4 年		0.0	-0.9	0.1
	1 季度	2.7	3.9	0.6
	2 季度	-0.3	-2.5	-0.3
	3 季度	-1.5	-2.7	-0.2
2015 年	4 季度	-1.0	-2.1	0.3
		0.4	-1.2	1.1
	1 季度	-1.0	-4.2	0.6
	2 季度	0.7	0.1	1.3
	3 季度	1.7	0.4	1.2
	4 季度	0.7	-1.2	1.5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1.3	8.3	7.2
	1 季度	9.1	9.1	14.8
	2 季度	0.6	5.5	5.9
	3 季度	-2.1	7.5	5.0
2015 年	4 季度	-3.1	11.2	3.5
		0.0	2.7	0.2
	1 季度	-3.9	7.2	-0.7
	2 季度	0.6	1.8	0.7
	3 季度	2.1	3.0	1.5
	4 季度	1.9	-0.8	-0.7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5 年		-1.4	1.80	3.4
	3 月	-3.5	1.74	3.4
	4 月	-2.9	1.77	3.3
	5 月	-2.6	1.78	3.3
	6 月	1.4	1.79	3.4
	7 月	-1.8	1.82	3.3
	8 月	-3.0	1.84	3.4
	9 月	-2.5	1.83	3.4
	10 月	0.5	1.86	3.1
	11 月	0.1	1.90	3.3
	12 月	-2.8	1.90	3.3
	2016 年	1 月	-4.0	2.07
2 月		-1.2	1.92	3.3
3 月			1.90	3.2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日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月份							
2015 年	756322		3.5	784676		-8.7	-28353
3 月	64823	3.8	8.5	65936	-5.0	-14.5	-1113
4 月	63578	-1.9	8.0	66437	0.8	-4.2	-2859
5 月	61454	-3.3	2.4	63702	-4.1	-8.7	-2248
6 月	64088	4.3	9.5	66667	4.7	-2.9	-2579
7 月	63578	-0.8	7.6	66669	0.0	-3.2	-3091
8 月	62986	-0.9	3.1	65869	-1.2	-3.1	-2883
9 月	61901	-1.7	0.6	64404	-2.2	-11.1	-2503
10 月	61893	0.0	-2.1	63357	-1.6	-13.4	-1465
11 月	62351	0.7	-3.3	61773	-2.5	-10.2	578
12 月	59718	-4.2	-8.0	59311	-4.0	-18.0	407
2016 年							
1 月	59893	0.3	-12.9	58901	-0.7	-18.0	992
2 月	58454	-2.4	-4.0	56949	-3.3	-14.2	1504
3 月	58517	0.1	-6.8	55752	-2.1	-14.9	2765

注: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5 年		-510	159884	-160394
	2 月	1293	13771	-12478
	3 月	2595	10484	-7889
	4 月	-748	9883	-10631
	5 月	977	23524	-22547
	6 月	-433	6165	-6598
	7 月	-4463	12429	-16892
	8 月	-837	13842	-14679
	9 月	-1884	11442	-13326
	10 月	833	16580	-15747
	11 月	1490	13146	-11656
	12 月	1490	14725	-13235
2016 年				
	1 月	-483	10225	-10708
	2 月	1884	17157	-15273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4 年		2.5	2.9	1.5	0.1	7.3	0.6
	1 季度	0.5	2.8	1.9	3.2	6.7	0.6
	2 季度	3.7	3.0	1.3	-0.9	7.5	0.7
	3 季度	2.1	2.8	1.6	-1.1	8.3	0.9
	4 季度	3.4	2.8	1.4	-0.7	6.6	0.4
2015 年		1.2	2.2	1.3	-3.8	7.5	-3.7
	1 季度	-0.9	2.6	2.2	-2.0	7.5	-2.2
	2 季度	-0.4	2.4	1.3	-2.9	7.6	-4.6
	3 季度	2.4	2.1	1.0	-4.5	7.7	-4.1
	4 季度	0.8	1.9	0.6	-5.9	7.3	-3.8

注: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4 年		3.3	2.1	2.6	3.8	6.0	5.0
	2 季度	3.4	1.8	2.1	4.2	6.5	5.0
	3 季度	3.3	2.3	3.1	4.3	5.6	4.9
	4 季度	2.7	2.6	2.5	3.6	5.7	5.0
2015 年		2.6	2.5	2.4	0.7	5.0	4.8
	1 季度	2.4	2.5	2.4	4.0	5.6	4.7
	2 季度	2.2	2.3	2.9	0.6	4.9	4.7
	3 季度	2.8	2.8	2.2	-0.8	4.7	4.7
	4 季度	3.1	2.5	1.9	-0.5	4.5	5.0
2016 年							
	1 季度	2.7			-0.8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2015 年		6.9	5.4	6.8	5.6	25.4
	3 月	6.8	5.5	6.2	5.9	26.4
	4 月	6.8	5.5	6.4	5.8	
	5 月	6.8	5.6	6.7	5.6	
	6 月	6.8	5.6	6.9	5.3	25.0
	7 月	6.8	5.4	7.5	5.3	
	8 月	7.0	5.3	7.5	5.3	
	9 月	7.1	5.2	7.5	5.2	25.5
	10 月	7.0	5.1	7.8	5.5	
	11 月	7.1	5.1	7.5	5.8	
	12 月	7.1	5.1	6.9	5.8	24.5
2016 年						
	1 月	7.2	5.1	7.6	5.8	
	2 月	7.3	5.1	8.2	5.8	
	3 月	7.1			6.0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2015 年		3.6	4.4	3.3	3.8	3.1
	3 月	3.7	3.9	3.3	3.8	3.0
	4 月	3.7	4.3	3.2	3.8	3.0
	5 月	3.9	4.4	3.2	3.8	3.1
	6 月	3.9	4.4	3.2	3.8	3.1
	7 月	3.7	4.7	3.3	3.7	3.2
	8 月	3.6	4.7	3.3	3.7	3.2
	9 月	3.5	4.5	3.3	3.8	3.2
	10 月	3.4	4.6	3.3	3.8	3.1
	11 月	3.5	4.0	3.3	3.8	3.2
	12 月	3.5	4.0	3.3	3.9	3.4
2016 年						
	1 月	3.5	4.2	3.3	3.9	3.4
	2 月	4.1	4.2	3.3	3.9	3.4
	3 月	3.8	3.7	3.4	3.9	

注:1.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 国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4084.8	4192.5	-107.7	4596.6	6258.3	-1661.7
2 月	319.3	323.0	-3.7	346.6	526.8	-180.2
3 月	360.6	377.1	-16.5	419.0	545.0	-126.1
4 月	340.4	367.6	-27.2	386.1	498.1	-112.0
5 月	339.8	366.1	-26.2	397.6	505.8	-108.2
6 月	371.1	374.2	-3.1	401.5	546.3	-144.8
7 月	339.0	349.8	-10.9	380.0	546.5	-166.5
8 月	335.8	348.8	-13.0	363.4	472.4	-109.0
9 月	345.6	348.0	-2.3	393.3	534.5	-141.1
10 月	336.0	353.2	-17.3	380.1	574.0	-193.9
11 月	322.3	334.2	-11.9	377.9	432.2	-54.3
12 月	334.9	317.7	17.2	405.3	467.7	-62.4
2016 年						
1 月	304.7	392.0	-87.3	314.2	451.4	-137.2
2 月	298.4	310.3	-11.8	340.2	497.3	-157.0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81.5	85.7	-4.1	1911.3	1788.0	123.4
3 月	76.5	75.3	1.2	169.8	172.6	-2.8
4 月	69.8	71.8	-2.0	151.6	153.2	-1.6
5 月	73.8	70.1	3.7	167.7	146.3	21.4
6 月	73.0	68.7	4.4	196.3	157.4	38.8
7 月	74.2	75.6	-1.4	185.3	167.6	17.7
8 月	67.5	75.5	-8.0	154.9	133.1	21.8
9 月	67.0	68.4	-1.4	161.5	137.6	23.9
10 月	63.0	79.5	-16.5	160.5	146.3	14.2
11 月	65.9	65.8	0.1	138.1	131.7	6.4
12 月	58.7	53.7	5.0	167.8	110.2	57.6
2016 年						
1 月	43.6	54.6	-11.0	112.5	107.2	5.2
2 月	57.5	58.2	-0.7	133.5	107.6	25.9
3 月				159.9	120.7	39.2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2666.6	3717.7	-1051.1	3403.5	1940.9	1462.6
3 月	240.3	354.3	-114.0	326.3	171.7	154.6
4 月	221.3	331.3	-110.1	305.5	162.8	142.7
5 月	224.0	328.5	-104.4	305.8	154.0	151.8
6 月	225.2	330.5	-105.2	300.1	163.2	136.9
7 月	232.0	361.2	-129.2	276.6	168.6	107.9
8 月	223.0	337.2	-114.2	253.1	163.5	89.6
9 月	218.0	322.8	-104.9	263.4	168.3	95.1
10 月	214.3	309.4	-95.2	269.6	169.1	100.5
11 月	194.9	297.1	-102.1	254.0	164.6	89.4
12 月	225.0	340.8	-115.8	287.5	174.4	113.1
2016 年						
1 月	209.5	286.4	-76.9	170.6	97.7	73.0
2 月	207.4	272.8	-65.4	201.7	128.2	73.5
3 月	227.2	277.9	-50.7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5267.6	4365.0	902.6	3807.7	4052.8	-245.1
3 月	468.2	384.9	83.4	341.3	345.1	-3.7
4 月	462.2	378.6	83.6	329.5	338.9	-9.3
5 月	423.3	360.4	62.9	313.4	331.8	-18.4
6 月	465.6	366.0	99.6	338.4	354.7	-16.3
7 月	457.0	386.5	70.5	328.0	359.6	-31.6
8 月	391.1	347.7	43.4	310.5	346.9	-36.5
9 月	434.3	345.4	89.0	322.4	345.3	-22.9
10 月	433.5	367.6	65.9	341.6	364.9	-23.4
11 月	442.9	340.5	102.4	310.3	333.9	-23.6
12 月	423.8	354.6	69.2	309.6	326.8	-17.2
2016 年						
1 月	365.8	314.1	51.8	245.4	287.3	-41.9
2 月	366.0	290.2	75.8	290.3	305.4	-15.1
3 月	364.0	290.0	74.0	315.6	322.4	-6.8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5106.0	5594.3	-488.3	2804.8	2289.2	515.6
3 月	416.2	470.8	-54.6	252.7	212.1	40.7
4 月	401.4	457.1	-55.8	234.9	187.4	47.5
5 月	408.5	444.4	-35.9	256.3	202.1	54.2
6 月	407.4	465.6	-58.2	230.7	208.8	21.9
7 月	453.2	475.9	-22.8	235.5	199.1	36.3
8 月	426.6	456.0	-29.4	239.3	199.6	39.7
9 月	453.5	492.6	-39.1	225.4	173.1	52.3
10 月	450.1	485.9	-35.8	239.4	178.1	61.3
11 月	454.6	480.9	-26.4	221.3	193.8	27.5
12 月	468.8	500.8	-32.0	220.6	178.9	41.7
2016 年						
1 月	406.4	425.0	-18.6	222.0	186.9	35.1
2 月	292.7	340.5	-47.8	177.8	136.3	41.5
3 月				227.2	182.2	45.0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199.9	176.0	23.9	1503.4	1427.3	76.1
3 月	180.6	159.3	21.3	136.3	126.1	10.3
4 月	166.1	147.2	18.9	130.8	126.3	4.6
5 月	167.8	152.5	15.3	126.9	116.1	10.8
6 月	171.9	150.5	21.3	135.1	129.8	5.3
7 月	166.3	160.1	6.2	114.7	100.8	13.9
8 月	163.8	138.8	25.0	127.3	124.0	3.3
9 月	162.7	140.3	22.5	125.9	115.6	10.3
10 月	177.6	149.1	28.5	121.2	111.1	10.1
11 月	157.0	133.2	23.8	111.1	115.2	-4.1
12 月	159.5	140.3	19.3	119.2	120.8	-1.6
2016 年						
1 月	142.3	129.9	12.4	104.8	104.7	0.1
2 月	135.5	117.9	17.6	113.1	101.8	11.4
3 月				117.9	113.0	5.0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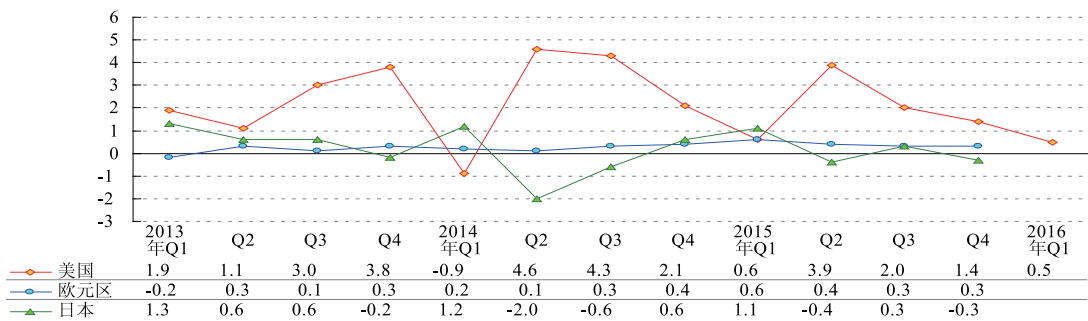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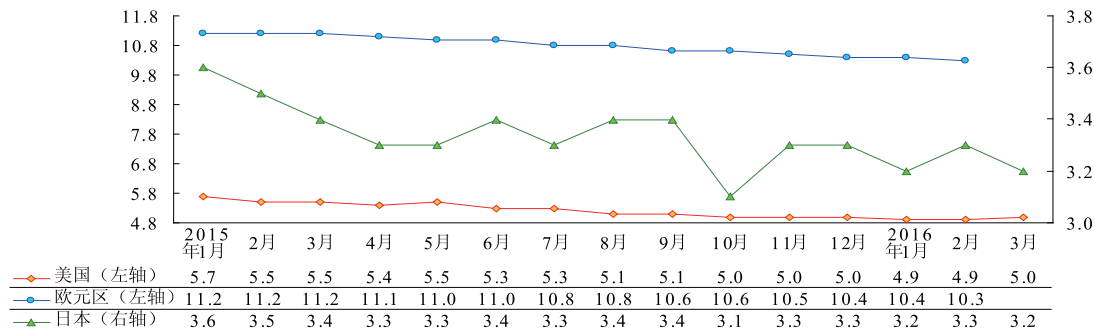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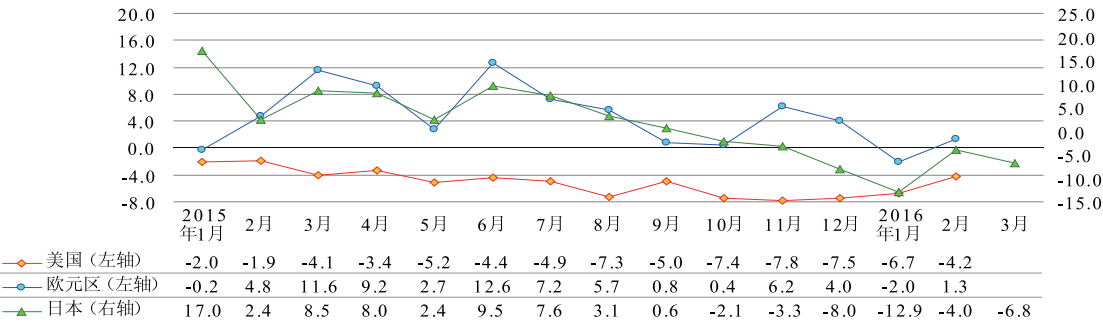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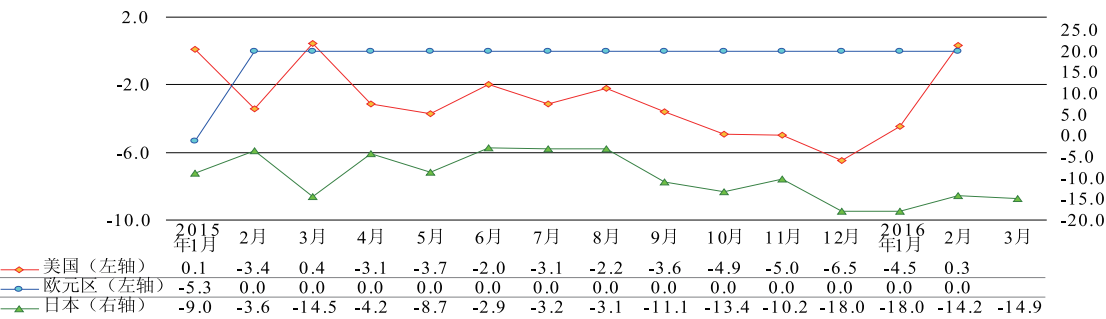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 1~图 4)。

责任编辑：陈璇璇

ABSTRACTS

(1)The action programme for building a moderately well—off society in all aspects——The learning experience from the “Proposal” of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Yang Weimin

During the 12th Five – year perio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tinued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domestic “three – period – overlapping”,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ached great achievements with the targets of the 12th Five – year being successfully attained.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Proposal on the Formulation of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13th Five – year plan” has made a comprehensive deploy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xt five years; the 13th Five – year is the key period to achieve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and comprehensively build a well – off society, we should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well – off society in all aspects, firmly establish and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five development philosophies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 sharing”, focus on the supply – side structural reform,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Communist Party’s leadership, ensure that the objectives and tasks of the 13th Five – year plan be implemented,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13th Five – year plan.

(2)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legal system

Yang Chaofei

The new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ha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in five aspects: establishing local 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y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improving the supervision system for illegal actions which were imposed with low cost previously, providing legal bases for policy formulation to crack low – cost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s, improving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lying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solv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legal system still faces many difficult challenges: the first is the great pressure caused by severe environmental situation, the second is the enormous pressure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group events occurring frequently, the third is tremendous pressure caused by the environmental inequity, the fourth is the great pressure associated with the imperfec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he environmental legal reform includes eight policy areas in the near futu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the division of the two different sewage behaviors, the cleaning – up of historical legacy of EIA regulations, the strict compensation liability for pollution damages, the establishment of exit mechanism for heavily polluting enterpris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and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the establishment of a variety of environmental risk prevention based on the spirit of the rule of law and market mechanism, the funding mechanism for compensation and remediation,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suited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3)The status and trend of Chinese software export and its strategy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eriod

Wang Xiaohong and Ai Bing

During the 12th Five – Year period, the scale of China’s software exports increased, the

export structure upgraded, the industrial chain rose to high – end, software export enterprises accelerated their pac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capabilit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volume of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public contract and public entrepreneurship all set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ervice model innovation, and the industrial aggregation effects in the export – base cities and software parks wer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During the 13th Five – Year perio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ll expand our development space in emerging markets,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based on shared network intelligence will br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ftware industrial innovation, the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ll provide new momentum for software exports, the service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the upgrade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will br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ftware industry. Our country should speed up the supply – side reforms, enhance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the software industry, seize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orm diversified structure of export market, establish mechanisms to absorb talents needed by the software industry and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 further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and policy environment to prot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enhance leadership and discourse power in the form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rules.

(4)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China’s GDP growth

Tian Huimin and Liu Jiang

Althoug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recipient countries, the path through which the effect takes place and the extent are nonlinear, and one of the key factors that caused the nonlinearity is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recipient countries. According to relevant data between 1983 and 2014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stage based on per capita income,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effect of FDI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finding that, after Chinese economy entering the takeoff stage, the changes of per capita income amplifies the pulling effects of FDI on GDP. However, since 2010 changes in per capita income has begun to suppress the pulling effect of FDI on GDP. Although empirical evidence is not strong, to a certain extent it shows that China should improve the policies in time that are designed to attract FDI.

(5)Study on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western front of China, Mongolia and Russia economic corridor

Li Luosha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content of national strategy, perspective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western front of China, Mongolia and Russia economic corridor. The western front of China, Mongolia and Russia economic corridor starts from Inner Mongolia of China, via Mongolia and central Russia, to the North – South Corridor of Arctic estuary, whose position i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s irreplaceabl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corridor is the new window for China to open up for Northern Asian economic circle and tighten regional cooperation with Northern Asia.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Inner Mongolia as the bridgehead and Mongolia’s strategic importance, and that water resources cooperation should become the top priority.

(6)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further expand the rural market

Yuan Lixing, Zhan Lin and Nie Zhenbang

Given the existing obstacles of supply and demand, the market system, social security, cultural and government supervision in China’s current rural market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to adhere to the general ideas of overall planning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expand the targeted “three big markets” of rural consumption, rural element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focus on key tasks of strengthening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promoting market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stimula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activate the “six big drivers” of rural market, speed up the rural market development, spur our economy to realize expanded domestic demand, steady growth,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overall planning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with an aim to helping achieve the overall target of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well – off society.

(7)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to boos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the overall summary of the premiere of the 7th edition of “Development and Reform Blueprint” and the symposium on “Ensuring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to take root”

Du Shulei, Sun Fengyi and Wang Zaiwen

On 10 January 2016, the premiere of the 7th edition of “Development and Reform Blueprint” and the symposium on “Ensuring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to take root” took place in Beijing, with attendees of more than 80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Surrounding the measures to take root for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other issues, the attendees of the meeting carried out in – depth discussion and exchanges, and believed that the Blueprint is not only a systematic exploration and try into how to ensure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to take root, but also a vigorous accumulation of enormous positive energy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and that it puts forward that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is both a historical necessity and the realistic need, it comes up with a series of instructive ideas and opinions regarding deepening reform of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 is a breach for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expanding opening – up is an important part and continuous impetus for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and improving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s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8) Struggling for life for China’s opening – up theories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A memorial Tribute to the famous expert Wang Zixian

Li Rui

On 15 December 2015, Wang Zixian, China’s famous expert on opening – up issues and the Inspector at the Policy Research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died due to illness. Although his life was so short, Comrade Zixian was fruitful in research, especially in aspects of foreign capital, foreign trade, outsourcing services, global value chain, fashion industries, productive services. In addition to his outstanding research capability on economic issues, Comrade Zixian dealt with things in a fair, refined and gentle manner, and for the sake of others. After suffering from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in 2004, Zixian Comrade never gave up his beloved policy research work, went down to the grass – roots level with illness, led colleagues to complete and submit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 reports with originality, depth and influence, and won several written comments or instructions by the leaders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Comrade Zixian’s selfless dedication spirit, his noble quality of wholehearted devotion to public duty, his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as an economist, his meticulous scholarship are not only the model for civil servants, but also the model for experts and scholars.

Editor: Huang Yongfu